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五期

要目

- 時事評論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海明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海明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康君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陳人白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郭大力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劉少嚴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張大軍
爲『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李季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歐伯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盧森堡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唐虞世
論古典主義戲劇……………冰夷編譯

求真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

美國色必麗油漆廠

SUPERIOR PAINT & LACQUER WORK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油漆

美國亞美粉漆廠

ARMOR LABORATORIES INC.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最新科學防水避潮可洗
房屋內外粉漆

美國茂利藥廠

H. E. MAURRY BIOLOGICAL COMPA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最新維他命製劑及
其他名藥

美國戈登化粧品廠

H. B. GORDON LABORATORIES
HOLLYWOOD,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美容用品

美國威克斯輪船用具廠

WEEKS-HOWE-EMERSON COMPAN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出品：各種船上用具

美國北美貿易公司

NORTH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經營：進出口貨

美國中美貿易公司

CHINESE AMERICAN TRADING CORP.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經營：進出口貨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

總行

郵政信箱：一九六八

電話：一九五四〇

遠東總經理 同昌洋行

電報掛號 四二九九 (英文) "Tonywong, SHANGHAI"

分行

美國 126 South Front St., Mankato, Minn., U.S.A.

香港 德輔道西三四號

廣州 沙基路一七八號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時事評論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

海明(二)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

康君(三)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

海明(五)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陳人白(七)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郭大力(三)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

劉少嚴(一)

▲日本無產階級之弱點及其出路▼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

張大軍(一)

為『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

李季(四)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

歐伯(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
子規譯(五)

▲盧森堡的人生觀▼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

唐虞世(六)

論古典主義戲劇【中A】

冰夷編譯(六)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五)

李毓鏞(七)

教育的愛【小說】

謝少翁(七)

時事評論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

我們讀到八月廿四日『周報』的休刊號，知道這個刊物確實被迫而停刊了。在高唱『民主』的今日，這種現象之發生當然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政府會不斷申言實現民主之決心，而最高當局本人也鄭重地發表過有名的『四項諾言』。經過了八年戰爭的民衆，在抗戰結束之初，確也會對政府這種慷慨的『允諾』發生過不可遏止的熱望。其實，民衆過去之忍受戰爭的禍害，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不僅是希望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還強烈地希望：經此一戰，中國能够澈底掙脫落後的環境，躋於文明和自由地位。在這種不可抗拒的要求之下，政府最初也不得不相當容忍一下某種程度的言論、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

我們說『相當容忍』和『某種程度』，也就是說，中國民衆所得的這種自由還是很不夠、很起碼的，距離真正的民主政治還遠得很。但過去一年來的事實表現，政府即對這樣可憐的起碼的民主權利也逐漸在取消了。許多民主的集會，甚至是很溫和的，也連續遭受打擊了，甚至連人身也遭受傷害了！（如毆打、搗亂和暗殺等）學生、工人之參加政治活動本來也是最基本的民權，但他們不是因此橫遭逮捕，便是整批的被學校和工廠開除，雖然政府對這一類的失去任何同情的行爲，尙極力推諉責任，但這至少證明政府口口聲聲維護民主的表示是並不很負責任的；因爲沒有一個誠意維護民主的政府肯縱容這種種反民主的行爲。

現在我們姑且將種種人身傷害、搗亂民衆集會，甚至暗殺的行爲暫時拋開不談，然最近各地刊物之橫遭封禁又該作何解釋？據各方面調查的結果，北平被查封的刊物達七十七種，昆明四十六種，重慶、成都八十餘種，廣州查禁的數目還不得而知。除此之外，還有書局、出版社及報攤的橫遭沒收和搗毀，郵局的阻難，及登記證的遲遲頒發等等，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上海是國際的都市，因爲中外觀瞻所繫，能一時得以相安無事，但最近『文匯報』之被迫而停刊一週以及『周報』之受停刊處分，却證明這個中國文化的心臟也岌岌可危，而上海言論界之重視此事，也就絕不是神經過敏了。近日報載，『民主』週刊也有被迫而停刊之虞，這更令我們出版界發生當然的憂慮：是不是政府在有系統地肅清上海的刊物呢？！

本來，即使在民主國度裏，政府也有權因觸犯刑規而勒令某一刊物停刊若干期間，以資懲戒。但這次『周報』的停刊却顯然是永久性的，而且受這種嚴厲處罰的還不止於一個地方和一個刊物。抑尤有甚者，政府查封這許多刊物，迄今尙未有一個明確的說明。據『周報』記者稱，當局之查禁牠是根據上峯一道『密令』。所謂『密令』，就是查禁的理由不能公佈之意。這種現象實在距離民主政治太遠了！

如果政府查禁某一刊物而具有充分的理由，牠是不怕把牠向民衆明白地宣佈出來的。如果不宣佈理由就封禁一個刊物，或有系統的封禁一批刊物，這就無異承認政府此舉是出於一種難於引起民衆同情的動機了。這不僅對於民衆方面，就是對於政府方面也是非常不幸的。因爲這唯一結果，只能是加深民衆與政府雙方的鴻溝。

也許政府所隱藏着的苦衷，認為『周報』是代表共產黨立場的刊物，而現在在內戰全面爆發期間，對這種刊物要加以懲罰。關於『周報』本身是否共產黨的刊物，我們不敢妄下斷語。不過牠之同情共產黨當然無容辯解。縱令如此，政府的理由也是非常薄弱的。假如一個自稱民主的政府，藉口一個刊物擁護或同情某一在野黨而加以封閉，而這個在野黨（共產黨）雖然與政府處於戰爭狀態，但雙方始終未決裂，政府也繼續承認牠的合法地位，我們敢問：有什麼比此更無理的迫害呢？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尚在重慶出版牠的『新華日報』，南京尚繼續容許共產黨的領袖和代表公開發言，但一些手無寸鐵的刊物却反而遭受封閉，這難怪有些報界中人興『有槍桿兒才有話說』之嘆了。政府用高壓手段迫出這種結論，不僅不幸而且也十分可怕！

也許政府還有另一個隱衷，說：像『周報』這一類刊物對政府當局，對『最高領袖』批評得過於偏激和難堪了，尤其難於忍受的，牠僅僅批評國民黨政府，而對於另一個政府——共產黨政府則絕口不提。這個理由似乎有點動聽，而且我們在官方報紙中也隱隱約約的看到不少這一類的憤懣之辭。但仔細研究一下，我們仍不能認為這是令人心服的。事實上，不僅『周報』，就是所有共產黨系的刊物，牠們對政府的批評，其偏激也是很有限度的，牠們總不能超出三民主義的範圍，所以牠們無論如何『左』，也不過是國民黨的反對派，牠們沒有提倡推翻政府，牠們沒有提倡與政府不相容的『主義』，牠們甚至還不敢否認『最高領袖』的地位。牠們所希望的民主也只是改一黨專政為幾個黨的聯合政府，牠們不僅不主張立即實行澈底的土地改革，而且還不主張立即召集一個普選的國民會議。像這樣一種『左派』意見，與英、美各國主張赤裸裸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比起來，真是有天淵之別！但中國的政府連此種溫和的反對意見也視為不能忍受，視為『過激』而加以壓制，這未免太過偏狹了。我們還談什麼『學習英、美的民主政治』？！

再說，政府許還有一種最後的苦衷，認為共產黨本身就沒有實現民主，牠在牠的『解放區』裏就不容許國民黨員有言論出版自由，所以政府就有理由加以報復。這似乎是十分動人的動機。關於『解放區』的詳細情形我們很難知道。但共產黨由於物質基礎過於薄弱，統治缺乏穩定，似乎很不可相信牠也只能實施一種緊張的軍事統治，因此所有過左（提倡澈底社會改革的）與過右（主張恢復原狀的）的主張都不容存在，這當然是共產黨的弱點。但即令如此，政府爲了從政治上暴露對方的弱點，爭取牠的民心，却不應與牠競賽，不應採取報復手段，更不應該訴之無出路的內戰。否則，不僅得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只有自毀於國內民衆面前，或充其量只有與反對黨同歸於盡而已。

無論政府出於上述何種動機，封閉刊物，封閉反對派之口，都是違反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的。過去全部人類的歷史會證明過：官僚主義的螺旋蓋扭得越緊，人民蘊蓄而難洩的不滿越將激發成爲可怕的爆炸力。至少，主張恢復中國舊文化，舊道德的政府當局，應該懂得這兩句成了口頭禪的古書：『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幾千年前，那個可憐的周幽王就是給防不止的『口』咬死的。（海明）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

英內閣代表團經三月的談判，結果仍不能使印回兩派領袖合作，於是談判擱淺了。但印度問題一直拖到今天，事實上已無法再拖下去，牠勢必要予以解決——即使是半吊子的解決。所以當這三位大臣返回倫敦以後，印度的羣衆運動又馬上風起雲湧起

來，廿五萬工人的總罷工也接踵而起了。這種革命危機的迫近，充分警告了唐寧街的主人，而且也警告了甘地尼赫魯這班印度資產階級：假如不趕快互相妥協，則羣衆的反英運動一經勃發，勢將不可收拾；牠不但會把英國在印的一切勢力都完全掃出印度之外，而且也將使印度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被連帶侵犯而同歸於盡。對此，他們都同樣看得很清楚，而且是深深引爲憂慮的！

英國一貫用以統治印度的助「回」抑「印」政策，今天顯然已有點不合時宜了。在今天的印度，尼赫魯等國民大會派所代表的勢力，遠遠超過真納的「巴基斯坦」運動之上。英國再也不能不對最有和最能幹的工具讓點步，分給他們一點利益，讓他們分享一部份的政權，讓他們有效地去鎮壓印度羣衆的鬥爭。這種策略上「助此抑彼」的改變，同時又可煽起印度內部彼此間的紛爭，讓牠自己坐收漁翁之利，藉以延緩印度真正獨立的到來。如此，統治印度的總目標還是絲毫未轉移過的。

另一方面，尼赫魯所代表的印度資產階級，在羣衆激烈鬥爭之前，早已驚慌失措，趕忙接起唐寧街主人所擲下的一點恩惠，便沾沾自滿了。他們不敢觸動英國在印的一切經濟特權；他們沒有獨立的軍隊；他們只想依靠英國的槍砲，去控制印度的羣衆鬥爭，使之不要超出他們所劃定的「非暴力」圈子以外*；同時也順便削弱他們的政權競爭者——真納底勢力。

然而，尼赫魯等輩所欣然接受的臨時政府組織，究竟「獨立」到什麼程度呢？據聯合社二十三日電告訴我們：「負責方面宣稱……印度總督魏菲爾仍將任行政院長，賦有否決權」，關於這種「否決權」的限度，據同一電訊說，將由他本人在廣播中加以闡明。但今天（八月廿六日）報載他的廣播所闡明的，却是：

「新政府將無任何權力，亦無任何企圖以侵犯各省行政之範圍。新政府中之陸軍部長將爲印度人担任，此項變更當爲印度英軍總司令與余本人所贊同，但軍隊在憲法上之地位並不受有影響，軍隊應遵守誓言，仍將效忠大不列顛皇帝，余仍對皇帝暨議會負責也」。（法國新聞社新德里二十四日電）

他所闡明的只是「臨時政府不得干涉」的「各省的廣泛權力」，只是印度軍隊仍將效忠英皇而非效忠於印度的獨立運動，而對他所預定要闡明的總督賦有否決權問題却没有提及，這一點顯然還在討價還價之中，但即使將這行政院長讓與印度人，也和陸軍部長一樣，「仍將效忠大不列顛皇帝」，或者，「無任何權力侵犯各省行政」的。

不過，無論新臨時政府的獨立權力如何薄弱，甚而帶有濃厚的虛幻性，仍然不會妨礙尼赫魯們伸出戰慄的手去接收它，大唱其和平接收政權的催眠曲。這就是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所共有的卑怯本能；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本誌一·二期「時事評論」中早已預先指出過了。

尼赫魯分得了一點可憐的利益，却使他的政敵真納看得分外眼紅。這位今非昔比的「分治」先生，正在利用羣衆的壓力去威脅英國統治者和國大黨領袖。他一面不斷地進行妥協談判，一面又斥責「國大黨在英國刀鋒之協助下，完成對回教徒及其他少數民族之統治」，覺得「尼赫魯與其稱回教徒缺乏合作，不如稱回教徒不擬投降爲確當。」（路透社孟買十八日電）因此他定下八月十六日爲回教徒的「直接行動日」，來抗議英內閣的印度憲法計劃。但他用這種玩火式的威嚇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他的對方並不爲所動；反之，羣衆行動的火焰却燒灼了他自己的手了。

十六日那天，真納號召回教徒「直接行動」，他叫羣衆跑到街道上，却劃了一個「合法的和平示威」的圈子命令他們站着，不准突出圈子之外。但羣衆並不想做真納和政敵討價還價的簡單工具，他們要求脫離英國以至國大黨等的殘暴統治，他們跑到街道上去，只是爲了自身生活利益所驅使的！這些窮苦民衆一經獲得「行動」的機會，他們就不能老是站在和平合法的圈子內，毫不動彈；他們很自然地要繼續「行動」，對一貫壓迫和剝削他們的階級敵人予以報復，并搶光他們所無力購得的食物等。不管官

方的電訊是如何簡單，有時且故意蒙蔽事實的真相，但聯合社加爾各答十八日電稱：搶劫之風極盛，全市各區未有不遭搶劫者，被劫商店除空架及玻璃碎片外，不剩一物。從這報導中，我們相信上面的猜測並非是沒有根據的。

這個暴動從真納所定的『直接行動日』起，一連繼續了四日；暴動的中心的在加爾各答，其他的回教城市也有示威和十萬人的大集會等。據舊金山二十日廣播加爾各答訊：警局估計暴動結果死亡達三千人，而倫敦『電訊交換報』加爾各答電則估計死四千人，傷二萬四千人。這些傷亡數目，當然以回教徒佔了絕大的百分比。尼赫魯等輩資產階級，利用英國軍警出動輕型戰車，連同他們的軍事組織（全印反回印分治陣線），總算在殘酷的大流血中把暴動在外表上一時壓下去了。

但在開始『直接行動』之翌日，號召者真納却居然在一夜之間，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和尼赫魯一致譴責加爾各答暴動事件，他公開對記者宣稱，『余毫不留情譴責此次暴亂之行動』，『反對此種犯罪行為』，『依法懲辦此次血案之負責人員』。而國大黨、回教聯盟甚至共產黨領袖都在十七日聯名呼籲『立刻停止鬧牆之爭』；印度教與回教領袖十八日即舉行會議，商討恢復城區和平問題。不然，這種侵犯私有財產的暴動，馬上就要蔓延到全印度了，又怎能怪他們趕忙一致對付呢！

真納想利用羣衆之火來討價還價，以便自己多得一點殘羹，想不到竟首先被燒灼了手。如果他趕快縮回雙手，加以反對和鎮壓，那他所代表的回教資產階級地主的生命財產也要給燎原的大火所焚燒掉的。他這幕悲劇串演得太拙劣了，竟連他自己也無力控制那種可怕的場面，以致過去口口聲聲『不擬投降』的，現在也不能不慌忙地向別人乞援——投降了！據今（廿六）日報載路透社電，他已宣稱對印督的廣播，要加以詳細的研究；同時回教聯盟高級職員對魏菲爾、尼赫魯與回盟舉行會議的建議，也『表示歡迎』了。我們不難預測：當真納被火灼傷而且證明他本人無力控制羣衆以後，他多份要減價求售於主人及『同僚』的。這樣，他才能希望保留一些殘羹，不然便只有所失但無所得了。

在這次暴動中，客觀上有助於英國的巴基斯坦運動，總算被真納本人所畢露其原形了。他們一向所爭吵的，只是幾個人麵包屑的分贓不均問題，而不是幾萬萬被奴役人民的生活改善問題；他們所追求的，只是在大英帝國的羽翼下做幾個官職問題，而不是在真正民主的基礎上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問題。事變的進程將會教育羣衆去認識和唾棄這一切的騙子們的。（康君）

* 本文付印時，竟又看到了法國新聞社新德里二十七日電：『印度各地暴動不已，治安堪虞，臨時政府主席尼赫魯發起推行形如中國之保甲制度，以防發生搗亂。』這證明印度資產階級一上台就暴露牠的反動真面目。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

現在距離和平會議開幕那一天，已將近一個月了。據大公報巴黎特派員的總結說：『這三個星期中，二十一個國家的成就只不過是：通過和會程序規則案，設立審查和約草案的十個委員會（審查工作尚未着手進行），以及聽取全部戰勝國與五戰敗國申述他們對於和平的意見。嚴格的說來，和會還未結束初步的階段』。（八月十九日大公報）

事實上，就是這點可憐的結果，還是經過許多『激烈和紛擾』的爭吵的。光是程序規則問題就一直爭吵了十多天；最初是奧、比、荷、挪、紐西蘭、南非、阿比西尼亞等小國堅主多數通過制，四強和蘇聯的五個與國則主張三分之二制。但莫洛托夫並不因為英、美與她站在一起，而忽略指出：『贊成簡單多數制之國家，實乃運用一種策略，使英語國家蒙受其利而陷蘇聯集團於

不利。』這就是說，除了白俄羅斯、捷克、波蘭、南斯拉夫、烏克蘭這五個受蘇聯絕對控制的小國家之外，其他全世界的小國家都站到英、美方面去了！這當然是一種痛苦。但這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參加任何分贓式的和平會議的無可避免的痛苦。爲了自拔，莫洛托夫堅決主張四國外長會議的最後決定權和三分之二制，這給了貝爾納斯一個良好的戰略地位。他從英、美提出一個遷就小國的折衷方案，即：（一）以三分之二多數制通過之建議，可保證四強將予特別重視；（二）以普通多數制通過之建議亦可提交四強，惟力量較輕。』貝爾納斯還特別僞善地主張：『小國應有機會發表渠等對於以何種和平方式加諸軸心敵國之意見。』結果，莫洛托夫的意見，不僅完全失敗，而且還令蘇聯在小國面前成了『強權政治』的替罪羔羊。失敗後的莫洛托夫也只好『安然接受失敗，並未施用蘇聯之慣技而步出會場。』（合衆社巴黎七日電）

程序問題好容易勉強解決。照理應該立即討論到會議的內容。但當意大利和約剛剛提出時，南斯拉夫爲了『加強投票力量』，『要求阿爾巴尼亞參加和會』，於是又引起一個軒然大波：『西方國家』立即提出一個反建議，認爲『阿爾巴尼亞之申請入會，不能單獨予以考慮，而須與反軸心多少直接有關之國家墨西哥、古巴、埃及、伊拉克、盧森堡等國之申請同時審核。』（巴黎十日電）結果，一致決定邀請阿爾巴尼亞、墨西哥、古巴、埃及參加討論對意和約。但沒有表決權。這顯然又是蘇聯外交上的一個失敗。

這就是差不多一個月的和平會議的成績。

作者當巴黎和平會議之前夜，在本誌第四期『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的『時事評論』中，早已預測過：『蘇聯之參加這個會議，比之她以前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情形，更像一個人丟入一個鱷魚潭中』。『會議之爭吵將更激烈和紛擾，但克林姆官的外交家始而強硬終於讓步（或更正確的說，以強烈的、拉拉扯扯的爭鬧掩飾一種爲勢所迫的讓步）的『路線』也許表現得更精彩，結果或許貝爾納斯從中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幾句話，在事變的規律中竟成了今天的鐵證。

事實上，這種會議，除了表現社會主義國家屈服於資本帝國主義，弱小民族屈服於強國之外，就是赤裸裸的犬儒主義底外交作風的『互相暴露』。而在這一點上，莫洛托夫則遭遇了更大的失敗。

七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響亮持久的鼓掌聲中』發表了一個毫無掩飾的報復演詞，他向所有戰敗國的人民如是說：『我們必須明瞭，和德國同盟的國家必須担負他們的統治階級所犯的罪行。』這種不分皂白的懲罰精神，貝爾納斯立即表示不很同意，他認爲英、美並不企圖『引起奴役與剝削』的賠償。莫洛托夫堅決地擁護『四強的決定權』，而英、美則向小國表示：『強國的地位是不可忽略的，但小國的利益也應該同情。』結果，莫洛托夫的大儒主義外交詞令，一步一步的鞏固了貝爾納斯的僞善的救世主地位；莫洛托夫一天一天的孤立起來，而貝爾納斯則一個一個的把那些無告的小國家納入自己的懷抱裏。

關於這個充滿爭吵而絕少結論的和會，我們十分同情那些不耐煩的巴黎人對它所開的頑笑，『他們說，和會謀致和平所需的年月，正和德國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一樣長。』到底這些『戰勝國家是在創造建設性的和平，還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前獲得喘息的機會呢？』這些『幽默』的巴黎人問。（大公報巴黎特派員十八日電）根據目前的情形看來，大概是後一着比較接近事實吧。因爲正當巴黎和會想鄭重地開始討論『和平』時，美國佔領軍與南斯拉夫的邊境衝突、關於達且尼爾海峽問題的蘇土衝突、英國突然出兵伊朗南部與蘇聯之陳兵伊朗北部、巴勒斯坦之緊張局勢……完全掩蓋了巴黎和平會議場裏的喧嘩聲了。那末，人類需要締造和平，顯然應該把希望放在這個『獲得喘息機會』的和會之外的革命勢力；正如『各大強國』也在這個『和平會議』之外磨拳擦掌，準備第三次大戰一樣。（海明）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

陳人白

『經濟危機』，『經濟崩潰的威脅』，現在差不多已成了全國各報章雜誌、各業團體、各黨派、甚至私人談話或街談巷議的題材。除了國共的內戰問題外，在現時再沒有像經濟危機問題這樣普遍地強烈地引起全國人民的注意、焦慮、和恐慌了！

八月十日，上海各工商業團體，爲了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曾推舉代表團赴京向政府請願，當時雖不會得到任何具體的答覆，但政府當局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之下，隨即宣佈了提高『外匯』百分之六十五（即國幣對美幣，從二、〇二〇提至三、三〇〇元），並允許取消出口稅。然而當外匯被宣佈之日，全國的物價即瘋狂地沸騰起來，經濟危機遠遠沒有獲得挽救，而全國人民的生活担負却又飛躍地增加了！這樣，經濟危機的每一度『挽救』，將變成爲經濟危機的逐步『加深』，其結果非走到經濟的總崩潰，引起全國人民的大災禍不止！

要避免全國經濟的總崩潰和人民的大災禍，就必得將面正對着現實、客觀地探索當前經濟危機的真實情況，它的嚴重性，尤其是它的真實原因，然後『对症下药』。否則，有如一個走方郎中，既不懂病人的病況，更不知其病因，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或『剋肉補瘡』，結果必至將病人的性命完全斷送而後已。不幸，不但現時當局的經濟政策，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乃至剋肉補瘡的醫療法，就是一般所謂經濟家和政治家們對救治經濟危機所提出的種種方案或意見，也絕少能跳出走方郎中的窠臼！

我們爲責任心所驅使，對此有關全國人民的實生活和命運的經濟危機問題，不得不將自己的觀察和意見提供出來，以便引起人民大眾及一切有識者們的注意和研討，共同負責來挽救這一迫切待發的足以造成大災禍的經濟總崩潰！

當前經濟危機的實況

當前的經濟危機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先讓我們從事實上來略加考察和分解一下吧：

在現代社會中，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主要是由它對外貿易的關係來決定的。如果對外貿易是出入相抵，則它的經濟地位能保持平衡；倘使出口超過進口，它便佔了優勢；反之，它必處於劣勢的地位。再如果它的進口遠超過出口，則它在國際上不但一定要倚賴經濟優勢的某些國家，而且它的國內經濟生活勢必日趨枯竭，而至於不可收拾，——這已成了現代經濟學上的鐵律。我們的國家，近百年來的對外貿易差不多（除了很短的期間）都是處於入超。正因此，我們在國際上便變成了半殖民地，而國內的經濟生活則陷於停滯和衰落（尤以農業爲最）的狀態中。然而我們的『入超』從來不曾達到今日的驚人程度！

據六月份滬海關總稅務司署所發表出口統計：進口貨價值總額一千二百二十六億一千五百三千元，出口貨價值總額六十七億一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元，入超達一千一百五十九億零二百六十九萬五千元；與五月份之入超額七百零二億七千三百零九萬一千元相較，增加達百分之五十。六個月來入超總額共達三千一百二十四億六千五百六十萬零四千元。按六月份之進口總額數爲戰後海口開放以來之最高額，較五月份之進口數增加四百十二億之多，而六月份出口貨則反較五月份出口減少四十三億八千餘萬元。七月和八月份的海關統計尚未發表，但依五六兩月的趨勢看來，入超即令不增加，至少也不會減少。

像這樣的入超如果繼續下去（我國的經濟政策如不予以根本的改變，將不可避免地要繼續下去），且不說國內的工商業將要趨於總破產，即整個國家的財政經濟及全部的國民生活也定將陷於致命的貧血症！因爲它（入超）有如一個吸血鬼，並且越來越兇，勢必將全中國的經濟血液吸盡爲止。在現時，還可依賴『聯總』的救濟費以資救濟或靠一些外債以資彌補。但救濟費只是暫時的性質，而外債不僅有條件，必須逐步償還，且不是無限的。所以這筆入超的漏卮再繼續下去，無論如何是絕對無法彌補的，——這是當前中國經濟危機最主要而又最致命的根因。

對外貿易驚人的入超，同時也就是表示外貨驚人的無限制的傾銷。這種

傾銷的後果，必然是加速國內工業的破產。

我國的工業基礎，一貫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壓抑下，原極薄弱，何況又經過了八年戰爭的殘酷破壞！在抗戰期中，淪陷區不少的工業不是遭受日帝魔手的摧毀，就是被迫自陷於停頓了。在大後方，雖然被移植了或重新建設了一些工業，但為數無幾。自日帝屈服後，一方面，從敵偽手中取得了頗為龐大的工業設備，同時又獲得了『和平』，工業理應可以恢復生產和開始發展了。但異常不幸，從敵偽接收來的工業不是任聽停頓和糟踏，就完全變成了官僚們的壟斷物，轉而壓抑並阻害了民營工業，於是民營工業不但無法恢復，反而日趨衰落和破產了。再加上外來美貨的傾銷，便愈益加速了民營工業的破產。

關於我們戰後的工業情況，異常缺乏調查統計的可靠數字，現在只能從報章雜誌上披露的東鱗西爪，摘錄一些出來作為例證：

勝利一年來，重慶一千四百家大小工廠，有一千以上的民營鋼鐵工廠，化學工廠、機器製造廠、麵粉廠、紡織廠的倒閉。昆明有半數以上的工廠破產。貴陽也有一千以上的工廠要關門。所有大企業都要國營。政府雖然屢次聲稱扶植民營的決心，但事實適得其反。（文匯報八月十五日）

這一段報導雖甚簡單，但至少給了我們關於所謂大後方戰後工業破產的一個輪廓。現在且進而監視一下所謂收復區的工業中心上海，在戰後的工業情況吧：

上海民營機器鐵工廠大小約九百多家……均係局部開工，開工率僅佔三成；經濟部接收敵偽一四八家，復工者只四十家。民營工廠所做亦大都是零星工作，由於一般工業的不振，洋貨價格的低廉……今後維持日覺不支，全部破產之期已不遠。

上海化學工業共有七十家以上……惟已大部停頓，現尙開工者不足十分之一……外貨競爭，市價不敷成本……中國化學工業本甚幼稚，現受此打擊，更陷於一蹶不振矣……

電機工業……即綢廠，本市有三百四十餘家，戰前共有機器七千二百餘台，月出絲綢十七萬疋。現剩織機五千五百餘台……月產僅三萬餘疋……原料及工資則每月上漲，成本高於市價，故大都陷於奄奄一息。

上海絲綢工業為抗戰中損失最慘重之工業。戰前共有絲廠四十四家……戰事發生……被毀達卅三家之多。戰後絲業衰落，只剩……五家……現合豐等三廠已復工繼續。惟照今年繭工工本，繭絲不僅無利可圖，且將大為虧蝕……

捲烟廠為上海重要工業之一，現加入公會者有七八十廠，雇工人三萬餘人，……近因受洋烟傾銷及淡月，產量日少，減工者頗多……舶來香烟之傾銷，對國產高級香烟極為不利，惟低級烟則因價格關係，尚能維持……惟開支成本日增，而烟價則反趨下跌……長此以往，低級烟成本如增至舶來烟市價相仿，則烟廠均要倒閉……

製藥業為中國新興工業之一，抗戰期間因舶來西藥斷絕，對抗戰及社會頗多貢獻，新藥業本身亦蓬勃一時……惟勝利後，西藥成品之無限制進口，已使新藥業類於破產之境……

計織業為家庭式之小型工場，上海現有五九三家……現因交通及外匯低落，銷路呆滯，價格不振，而棉紗原料，利息之資無不昂貴，故明虧暗損，成本已逾市價……故資力薄弱者已紛紛停閉，現開工者不到二百家，其中勉強維持的不足一百家，其餘亦在風雨飄搖中，僅因工人解散不易，故尙勉強殘局耳。……以上均自『經濟週報』第二卷第二十五期中摘出

上面所摘引的，僅僅是上海一部份工業的恐慌情形。此外，除了紡紗業較能維持甚或大賺其錢外（如『中紡』下的各廠，因壟斷美棉及國家銀行的低利資助），其餘的一切工業，如玻璃、火柴、染織、水泥、毛織、電器工業等等，無不越來越陷於窮迫和危機之中。上海的工業已是如此，則其他大城市如瀋陽、北平、天津、青島、廣州、無錫、杭州等等，更是等而下之的了。例如中央社杭州本月十三日電稱：『浙省綢業倒閉者已有六十五家，達總數四分之一，布業倒閉者亦有十餘家，其餘亦奄奄待斃。杭州工業正臨空前前的危機』。實際上，不僅僅是杭州工業正臨空前的危機，就是全國工業也已臨到空前的危機了！

我們工業經濟危機的實況已是如此可怕，現在讓我們來略檢視一下農業經濟的情形吧。

我們的農村經濟，遠在『八一三』以前，久已陷在貧困、恐慌、和破產的泥沼裏掙扎。抗戰發生後，無論在淪陷區或大後方，我們的農村經濟，經過敵偽的兇殘壓榨，貪官污吏的無情勒索，土豪劣紳的盡量吸吮，地主們的任意剝削，再加上農產品出口的停止，已經臨到奄奄一息的階段了。我們試舉四川的農村經濟來作一個例證：

抗戰以前，四川在地方軍閥混戰之下，田賦被預征到民國六十年和西北諸省的頻年旱荒，人民整千整萬斃斃的事實，當為我們所熟知吧！抗戰期間，四川成為支持抗戰的主要根據地。陝、甘為了特殊的軍事情形，農村負擔遠比戰前為

高。而這些加重的負擔最終又大部份落在農民身上，他們的生活自然更艱苦。……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但大多數的農民都靠包穀粉做成的餅或甘薯充饑，大米是無法嘗到的。衣服是破得不能蔽體，並且很少有穿得起草鞋的，旁的可想而知。……農民過着如此貧困的生活是誰都不會相信的吧！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在土地關係上。因為四川是土地所有權和耕種者脫離得最徹底的省份之一。……在四川農村中，佃農和半自耕農要佔到農民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純粹的自耕農大約在百分之六七光景，……

抗戰對於四川的農村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呢？……第一、是農民負擔的加重。三十年起，田賦調歸中央徵實物之後，原賦一元折穀二斗五，實際的負擔因之加重。……名義是由地主負擔，實際都轉嫁到農民身上……第二、是穀物騰貴影響於分配的不平均。……因為農民對於收穫物除了繳納地租之外就不夠自己的，……青黃不接之際，糧價的上漲，正是促使他們走上高利貸之路，……第三、是高利貸的盛行。近年來……每年國庫對於水利借款和農貸的支出都是幾千萬或幾萬萬的鉅數，其中四川佔了大部份。不幸的事實是這些措施却得相反的結果。所謂農貸必須經過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轉手，放款的條件又必須要農產品和土地的抵押。信用合作社既操於保甲長之手，即使他們肯公平辦理吧，貧苦的農民拿不出抵押品來。所以政府的低利放款，在一轉手之間變成了地主官僚的高利資本和囤積資本，反而加強了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力量。……第四、是不良的兵役行政對於農民的擾害。……因了辦理役政人員的貪污作歹，有錢人的子弟遂得有種種方法可以逃避兵役；因之，所謂壯丁幾全是貧苦農民來充當。而壯丁待遇的惡劣是盡人皆知的，……任何人都怕當壯丁，因此形成了農村中大量瀕臨壯丁逃亡的現象。結果是原來對於土地利用最徹底的四川農村也發生了許多荒地，農產俱減，尤其是受政府統制的棉花甘薯為最。……（以上均引自『經濟週報』第二卷第三期九—十一頁）

抗戰以來農業經濟的變化與農業生產的縮減，正說明土地問題的嚴重存在與日趨深刻化，給予農村生產的打擊是如何的巨大和深刻！抗戰增加了後方農業生產的可能，……但八年來的後方農業生產，却不但沒有發展，而且反而一天一天地減縮。即以四川論，也在大前年到去年短短三年中，冬季作物面積從六千萬畝減少為五千七百萬畝，夏季作物面積從七千九百萬畝減少為七千六百萬畝……（『經濟週報』二卷二期九頁）

前面這幾段話，描寫的雖是四川農村在抗戰期中受到影響和變化的簡略情形，但大體說來可以代表全國。所當注意的是：大後方其他各省的農村情形，只有比四川更壞；而在淪陷區的各省，不用說要更壞得多。

戰後一年來的農村經濟，由於日帝的退出，照理應當有若干改善。但慘酷的事實是，不但毫無改善，反而日甚一日地變本加厲地趨於惡化了！

關於惡化的實際情形，各種雜誌及報章上，差不多每天都有記載，為了避免麻煩和多佔篇幅起見，在這裏且不再事摘引，只將幾種最重要的促使農民及其經濟愈益陷於惡化的事實，略敘如下：第一、自各式的接收人員和軍隊到達收復區後，他們即與當地土劣甚至漢奸份子相結合，以各種各樣的藉口向農民索款徵糧，而且層出不窮。第二、繼則以普遍徵收軍米的名義，使全國農民最後的一粒米，最後的一滴血也壓榨了出來。第三、現在正以徵實物的名義，去榨取農民所有的產物。第四、再加上國共不斷的內戰，在戰爭區域及臨近戰爭地方之農民遭受到何等的擾害，榨取，和犧牲，那是更難以言語形容了！此外，而且在農村經濟上佔着主要地位的，是：絲茶的無法出口，使得經營這種農產品的農民們完全陷入絕境；同時因為美棉的大量進口，又迫得種植棉花的農民們走進死巷。

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農民們已經到了無產可破，早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因而我們的農村經濟已經不是什麼『危機』，而是早已走在『崩潰』的途中了！

在我們的經濟上，除了工業和農業已陷於異常嚴重的危機甚至已走在崩潰途中外，還有整個國家財政的危機。這危機的集中和具體表現，便是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家的財政，從來就是一團糟。什麼『預算』，什麼『收支相抵』，簡直是廢話。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全靠苛捐雜稅來敷衍。而中央政府，則除了苛捐雜稅，濫借外債外，就是濫發紙幣，而現在差不多全靠印刷機來支持了！直到此刻為止，我們的紙幣究竟發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就物價的不斷狂漲，即幣值的不斷猛跌看來，其數量是異常之可驚的。假如依此無限制地濫發下去，事實上也將無限制地濫發下去，則我們的通貨勢必達到第一次大戰後的馬克，或這次大戰後的匈幣和希幣的悲慘程度！這是擺在我們前面的一株最最可怕的威脅情形。而且在這種通貨不斷膨脹的進程中，工商業和農業經濟危機的任何挽救方案都是談不到的，事實上只能愈來愈加深工商業的經濟危機，直至總崩潰而後已！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我們的國家已臨到全國經濟總崩潰的邊緣了，如不急起直追地來謀取根本解救的方案，歷史的大災禍就要降到我們這個民族，我們全體人民大眾的頭上來！

危機的原因及其性質

但究竟要怎樣才能解救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呢？要想得出正確而有效的方案，就必須認真地科學地理解此種經濟危機的客觀原因及其性質。

就對外貿易的入超說來，很清楚地是關稅不能自主的問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正因為海關權操在「客卿」手裏，關稅不能自主，於是進口貨物只能任聽外人為所欲為地運輸進來。因而我們的國家也就成了帝國主義國家傾銷貨物的自由場所，成了已趨衰老的帝國主義抽取經濟血液的輸血者，反之，帝國主義國家却成了我們民族工業的致命的競爭者。這種情形百年來已是如此，現在不過是顯得更為強烈罷了。

造成工商業經濟危機的另一根本原因，乃是國內市場的日趨衰頹和縮小。而這種國內市場日趨衰頹和縮小的問題，最後說來，乃是農村經濟日趨衰敗的問題。因為我們工商業的先天的落後性，既遠不能在國外同先進國家相競爭，它的存在和發展便只有依靠國內市場，即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來支持。然而我們的廣大農民們，既由於種種的壓榨而陷入了破產的深淵，他們的購買力差不多已等於零。於是我們的城市的工商業便在國內市場上完全碰壁了。至於農民們之所以不斷破產，除了天災人禍（如戰爭）及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種種殘酷的勒索和榨取之外，最根本的就是缺乏土地和資金。為了一點得一塊土地來耕種，便不能不忍受地主們最苛刻的納租條件；為了獲得一點必須的資金，便又不能不聽任高利貸的剝削。因此，即就解決城市工業的國內市場，提高農民羣衆的購買力說來，歸根結蒂還是一個土地問題。所以我們又可以說，農民的土壤問題不解決，國內市場是無法恢復和擴展的，因而我們的工商業也是絕對沒有前途的。關於這一點，較有經濟知識和眼光的外國官員們也已隱約看到。例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就曾說過：「中國困難之根本，在於缺乏某種經濟改革；尤其在農村與捐稅方面，關於中國之工業化，論者頗多，若無各種改革——其中基本目標之一，為增加中國農民之個人收入，……則中國發展工業一事，對於中國人民將無意義」（見范氏去年十月十二日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上的演說）。雖然范氏不曾明白說出土地問題，但了解決土地問題外，「增加中國農民之個人收入」，是不可能的。

促成當前經濟危機之又一根本原因，就是最貪婪、最腐敗和最無能的官

僚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一般官吏都只知「陞官發財」，只知如何想出各種各式的苛捐雜稅乃至敲詐勒索的巧計來榨取人民。如果一種國有企業落在他們手裏，則更是千方百計來營私舞弊，以便自飽私囊。此種榨取人民和營私舞弊的邏輯後果，自然是自身日趨於極端腐化與絕頂無能。這雖然屬於政治的範疇，但這種官僚制度對於民族國家的經濟影響却是致命的。戰後一年來，這官僚制度可說已發展到空前的離奇古怪的程度了！正因此，也就愈益促進了和加深了戰後的經濟危機。假如沒有這種腐惡的官僚制度，我們的經濟絕不至弄到現在這樣可怕的程度。例如：我們從敵偽所接收過來的頗為龐大的工業機構（單位在二千個以上），假若自始即有計劃地利用來努力從事生產，並加以協助民營工業，很有可能使戰後的經濟很快獲得某種恢復和改善。然而我們的官僚們，始則用封條去接收，使正在生產的許多工業全歸停頓。繼則一把抓過來，變成為一種壟斷居奇、操縱市場物價、破壞民營工業的工具。這就叫做「最有利益的東西變成為最有害的東西」了！

最後，繼續加重戰後經濟危機並使之絕對無法獲得任何喘息機會的，是國共兩黨在一年來所不斷地進行的內戰。倘使戰後沒有此種內戰，交通一定可能逐漸恢復，城鄉的物品也能逐漸流通，通貨當不致像現在這樣膨脹，因而物價不會這樣高昂，糧食不會這樣恐慌，則戰後的經濟情形是少能獲得一點恢復和改善的。由於國共兩黨的內戰，竟使戰後的經濟加速地走到與「恢復和改善」的完全相反一方面去了！

上面所敘述的，乃是引起、促進、和加深我們經濟危機的幾種根本原因。其他的許多原因，如交通停頓，通貨膨脹或物價高昂及糧食恐慌等等，多半是從上述的根本原因派生出來或促成起來的。

從上述的根本原因看來，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已不僅僅是由戰爭造成的一般破壞和物資貧乏所引起的危機，而是由長遠的歷史所積聚下來的危機因素與由戰爭所產生的危機因素有機地結合起來的總危機，——這種危機與任何帶行性的經濟危機大有區別，這是一種社會結構性的經濟危機。換句話說，我們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是由我們近百年來的國際地位和國內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機構所逐漸醞釀着的，現在不過是在戰後一個較為特異的環境下蓬鬆發露出來而已。

解救之道

如果根據上敘危機的根本原因及其性質，則現時政府當局及各界人士所提出的種種挽救方案意見，就會立刻顯露其弱點來。例如：提高外匯百分之六十五，用意以為由此可以限制進口，增加出口。殊不知海關權仍在『客卿』掌握，不能自訂保護關稅、自行統制進口貨的情形下，不但絕不能阻止外貨的傾銷（如美貨的價廉物美，即在經常情況下，國貨也是絕對無法與之競爭，何況在現時？）且因國幣的不斷膨脹，物價的不斷高昂，這種『提高』的作用也只是暫時的。一等到一般物價高漲至現時所訂新外匯的水準時，這種外匯的提高就完全失其作用了。取消出口稅，在現時幫助出口的作用更小。因為現時農產品（如絲、茶、桐油等）或某種工業品之所以無法出口，是由於我們的成本遠超過了國外市場的售價（如絲價即超過三分之一），而出口稅所佔數量甚微，即令取消，對於出口貨殊少裨益。此外，如上海各工業團體所要求的二千萬元工貨，以為藉此可以醫治當前的工業危機。實際上，這同提高外匯的作用相類，至多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一般工業的存在絕不能靠貸款來維持。何況貸款的弊端很多：它一方面將促使通貨大大地膨脹（因為現時政府的貸款只有靠印刷機），轉而會立刻刺激物價的高翔；同時，貸款經過官僚與某些與之互相勾結的工業家之手，大多數真正的工業家們不但很難獲得益處，反而會幫助官僚們經過少數工業家乘機來操縱民營工業；或者更壞些，像茶貸和糧貸一樣，簡直變成了少數人營私舞弊的工具。因此我們認為要想真正地來解救當前極端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免趨於總崩潰，便必須從根本上着手，用大刀闊斧的手法，立刻從底下的幾個基本方向進行：

一、關稅完全自主。按照整個國民經濟的實際需要製定關稅保護法，並統制進口貿易，獎勵出口貿易，務使進出口趨於平衡。這樣，不僅可怕的入超漏卮可塞，而且本國工業亦真能避免外貨傾銷的侵襲。

二、解決土地問題，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和高利貸，使佔全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貧苦農民羣，由於獲得足夠的土地及脫離封建式的榨取而能提高其生產力。這樣，不但農民大眾本身的生活獲得改善，而且由於購買力的提高，可大大地擴展城市工業的國內市場，開闢其發展的廣大途徑。

三、廢除貪婪、腐化與無能的官僚制度。各級官吏應由各級民選代表會議推選或任命和監督。人民有檢舉任何不法官吏和付諸懲戒之權。只有如此，才能澈底肅清貪官污吏，納政治於軌道。也只有如此，一切國有企業才不

致為少數的官僚資本主義者所把持，而成為提高國民經濟水準的槓桿。

四、立刻停止國共兩黨的內戰。兩黨的紛爭，應聽候全國人民公斷。只有如此，人民大眾才能獲得喘息機會，交通才有可能恢復，通貨才有可能停止濫發，城鄉物資才有可能流通，正陷於嚴重危機中的工商農業經濟才有可能獲得解救的初步條件。

五、要想上敘四項基本的辦法獲得實施，必須立刻依照真正民主的普選制，由全國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舉行國民代表會議，並賦予以全權來解決上列有關整個國家民族命運的基本問題。

現在經濟的危機已與政治的危機匯聚一起了，所以經濟的危機必須從政治上來解決。這是解救當前經濟危機的唯一道路。我們希望全國民眾立刻認清這一道路，並聯合起來堅決地向這一道路進行！

——完——

信孚實業公司

工业化原料大營本

福州路四三一號
電話一七九四六 一七九七四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

郭大力

如果利息的支付對於物價會發生影響，這種影響只能通過下述三種關係中任何一種關係來實現。即：（一）利息的支付也許會影響商品的價值；（二）利息的支付也許會影響貨幣的價值；（三）利息的支付也許會影響商品的市場關係。

以下的討論，就是循這個次序進行的。

對於這裏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一般的解釋是：利息必致成爲商品價值的追加部分，所以，高利息率將以較大的追加部分，加入商品的價值內，低利息率就以較小的追加部分，加入商品的價值內。

利息是由一個生產者支付，或由一個非生產者支付。就一個生產家（無論是爲生存而生產的還是爲利潤而生產的）所支付的利息言，利息必須出於生產物的價值，是自明的。甚至就一個非生產者（例如地主或政府）所支付的利息而言，這種利息也結局必須出於生產物的價值。當我們證明地主支付利息的源泉是地租，政府支付利息的源泉是稅收時，我們必須進一步，說地主的地租和政府的稅收，也是出於生產物的價值。各種所得，已經存在的和正在形成的，都須由生產過程出來。利息地租和稅收，是和工資和利潤一樣，由生產物的價值支付。

問題是在這裏：就一個生產者說，利息的支付會不會使商品價值提高，那就是利息會不會成爲價值的增加部分。

這個問題，對於一個對古典派經濟學稍有認識的人，實際是不成問題的。但這個問題，實際却是從古典派經濟學開其端。在這裏，我說古典派，主要就是指亞當斯密。

我說利息的支付不會成爲商品價值的增加部分這一點，對於一個對古典派經濟學稍有認識的人不會成爲問題，是從如下一點說的：斯密認商品價值只分解爲工資利潤和地租，說工資利潤和地租才是根本的所得源泉，利息不過是一種派生的所得。依他說，利息不是出於工資，就是出於利潤，再不然

，就是出於地租。因之，利息不成爲價值的要素，但成爲由工資利潤或地租派生出來的部分。在借者爲工資勞動者時，利息是出於工資；在借者爲產業家時，利息是出於利潤；在借者爲地主時，利息是出於地租。因之，利息率的上漲，只影響借者（無論屬於何種身份）的收入，而不致影響商品的價值。

但我們也祇從這一點，說利息的支付會成爲商品價值的增加部分這樣一種意見，實際是從古典派經濟學開其端。斯密主張商品價值定於生產上支出的勞動量之後，又說它等於它所包含的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總和。勞動價值學說，無形中，變成了生產成本學說。依照後一種學說，一種商品有多大的價值，就看曾經在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形態上，支出多少。商品價格的高漲，有時被歸因於工資的上漲，有時被歸因於利潤率的上漲，有時則被歸因於地租的上漲。

如果地租能成爲價值的構成部分，利息自然能依同一方法，成爲價值的構成部分，因爲地租由產業家支付時必須說是利潤（剩餘價值）的部分，利息由產業家支付時，必須同樣說是利潤（剩餘價值）的部分。在這限度內，利息和地租有相同的性質。它和地租一樣要由產業家直接佔有的剩餘價值去支付。所以，只要地租可以成爲價值的構成要素，利息就同樣可以成爲價值的構成要素。這就是說，如果承認地租的支付會使商品的價值提高，則利息的支付將會同樣使商品的價值提高。

若干後期經濟學者，實際曾引出這樣的結論。斯密說工資利潤和地租是價值的構成部分之後，他的後輩就認爲還有第四個構成要素，那就是利息。

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更深入的考察一下。

勞動價值學說歸結到這一點：一個商品有多少價值，由它生產上必要的勞動量來決定。價值量是由生產過程決定，而不是由生產過程以後的分配過程決定。在分配以前，價值的量已經由一個和分配關係相獨立的過程決定了。價值量的決定，必須視爲前提；價值的分割，必須視爲是結果。因之，利息在它是由生產物的價值支付時固然是商品價值的部分，但這個部分，和任

何其他的一部分一樣，不能說是價值構成的原因，只能說是價值分割的結果。這種分割，在資本私有權存在的社會，乃是必然的。

所以，承認價值由商品生產上必要的勞動量決定，一個商品的價值就不能不由工資的高低，利潤率的高低，地租的高低，引起差異，且也不能由利息率的高低，引起差異。在我們是說農民的生產時，利息的存在，使農民必須由其所實現的價值中，以一部分，付給高利貸者。在我們是說資本家的生產時，利息的存在，則使產業資本家必須由其所實現的利潤中，以一部分，付給貸放的資本家。在二場合，都只有價值的移轉，而不能有價值的變動。利息率增加了，商品價值不會增加，不過借了錢的生產者的收入，將會減少；它減低了，商品價值也不會減低，不過借了錢的生產者的收入，將會增加。

使這個真理在外表上被人懷疑的原因，有如下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在我論商業價格時曾予以指出。這種現象是這樣：在我們的農村社會，實際的售價價格，和利息率持有一種特別的關係。把市場狀態的影響除開，單有利息率的存在，已經可以改變商品的實際售價價格。這個現象，是由這二種特殊的情形引起的：

(一) 農民所生產的諸種農產品，全有一種節季性。這種有節季性的生產品如要在一年內經常依照劃一的價格來售賣，如下一個條件將成為必要的：生產者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在實際價格低於價值時，拒絕把他的生產品售出。

(二) 農民一般是負有債務的。他們往往在收穫以前已經把農作物的價格支出了。生產物的急遽的售賣，已經實際為債務的壓迫所規定。農產品一離開生產過程，就有走上市場的必要。這樣走上市場的生產品，必致走入以囤積為牟利方法的商人手中。在我們的農村社會，這種商人至少要為他的商業投資，要求當地通行的利息率。

因有這兩個原因，這樣一種現象，才成為必然的：假設通行的利息率為週年百分之二十四，並且把其他一切引起變動的原因抽象，則十元一石的小麥，在六月間出售，將只售七·六元，在十月間出售，將只售九元，但在次年四月間青黃不接的時期，實際才可以售賣十元。因有利息率之故，商品售價價格，在其他一切條件相等時，在上市之初期會最低，但逐漸增高，而與其價值相等，乃至比原有的價值還更高。『生產建設論』中『論商業價格』

一文可以參看。

只要這樣說，我們已經知道，利息的支付，只會成為不能自持的生產者不能要求充分價值的原因。利息的存在，也就分明只有關於價值的分割，而無關於價值的決定了。

這種說法，是可能引起辯論的。照我說，農民會依照價值以下的價格售賣，但一般的說法却以為，農民實際是依照價值出售，但囤積的商人是依照價值以上的價格售賣。照我說，利息的支付會成為售價價格低於價值的原因，但照一般的說法，則利息的支付，會成為價值增加的原因。

對於這一點，不能不有說明。

如果其他一切條件相等，今年五月間穀物的售價價格，和明年五月間穀物的售價價格，會近似相等。照一般的說法，這個事實，就表明這個售價價格，即是穀物的價值。如果自此以後穀物的實際售價價格將逐步上漲，則必然的結論是：以後各個月的實際價格，就會在穀物價值之外，持有一個追加額。這個追加額，在利息率最高的地方會最大，而在利息率較低的地方會較小。比方說，如果利息率是百分之百，則五月間一石售賣五元的穀物，將會在次年四月間售賣十元。如果利息率是百分之二十，則五月間一石售賣五元的穀物，將會在次年四月間售賣六元。

我必須指出這個事實：逐漸增加的售價價格，不只囤積的商人可以享受。一個有堅持力的農民，是同樣可以享受。在農村，這樣一種特徵的現象必須被注意：農產品的售賣者，可依其售賣時間的先後，分成若干等級。最貧窮的農民，往往搶先售去他們的收穫物。但等這一批人當作售賣者從市場消滅時，一批處境更好的農民，才隨在他們後面，出現在市場上。大體說來，處境最好的地主，總是在價格達到最高點時，才成為實際的售賣者。如果最貧困的農民所許得受的最低的售價價格，必須認為是商品的價值，則在商品的價值中，不但可以包有價值的剩餘，並且可以包有生產者維持其生命和生產所必要的價值。如果工資可以代表生產者維持其生命所必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就可以不包有完全的工資了。最窮苦的農民在其收穫物進來立即將其出售所不得接受的最低價格，在多數場合，如果不是不足以代置所投下的資本價值（把種子肥料等等的價值稱為資本價值），就是不足以維持生產者的必要的生存。這個斷論，可以由一個貧農在沒有奇蹟的場合，幾乎永遠不能翻身這件事，得到確實的證明。如果說這種售價價格，實際即是他的

的生產物的價值，那是和任一個合理的概念都相矛盾。在生產物的價值中，連生產者維持他自身所必要的價值，也沒有包含！

這個似而非的結論，還可由工業品的考察，來破除。工業的生產，大體說，沒有節季性。但價格週期下落的現象，在一個高度發展的產業社會，通常也可以看到。在銀根緊急，尤其是在恐慌時，物價是會下落的。第一有這種現象：總支付日期的迫近，使多數廠家和商家，必須以『廉價』方法吸引現款。『大廉價』表示一種節奏。第二，有這種現象：當恐慌十年或五年發生一次時，跟着恐慌的襲來，物價會劇烈的一般向下落。當前一種『廉價』只是暫時的現象時，因恐慌而起的物價下落，則是比較長期間的。在這場合，生產家或商人也只因有支付的必要，才肯受此犧牲。設有人認廉價時期或恐慌時期的售賣價格為價值，價值對於生產家就必然成為可怕的事項了。

貧苦農民不能要求充分價值的現象，只有這樣去說明：對於一個負有債務的農民，由利息負擔所引起的損失，和由低價求售所引起的損失，在結局上，必須成為均衡的。利息的壓迫所以必致造成低於價值的售賣價格，也正好是因為價格低落的損失，在多數場合，是和利息負擔的損失相等。也就因為如此，所以利息的壓迫越是重，則低價求售的競爭必定會越激烈，從而，售賣價格低於價值的程度必越大。

以上的論述，歸結到這點：利息的支付，即在最嚴重的場合，也不致成為價值增加的原因，而只造成價值與實際價格的背離，造成實際價格之週期的下落。

對於這裏提出的第二問題，經濟學上一種常見的看法，是這樣：在利率與貨幣價值之間，存有某種因果關係。使這種見解發生的一件事是這樣：像人們混同商品的價值和它的使用價值一樣，人們常常把貨幣的價值和它的使用價值相混同。利息的生出雖然由於貨幣的使用價值，但很容易被認為是由於貨幣的價值，以至當利息率高時，我們會說貨幣價值高，當利息率低時，則說貨幣價值低。

這種奇特的命名法，和近代社會通行的觀念極為符合。能帶來收入的東西，常被稱為有價值；能帶來收入的性質，則常被稱為價值。這在一切以利潤為目標的社會內，原是極平常的。但我們必須知道，任何一物都不能由它的價值性質，生出更多的價值。我們說貨幣會生出更多的貨幣時，要知道，

貨幣雖然是有價值的（沒有價值的東西，根本不能充做借貸手段，）但它能夠如此，不過因為它有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明白的說，不過因為貨幣可以成為資本的物質形態，成為資本的物質負擔者。能要求利息的，不是貨幣，只是貨幣的資本性質。當作貨幣，一百盎斯經過一百年也還是一百盎斯。只有當作資本，當作生息的資本，一百盎斯，比方說，才會在一年的經過中，成為一百十盎斯。

我們說生出利息的，不是貨幣，而是資本，還因為資本的性質，不一定要固着在貨幣上面。不僅貨幣的貸出可以生出利息，穀物或其他實物的貸出，也可以生出利息。不僅貨幣可以生出更多的貨幣，穀物或其他實物也可以生出更多的穀物或其他實物。如果就穀物（或其他實物）而言，利息的生出不是由於穀物的價值，而是由於它當作資本物質體的使用價值，則就貨幣而言，我們的看法應當是同樣的。

所以，認利率定於貨幣價值的看法，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的關除，有賴於價值性質的理解、貨幣性質的理解、和資本性質的理解。然當我們以正確的價值學說、貨幣學說、和資本學說，來指摘這種錯誤的見解時，近代社會的現實狀態，却似乎在為通常的見解——利率和貨幣價值間有某種因果關係——提出某種的說明。

可資以辯護這種見解的事情之一是：十六世紀以來新大陸諸金銀礦山的發現，以及開採方法的改良，確確實實的，使金銀價值下落了，從而使貨幣價值下落了。同時，產業資本的支配，則使利率受支配於產業利潤率；資本構成的高位，又使產業利潤率下落，從而使利率不得不下落。貨幣價值的下落和利率的下落，是同時發生的。這種同時性，自然使人們覺得二者中存有某種因果關係。

可資以辯護這種見解的事情之一是：在產業社會，我們每在一定期間，發覺貨幣價值的暫時提高，和利率的暫時提高成為一致的。

這個狀態應當這樣說明：貨幣有支付手段的機能。首先，貨幣對於勞動力就是支付手段。因為，勞動力的交付每每在先；貨幣的交付，無論勞動力是單純的還是複雜的，通例要依照一定的時期（一星期、二星期、或一月）實行。稅（例如房租）也有些要依照一定的時期支付。其次，普通的賣買，也有時是用貨幣當作支付手段。商品交付之後，當作商品代價的貨幣，才依照約定的日期交付。最後，貨幣還在如下的場合，成為支付手段。

，通例有一定的償付日期。因有上述諸種情形，我們看出了一種特徵：社會對於貨幣的需要，有一種週期性。這種週期性，第一，要隨貨物航運的期間來決定。在航海有一定班期時，從海外來的要求兌付的滙票，無論是採取見票即付，還是採取見票若干日後兌付的形態，總使大量輸入品的貨價，集中在一個日期支付。這個情形，因有更進步的交通工具（例如電報）的發明，才和緩下來。第二，那要隨各種支付的日期來決定。在工資每半月支付一次時，我們發覺，在每月十五日和最後一日，必須有大量貨幣，實行支付出去。在房租每三個月支付一次時，我們看出了同樣的情形。第三，我們還發覺，在一年中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所謂總結算日。在這總結算日前幾日，銀行金櫃通例是只許有入流，不許有出流的。

支付的集中，會引起什麼結果，那是每個營業界人都十分熟悉的。銀根奇緊！籌碼不足！不要等這種情形的極度發展，市場對於貨幣的需要就已經大大增加了。債權人全體立即要求償付貨幣的要求，使債務人必須忍受一切犧牲，去籌辦貨幣。負債人只有削價以求商品價值的實現。物價會一般向下跌。物價的一般下跌，使我們說，貨幣的市場價值或相對價值已經上漲。但同時因為每個人都要把貨幣收回，每個人都要取得貨幣，不願削價求售，還可以要求得到融通的人，將迫得以較高的利息率，向金融業者哀求。利息率會因此而變動；結算日前和恐慌期間，利息率會因此而大大上漲。

所以，在這場合，貨幣價值暫時上漲時，利息率也暫時上漲了。這種時間上的一致性，也似乎證明貨幣價值和利息率二者間，存有某種因果關係。最後，還有一種事情，同樣可以造成幻想，不過幻想的內容是全然相反的。這件事情，在今日我國，是每個人都很熟悉的。那就是，在貨幣價值不斷下落時，利息率會向上漲，並以驚人的程度向上漲。當人們預料貨幣價值將下落或不斷下落時，每個人都覺得，放出的貨幣將在一定的時間過程中，失去它原有的價值一部分。這就是紙幣發行額的過度膨脹。當政府為財政目的把發行額增大時，這樣的循環每每會成爲必然的：財政不足，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再引起財政不足。貨幣價值必致繼續下落。在情形是這樣時，發放精神的消滅會成爲必然的。本來會以種種方式成爲貸放資本的東西，將流入其他用途，尤其是商業的用途。利息率就因此提高了。貨幣價值的繼續下落，和利息率的提高，在這場合，成爲時間上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也造成一種印象，好像在貨幣價值和利息率

間，持有某種關係。

對於上述三種事情，我們有略加考察的理由。在第一場合，貨幣價值下落，利息率同時下落。說這種同時性純然是偶然的，當然也有錯誤。如果沒有金銀礦山的大發現，很可能，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要延遲的。所以，我們指出利息率在這時期的下落，是由於產業資本的支配時，我們也有理由，指出利息率——貨幣價值的下落和利息率的下落——的同時出現，有某種必然性。但這種必然性，顯然不能被解釋爲因果性。在這時期，貨幣價值的下落，是由於豐富金銀礦山的發現，開採方法的改良等等，但利息率的下落，全然是由於不同的理由。

再說第二場合。貨幣價值上漲（由物價一般下落的事實指示的），利息率也上漲。這兩種現象會在支付集中的時期，尤其是在恐慌的時期，同時發生，也含有某種必然性。在這場合，使物價一般下落的，和使利息率上漲的，是同一件事情：支付的必要。但也正因爲是如此，所以二者只能說是同一個原因的諸結果。若說其中一個是別一個的原因，那就分明是錯誤的了。再說第三場合。貨幣價值下落（由物價一般上漲指示的），利息率則向上漲。我們必須說明，在這場合，上漲的利息率，往往不過是原價值損失的一種賠償。表面上較高的利息率，可能只是實質上較低的利息率。但我們若只就表面上表現出來的情形看，我們就得到一種既然和第一場合相反，也和第二場合相反的事例了。貨幣價值下落，利息率反而向上漲。

只要指出貨幣價值的變動不能成爲利息率變動的原因，就不用着再要指出，利息率的變動，將影響貨幣價值，使其一同變動了。實在說，從來的經濟學者，固然很多人說貨幣價值決定利息率，但很少人曾經說，利息率決定貨幣價值，除非把貨幣價值單純解爲貨幣生出利息的能力。

對於這裏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利息的支付，也許會影響商品的市場關係——我們以上的說明，已經提示了一種答覆。利息的支付，會造成實際價格與價值的背離，使負債的生產者（主要是農民），不得不接受價值以下的實際價格。就其本身說，那就是由於一種市場關係。就我們的農村社會而言，在穀物收穫以後一個時期，穀物的銷售量是只有減少，而不會增加的。理由極其明白：我們的市場，直到今日，尚有最大一部分，是由農民的需要構成。他們所收穫的穀物，雖然要依種種法律上的理由，流入社會上別一些階級

的人手中，但不可否認，他們還能够把少許保留下來。反過來，穀物的供給却是增加了。農民們爲供應自身生活而保留下來的穀物，有時也須在忍受大損失的情形下，流到市場上來。

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就是負債。就是債務加在他身上的利息負擔。所以，只要這樣說，我們已經知道，利息的支付，怎樣會影響市場關係，並由這種影響，來影響物價了。

不過由以上所述，利息率的影響所造成的市場價格，只是暫時的市場價格。只要農民自己保留下來的少許穀物完全售賣出去，使物價暫時下落的原因一成過去，情形就會轉變過來的。

由下一點看，利息率的影響所造成的與價值相背離的市場價格，還不只是暫時的。因爲，由這種影響，變動的，不只是供給與需要的暫時的比列。這種變動還將成爲長期的。這是因爲利息率會影響生產者的狀態，並由這種影響，在一個長期間內，減少商品的生產和供給。

由前一點看出的利息率的影響，是暫時壓低商品的市場價格；由這一點看出的利息率的影響，却是在相當長的期間，把市場價格提高。

這個原則，是值得鄭重提出的：利息率反映生產者的狀態。首先，與產業社會比較，農村社會的利息率是較高的。農村社會的生產者，一般是貧窮的。他們爲要維持他們的生存與生產，只有以高利息率向人貸借。

其次，在同一個社會，在一般農民生活異常貧窮時，通行的利息率會較高。較貧窮的農民所出的利息率，也較高。

最後，在產業社會，我們又發覺，產業愈進步，利息率會愈下落。兩個產業社會，可因產業發展程度有差別，而在通行的利息率上發生差別。不僅如此。在同一個產業社會，利息率也會在一般要求支付的時候提高。

但單是說利息率反映生產者的狀態，分明還是不夠的。利息率會影響生產者的狀態。

每一個對於農村社會有幾分瞭解的人，都知道，高利息率在如何妨礙生產的發展。確實的，爲求生存與生產的繼續，再高的利息率，農民有時也願意忍受，因爲他們不得不忍受。但當高利息率在生產物價值中吸去的部分太過大時，農民的生產必將由如下的方法，受到影響。高利息率的存在，使他們無力適合於耕作狀態，而配備適量的肥料。如果肥料購買所必要的貸款的利息，居然會吞滅加用肥料所獲的全部結果，加肥的動機就消滅了。在這

裏，且不說農具的添置和改良了。農具的破壞也將因利息率過重而被視爲無關重要。耕牛將被賣去，但不再有新購或飼畜一頭的動機。農產品一經出來將被售去，以期減輕高利貸的壓迫。農民和他的家族，將被迫生活在困苦中。必要的生活資料將感缺乏。勞動效率將大大減低。增產的動機將被粉碎。高利貸會使每一種足以使耕作進步的設備，成爲不可能的；使每一種足以使耕作物保全的設備，成爲不可能的，甚至使耕作成爲不可能的。生產萎縮，遂成爲必然的了。

再說產業社會。在一個產業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是用巨大的生產投資來購買這個命題，在生產力主要是由機械的採用和進步來促進時，將會更明白。昂貴的機械，要用資本去購備。每日大量消費掉的材料，也要用資本去購買。且不說資本這個部分（即購買機械材料等等的部分）的增加，將如何影響利潤率了。當這個部分的增加有減低利潤率的趨勢時，我們必須知道，這種趨勢會在實際上得到遏止，因爲資本這個部分的增加，包含着生產力的進步。生產力的進步可以從如下一種意義，增進產業家的利潤：勞動者在一日勞動所生產的價值中必須自行消費的部分，行將減少。

然當生產投資的增大不致在實際上引起利潤率的減低，從而，不致妨礙產業家投資的動機時，過高的利息率則必然有這個結果。無論產業家投下的資本是不是他自己所有的，我們總發覺，這種資本必須要求利息。在這種資本爲別一個人所有時，利息的支付是一件明白的事實。然在這種資本爲他本人所有時，利息也會成爲計算中一個緊要的项目。這是應當這樣解釋的：在他投資所獲的總利益中，只有一部分被稱爲投資的利益，其餘一部分必被稱爲利息。這種利息，在他不親自投下資本而以之貸借於人時，也是可以取得的。所以，企業利益與利息的分割，在一個親自投資的人的計算中，也須存在。這樣一種現象會非常顯著：利息率越高，直接投資的利益將會越是小。從而，在利息率高的情形下，直接投資的動機將會減小。生產力的可能的進步，將成爲不可能的。

不僅如此，在高利息率足以威脅產業利潤的存在時，（除非這種威脅只是暫時的，例如在恐慌的場合，）原有的產業規模也將被縮小。在生產手段能够賣出的場合，將有人情願把它們賣出，而僅憑貸借的方法，來增加收入。或者，他們會從事各種投機，而不願經營產業。這種情形，在我們若干大都市上，是極流行的。結果也是生產的萎縮。

生產萎縮的直接結果是供給減少，但只要充分的時間，我們就發覺，它還有這個結果：生產將更困難，從而，使市場上一個較大部分的供給，必須在更困難的條件下，供給出來。

上述的意見，可以綜合的敘述如下：

(一) 利息率與貨幣價值無必然的關聯。

(二) 利息的支付，不會直接增加商品的價值，但因過高的利息率將妨礙生產的發展，所以在結局上有提高商品市場價格的趨勢。這在農村社會和產業社會是一樣可以看到的。

(三) 利息的支付，會影響市場關係，並從而影響市場價格。這種影響，表現為物價一般的週期的下落。這在農村社會和產業社會也是一樣可以看到的。

【後記】求真雜誌以容納『國內外各派系的思想』相號召，而要以相互的批評和自由的討論，來達到『求真』的目的。我以為，辯論是重要的，但現實的客觀的考察該是更重要的。缺少客觀性和現實性的議論，是極易流於曲解的。因之，當我被『拉伕』，而以上列的並無深義的理論考察，寄到一個只會通過幾次信的編輯人手裏之後，我願意指出，我們農村中通行的利息率，已經高到什麼程度。我目前是住在農村，所以我只要說我確實知道的事情。我是由如下幾件事，來判斷我們農村中通行的——不是例外的——利息率。穀每石平均價值一萬五千元時，預買價格通例是五千元。料糖每百斤依照現價可售六萬元時，預買價格最高是二萬元。食油每百斤平均價值十萬元時，預買價格最高是四萬元。從這幾個例來看，我們農村中通行的年利息率（因為那些農產品都是一年生產一次的）是百分之二百。這樣高的利息率，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呢？一個農民無論怎樣勤勉節儉，也沒有方法，可以維持他的生存與生產於正常狀態中。這是一個暴風雨的徵兆。這件事，決不是坐下來討論可以解決的。

Established in 1917

密勒氏評論報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has earned a recognized reputa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and impartial views, unexpurgated news reports, and fair, unbiassed reviews. Stay up to date by regularly reading China's oldest and most popular English-language weekly. Enter your subscription toda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60 Chung Cheng Road (E),
Shanghai.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a period of 3 6 months, for which I enclose \$

Name:

Address:

(Street)

(City)

Rates:—Shanghai & Outports, 3 mos., \$6000; 6 mos. \$11,000.
Outports (airmail):—3 mos., \$8000; 6 mos. \$15,000.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

劉少巖

一 日本何以失敗

去年八月間日本投降之際，那些慣於爲任何新的經驗所俘虜的新聞記者們，總把日本投降歸功於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不久之後，莫斯科又憤然出來爭辯說，紅軍解決關東軍才是戰勝日本的第一等因素。但這種無意義的外交爭吵很快便沈寂下去，因爲連像尼米查這樣的頭等『原子』戰略家也迫得承認：原子彈之類的次等因素只盡了促成日本投降的作用，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給了『日皇一個投降的口實』，遠在原子彈與蘇聯參戰之前，日皇已決意而且實行準備投降了。

『那末，是什麼原因令日本戰敗呢？』——羣新聞記者包圍着那些準備投降的日本將軍們，提出質問。這種含有戲劇性而又富於歷史意義的質問，使那些『武士們』狼狽不堪，他們大多數以沉默來搪塞，有幾個則害羞地、機械地背誦『原子彈與蘇聯參戰說』，另外幾個則較爲率直地承認日本科學過於落後。只有很少數的例外，譬如今井少將，他於九月八日南京簽降的前夕，對中國一位記者概括而又扼要地指出：『日本戰敗的原因乃在日本資源不足，且無運輸力量資助作戰。加以工業極度落後，實無法繼續戰爭。』這透露了一點子真理，雖然並不是很完全的。

假如我們向日本官場去詢問這個問題，我們只有更失望。雖然有不少議員在議會裏提出類似的質問，但總是得不到什麼答覆，日本的統治者彷彿覺得這種問題是不便加以明確的答覆似的！但提出質問的議員們自己也是害怕觸到問題的核心。去年九月四日，在日本第八十八屆臨時議會中，提出較有系統的質問的貴族議員蘆田許博士，也僅只把日本戰敗的原因歸之於『日本地位之孤立』、『當局對於官吏之整飭不當』、『領袖失却堅強的意志』、『作戰技術之貧乏』、『人力之誤用』、『糧食政策之處置失當』等等、

而且致死呢？我們想向這些剛剛還滿口『日本必勝』、有系統地麻醉日本民衆的騙子們得到什麼真實和完滿的答覆，那當然是徒然的。

我上面舉出的那位今井少將的見解事實上也不是他一個人所獨有的，也不是戰爭完全失敗之後才發生的。在日本統治階級的較下層中，甚至在投降之前夜，已有人公開而且坦白的指出這個『聖戰』不可避免失敗的原因了，當然，這也是僵硬的事實碰破了他們的頭的结果。一九四三年四月，那個時候塞班島還沒有失陷，日本艦隊僅僅在菲羅門羣島遭逢第一次消耗戰的打擊，她的歐洲同盟者——希特勒也剛剛只受了頭一個挫折，但一位日本的企劃院調查官(目下籙吾)已覺得有足够的理由對『聖戰』抱悲觀了，他在一個名叫『工業組合』的雜誌裏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昭和十四年以來』發生的『縮小再生產的惡循環』直到一九四三年還保持着，接着他便指出戰爭已加緊對『國民財產』和『國民收入』進攻，使牠們陷於枯竭。他又證明日本從『速戰速決』被迫而轉向『長期戰』與『消耗戰』是含有毀滅性的，絕不是貧窮的日本經濟所能支持的。不錯，日本軍閥會誇耀他們獲得了中國和南方的莫大資源，但另一位日本的作者紺野忠二在『日本戰時經濟展望』一文中立即指出：日本『欲在共榮圈內取得所需原料資源，則今後至少須用幾百億的資本，和二三十年的時間，才能達到。』這話是說，日本不可能開發『共榮圈』的資源了，因爲她的『數百億』僅有的資本早已投放於戰爭中，而二三十年試驗的機會是不會得到歷史老太婆的允許的。不僅如此，日本想利用現成的資源也逐漸顯得無望了，因爲她缺乏了三分之二的船舶來維持『共榮圈』內的交通，一九四二年末，那位有名的大東亞省青木大臣，在『共榮圈』內巡視了一番之後，失望地承認：『把目前大東亞建設的難關，統歸之於運輸二字，亦無過言。』於是他小心地做了一個計劃，以東京爲中心，以上海爲半徑的終點，劃了一個圓圈，將來一切重要資源，如煤、鐵、鋁、石

動半徑顯然已把這黨最後的公共案圖一也包括進毀滅圈了，從此以後，我們有理由相信日下俯首的悲觀主義在統治階級裏像瘟疫似的蔓延起來，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日皇何以那樣急於求和。

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久已被一些有科學良心的觀察者準確地預斷過了。一九三九年，本文作者在另一個地方曾寫過這幾行：『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準備長期的戰爭來應付中國民族的長期抵抗（這裏包含着中國民族在新興階級領導下進行長期革命戰爭的遠景），和應付未來的世界大戰。但日本帝國主義的脆弱基礎又是最經不起長期震動的，她尤其經不起一個打擊！那末日本的命運多半在重蹈着沙俄的覆轍：這是悲劇，但這是無可挽回的宿命的悲劇！』一九四三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正為初期的勝利沖昏了腦袋的時候，作者又寫下這幾句話：『日帝劫奪中國及大英帝國一部份遺產的輕易成功只是一種取巧的結果，這種結果雖然可以一時抬高了她的軍事權威，但這種權威本身的價值並沒有多大裨益，恰恰相反，日本的軍事權威愈為一些輕易的勝利吹脹起來，則她愈難經得起認真的考驗。只須遭逢一度嚴重的失敗，她將如一個肥皂泡一樣破散得無影無蹤。』只須遭逢一度嚴重的失敗！假如我們現在事後拿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證明，則塞班島的失陷無疑就是這個預言了的『嚴重的失敗』了。

一種準確的預言並不是建築在一種主觀的願望和偏見上，而是以科學的分析為前提的。日本資本主義由於出生太遲，她便無力造成强有力的金融基礎與重工業基礎，更無力解決她的緊張的土地問題。一種高度集中的輕工業資本與封建性的農業結合着，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生長的根基。正因爲農業一貫衰落後的關係束縛着，廣大的農民便缺乏購買力，而日本資本主義也就恒久受狹隘的國內市場窒息着，迫使她一方面靠廉價的勞動來營養自己，另一方面便是靠不斷的對外擴張和掠奪來緩和國內這種充滿爆炸性和痙攣性的危機。但是推動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那個脆弱的經濟基礎恰好就是她命定要失敗的原因！這句話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在那些深愷歷史辯證律的人們當中才得到理解，但今天，連那位野蠻的少壯派人物今井少將也懂得把戰敗的原因歸之於日本經濟的『衰落』了。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與經驗主義，有歷史良心的人與一羣騙子的區別。

二 戰敗的日本經濟

這次含有災難性的戰敗對日本經濟到底損害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當然更無法從日本官場方面得到確切的答覆。他們害怕對人民說出失敗的原因也自然害怕對人民清算戰敗的後果。據一位美國官員的較為公正的觀察，因爲轟炸的結果，日本至一九四四年已完全缺乏石油、鐵礦土和鐵鐵了。一九四一年積存的兩百五十萬噸鐵礦也臨近耗光了。在絕望中，日本政府發動了一個歷史上最瘋狂的搜集廢鐵運動，放熱器、水管、浴盆……凡是鐵器都應有盡有的搜括起來。其中受犧牲最大的就是棉織業，戰前一千三百萬紡錘，只剩了兩百八十萬了。一小部分被炸毀，但大多數却充當了廢鐵。『工業剖腹自殺的最大例子便是最新式的織機破壞』，這位觀察者嘆息說。我們不要忘記，紡織工業是日本經濟的最重要的基礎。

日本工業所受的第二個毀滅性的打擊便是商船的損失。日美大戰之前，日本保有六百三十七萬六千噸船隻，戰爭爆發初期，她還奪取了一些敵國船隻，而且一九四四年以前，她還每年可以製造一百萬噸。但一九四四年末她僅剩了三百七十五萬噸，即損失幾達一半了。投降的那一天，日本只保有九十萬噸能用的船隻，另外六十二萬噸則待修理，而且所剩的船隻大都是噸位很小的！日本國民收入五分之一拿來償付輸入，回頭更靠輸出來彌補。而海上貨運收入却占輸出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事實上，一個島國而缺乏船隻，只須想一想，就知道這件事嚴重到什麼程度了。

日本雖然是個輕工業國家，但她却要負擔一個巨大無匹的消耗戰爭，這迫得她遠自一九三一年便逐漸把輕工業犧牲，而培養一種以重工業為骨幹的戰爭經濟。輕工業對投資總額的百分比年年減退，而重工業部門則由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一五升至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四五。往後，隨着日美戰爭的擴大，這種改編當然更形激烈。這就難怪，日本的重工業直到今天尚保有相當力量，我們不要忘記，日本工業之遭受破壞，出於自殺性的比較出於B.I.G.的轟炸者所占的百分比更大。日本的鋼鐵工業尚保存百分之七十。機械工業受破壞者僅百分之二十五，機械工具業僅受百分之十五弱的破壞。機械工具較之一九三一年以前約多五倍至六倍！電力廠和鐵路交通則幾乎全未受損。日本發電約百分之六十二用水力，百分之三十八用燃料，水力發電站大都散佈於山谷中，所以不受空襲影響。日本的造船工業雖受了較嚴重的空襲，但最近已大部恢復，如果充分利用，同時可造鋼鐵船一百七十六艘，摩托船二千隻。這就是一班觀察者公認爲戰後日本優於德國的地方，有些人甚至

還拿這次日本戰敗的地位與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相比擬，這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根據波茨坦宣言與最近鮑萊調查團的報告，日本工業中充作賠償而準備加以拆除的正是這些保持較完整的重工業部門，事實上，失去了殖民地和外擴張的機會，日本這些在戰爭中畸形地膨脹起來的軍事工業只成了和平時期一個嚴重的負擔。

大體上，中國一位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官吏所下的結論是對的：「日本工廠在戰時的損失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十。」這裏我們當然還要加上整整萬萬勞動人口的外傷。

但農業的遭遇更是致命的。日本國內每年的正常收穫尚可供給最低限度食糧的百分之八十五。但因爲全國農村壯丁不斷被驅入屠場（關於農村人口的喪失至今尚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農業用之肥料化學品均改充軍用，再加上暴風的摧殘，日本去年的收穫成了一九〇九年以來最低的數額，但一九〇九年日本人口僅有四十八百萬，現在則達到八千萬了！今年日本人每人僅能得到一千三百七十五卡羅利熱量，但剛投降時日本人尚能獲得一千七百五十卡羅利，而日本政府估定的最低限度熱量還要達二千一百六十卡羅利哩！據日本官方的預算，從去年十月起，往後十二個月中至少要輸入四百七十萬噸食糧（包括食鹽）。日本這種農業的恐慌如果與日本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對照起來，愈顯得嚴重和難於忍受。日本地主所有土地在三十畝（一町步）以上的僅占農家總戶數的百分之二五·三六，但他們却佔有全國耕地面積的大半，他們都是兼營高利貸和小商業的，他們完全過着一種寄生生活，他們把土地零細的佃租出去之後，便不負任何生產上的責任，而每年從農民的收穫物中抽取百分之四十或七十的地租，農民稍稍反抗，他們便隨便取消他們的佃租權。日本農民的百分之三是零細佃農，這一點證明日本的土地分配如何不合理。在這種零細的土地上面，農民是不可能進行什麼生產的改善的，不穩定的佃租關係更使他們不敢想起這着。這就是日本糧食年年不夠的原因。往日還可以依賴於朝鮮、台灣和南洋食米及中國東北大豆的彌補，現在一旦失去這種外來的接濟，日本食糧恐慌當然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而戰敗後，日本土地問題的解決成了輿論的焦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工業破壞與農業破產的最高表現便是財政的陷於完全崩潰之境。戰爭中及戰爭後各國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大抵不出三個：（一）赤字公債之年年增

消耗。在這幾點上，日本顯得格外厲害。遠在一九四〇年她的負債總額已達二百七十億，而公債總數百分之八十是金融機關承銷的。至於物資的窮竭，我們引證一位美國觀察者的話：『美國第狄羅的赫德生商店比之全日本保有更多的消費品。』爲了彌補公債與應付因爲物資窮竭而引起的物價高漲（主要是黑市），於是通貨膨脹急促成了惡性，一九四一年末，日本銀行已發行五萬九千萬紙幣，去年八月末增至四十二萬二千萬，去年末又增至五十六萬萬，但到今年六月末已突增至四百億以上了！大多數消費品就在這種惡性通貨膨脹的威脅之下，逃入黑市場，形成了公債與黑市價之間的愈離愈遠的距離。這種可怕的趨勢使大多數日本人民都遭逢致命的打擊。

最後，工業停頓、農村破產、和通貨膨脹還引起一個更迫切、更嚴重的問題——失業。數百萬士兵的回國使日本的失業隊伍成了一枝龐大的飢餓軍。沒有職業，沒有住家，沒有糧食及其他日用品的供給，這是過去『大東亞聖戰』所賜給日本人民的災難，我們形容日本爲一個臨近爆炸的蒸氣鍋，難道還算過分嗎？

三 誰負戰爭的責任

這是任何戰敗國人民所最迫切要知道的問題：誰負這次戰爭的責任？昨天日本人民受了蠱惑，深信戰爭會使他們得到無窮幸福的機會，現在這種海市蜃樓全行破滅了，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被驅入失業、飢餓和死亡的地獄中，許多朋友、妻子、兒女和親戚故舊都死了，殘廢的殘廢了，美好的田園廣舍變成廢墟，他們宛如一匹受騙而瘋狂疾馳的野馬，突然撞着現實的牆壁，碰破了頭，現在正以難於遏止的憤怒來找尋這個空前大災難的責任。

去年九月四日，那位有名的近衛親王在議會裏大肆咆哮，說：『東條政府曾欲騙日本人民，對我們說日本仍然有極大力量，但我們實際所有的遠較他們所說爲少。那個時候，任何人都以爲我們必能勝利，以致造成今日之無政府、無飛機、無人力而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日本。我們犧牲一切，所獲得者是我們的失敗恥辱！』十分動人！可惜，我們的記憶不錯的話，近衛却是侵華內閣的首相，假如一九三七年侵略中國的戰爭是一九四一年日美戰爭的前奏，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否認近衛文麿是東條英機的前驅！大概這件事是過於明顯了，他不久便跟着東條之後，被列入戰爭罪犯的黑單，因此也就

於是一些失意、無能而空過戰爭機排擠的政客便被擡到前面，企圖挽回整個官僚制度的危機，特別是幣原，因為他說過『日本佔領滿洲無異吞掉一顆炸彈』那句名言，便成了日本『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先知式的首領，吉田因為是他的學生，當然就成了他的使徒，於是官僚們爭先恐後地加入這個虛幻的『自由主義』的集團，每一個人都竭力搜尋自己過去贊助『自由』和『民主』的孤單例子，只要有一些象徵式的表現，他們就可以大聲爭辯，認為自己確實是戰爭的反对派。

日本的戰戰兢兢的財閥和大實業家們當然也趕快加入這個烏有的『自由主義』合唱班，九月十三日，日本七個大實業家爭先恐後向記者聲明說：他們『曾於戰前告知日本軍事領袖，日本實業不能支援總力戰。他們且曾於戰敗後申述這件事，但不敢多言，』爲什麼呢？因爲，因爲『害怕被拘或被殺！』

當聰明的外國記者們追問一下究竟時，這些心虛的『自由主義』英雄便立即低頭招認：『是的，我們並沒有一個人被囚過，而且沒有一個人曾在日本企圖獲致勝利的戰爭過程中，反對過戰爭。』歷史是不能偽造的，這些罪犯要想成羣結隊的躲在臨時趕造的一所破爛的『自由主義』小屋裏，已證明是徒然，只須一陣實開的微風便足以把牠吹倒。

日本資產階級企圖把戰爭責任推諉於整個官僚政府身上，而官僚們則互相推諉，結果那一羣最無法躲避的官僚便成了『替罪羔羊』，資產階級斜着眼偷看民衆的憤怒平服與否，必要時就利用其他替死鬼。甚至天皇裕仁，到了無可避免的時候，拿一個新的天皇來代替他也並不是辦不到的，只要保證他們能够繼續控制日本的政治經濟權力並能够繼續奴役和榨取民衆，用一句明確的話講來，只要日本的資本主義能够保持。但恰好從這裏，使我們對戰爭責任的問題得出一個無可辯護的解答來：唯一的戰爭罪犯是日本的舊社會制度，這個制度不僅包含天皇的官僚政制及落後的土地關係，而且還包含天皇政制的整個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基礎，這種關係與一切封建的舊關係是不可分離地、有機地連在一起的。天皇本人就是日本一個最大的資本家和最大的地主，他是神道教的教主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總司令，這件事是最富於象徵意味的。清算日本的戰爭責任就是『要求根本改造日本的社會制度！』這句話竟連美國的兩家保守的資產階級報紙——基督科學箴言報和紐約前驅論壇報——也禁不住說出來了，所不幸的就是他們希望美國

六十家放的代理人——麥克阿瑟去實現這個不相稱的歷史任務吧了。

四 美國佔領的政策

美國有一位將軍已率直地宣言：從中國經朝鮮南部到日本東京是美國包圍蘇聯的戰略基地。麥克阿瑟就是到日本執行這個戰略的任務的，但用不着波茨坦宣言的堂皇的指示，麥克阿瑟也充分了解：爲了實施這項計劃，他必須首先把日本的統治階級，連同日本的民衆，加以『再教育』，儘可能去掉一些過於危險的事物，特別是那些足以威脅美國利益的舊事物。但這種『改革』工作又不要過分損害日本的統治制度，否則——否則革命的火藥庫就要爆炸起來，燒燬一切。

波茨坦宣言曾聲明日本天皇制度僅在執行投降的期間，暫時可以存在，將來這一制度的存廢還要靠日本人民來決定的，但從此以後，美國當局便絕口不提這個問題。僅僅在提出戰犯名單的時候，人們才又提起天皇的問題來。天皇本人應否負戰爭責任？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多餘的。他是整個日本舊制度的神化了的代理人，假如他的臣僕如東條、近衛之流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有什麼理由讓這位頭號的騙子和罪犯躲開去呢？但日本資產階級有系統的發動輿論，把裕仁表現爲一個受欺騙、受委屈的孤兒。今年元旦，裕仁乘機向人民撫慰說，他已放棄『神明』的地位，『和人民站在一起』了，這個聲明立即令麥克阿瑟高興起來：『這個聲明使我頗爲欣慰，爲了他在日本人民民主化的過程中將因此盡領導的作用（!!）』，他對將來已經堅決地（!!）採取自由的路線。『盛傳一時的日皇遜位問題，也在裕仁訪問麥克阿瑟之後，完全打銷了，因爲據麥氏的左右解釋說，他，麥克阿瑟，覺得有三個理由不願讓裕仁遜位：（一）日皇已表現與麥師總部之高度合作；（二）佔領工作進行順利；（三）日皇倘遜位，日本內部有發生政治混亂之可能。』最主要的還是第三項理由，爲了畏懼革命不得不保持天皇！這是美國統治者的最坦白的自供，這就難怪他們要與第一號戰犯裕仁保持『高度的合作』，爲了同一的理由他們在菲律賓也與第一號『匪奸』羅哈斯保持『高度的合作』。

波茨坦宣言之另一項諾言是讓日本人民獲得民主和自由，麥克阿瑟也口聲聲要在日本實施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遲至十月四日才下令釋放政治犯及廢除日本的秘密警察制度，延至今年四月十日才匆匆忙忙的舉行一次選舉，但麥克阿塞不僅贊成這次選舉的『中庸』而其實是保守的勝

利，等到五月間日本工人舉行幾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並實行管理生產時，麥克阿塞便立即認爲這些行動『足以威脅日本政府及佔領軍的安全』，並允許日本的統治者乘機將那一道最反動的治安維持法恢復過來，並下令禁止工人管理生產。

波茨坦宣言最着重的當然是解除日本的軍備、消滅日本的軍國民教育、以及解散戰爭工業和財閥家族的獨占事業。這些也正是美國所最關心的，因爲這些東西與過去的反美戰爭連結得太密切了。麥克阿塞在這方面也做得比較起勁。他順利地解除了日軍的武裝，解散了海陸軍省、大東亞省……之類的戰爭機構，解散了黑龍會——這個團體因爲過去太熱中於軍國主義和反美活動了，牠竟要求羅斯福無條件投降，所以便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麥氏又把日本的武器，連同那一副研究原子彈的裝備投入大海，封閉了許多重要的軍事工業，解散同盟社，逮捕那些反美最厲害、野心最大的軍閥官僚份子，並下令各學校改用自由主義式的教育。至對於財閥家族，他也下令清算和解散，並主張『經濟民主化』，但這一項命令可以說是最虛幻而缺乏效果的。最近三井家族已自動的『解散』了，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日本資產階級爲了躲避戰爭的責任，他們是樂於『化整爲零』的，這樣既可以得到掩護，也可逃避一切戰後的担負。事實上，日本三井、三菱等十八家大財閥一貫就操縱了日本經濟的命脈，他們壟斷了一切部門，但日本資本主義之走上這個獨占的道路，與美國經濟之完全落入六十大家族手中一樣，同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社會法則造成的，這些獨占大王們對於利潤的無厭足的追求又造成了戰爭，這已是近代政治經濟學的常識；而消滅戰爭、消滅獨占資本也就等於推翻資本主義，這個命題也是一種不可辯駁的邏輯的結論。所謂『經濟民主化』，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反對獨占，這全是小資產階級企圖叫昨天回來的一種反動的空想，只能盡一種有害的欺騙作用，美國統治者之利用這種理論來安慰日本民衆，企圖攔斷他們走向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並非偶然，而這種實驗之終於變成滑稽和無效，當然也是無可避免的。往後我們將看到，麥克阿塞把土地問題的解決諉之於日本統治階級究竟含有什麼意味。

從短短一年的佔領過程中，我們覺得麥克阿塞佔領軍只代替了過去日本軍部的作用，牠用刺刀監臨在天皇政府與日本人民之上，一隻眼斜睨着日本人民，看他們憤激到了什麼程度，另一隻眼監視着日本統治者，隨時指揮或

牠便急忙喝令止步，但這種假充公正的地位，並不妨礙牠對日本統治階級同情和對日本民衆的畏懼，甚至憎厭。牠對日本統治者說：一次而又永久與過去反美的傳統決裂，我將儘可能拯救你，給你一些寬大的待遇，而且未來的反蘇戰爭中，……我還想依賴你哩！假如需要於政治學中找尋一個富的名詞來形容目前日本的政治形態的話，日本的政治不是民主主義，而是一種波拿帕主義，美國佔領軍代替了往日日本軍部的地位，依賴於日本的僚和警察，靠一些緊急命令維持日本的社會秩序，這個秩序，我們不久就道，正處於革命的威脅中，而波拿帕主義的最大作用，就是在革命前夜的張局勢中充作一根過渡和緩衝的棍棒。我們當然不能忽略這根棍棒是直接

五 日本統治階級

日本政府投降的保留條件是維持天皇政制，這一點至少告訴我們日本主義的利益與天皇政制是不可分離的。舊的傳統拯救得越多越好，這是個沒落的階級在大災難中的共通政策。從這裏我們就不難了解日本資產階在麥克阿塞的面前不僅表現爲一個無辜的孤兒，而且還企圖表現爲一個聰的奴僕，他們總是用極端保守的態度一步一步引導那個陌生的主人去認清本的局勢：火是玩不得的！一個過於破爛的制度必須小心的醫治！一個在全缺乏舊傳統與複雜性的亞美利加式教育中長成的軍人必須在舊世界的紛政治中重新學起。當然，麥克阿塞對這種『學習』並不是很愉快的，這就出了他對東方官僚那種遲緩、懶惰、胆怯、和缺乏氣魄的煩燥的指責。但美國人眼中，麥克阿塞的『左右還是守舊的軍人階級』哩！

不過這一點並不是說，麥克阿塞將完全受日本統治者指引，這是非辯的。麥克阿塞之樂於拯救日本的舊制度僅僅是從整個星球的資本主義利益發，而這種『世界救主』的觀點也不是柏拉圖式的，而是從美帝國主義奴全球的簿記學裏生出來的，這就是麥克阿塞往往將日本資產階級視爲邊鄙鄉愿，不斷加以『鞭策』的原因。日本資產階級無疑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最脆弱因而又是最腐爛底一環的代表，他們在大災難的威脅之下特別顯得痺、無能、缺乏自信并不希奇，假如沒有華盛頓方面的較爲清醒的『動』，我們沒有理由信任他們會苟延性命到現在的。

，首相東久通官立即表示：『在日本境內立即建立民主乃不可能者，因為有重重複雜的問題之故。』廿二日，近衛文麿又重新聲明：『日本人民並無舉行民主普選之準備，因彼等原缺乏政治意識。』一個首相和一個政府的幕後主持人居然敢在民衆的憤怒的情緒之下出來反對民主權利，而且繼續以家長式的口吻宣告人民『缺乏政治意識』，這除了證明這些人的愚蠢和白痴之外，我們得不出任何有利的印象。這就難怪十月四日麥克阿塞一道釋放政治犯和廢除秘密警察的命令，便把東久通官內閣推下台。

所謂『自由主義』的幣原內閣，據說是在『悲觀氣氛中』登台的。他第一天談話便暴露這個『自由主義者』的真正價值：他警告麥克阿塞，叫他對於禁止日本的國教神道教一事，要經過小心考慮。『考慮』什麼呢？『考慮』揭去這件『神道教』的原始和野蠻的聖衣將使人民的眼睛聽見日本統治階級的醜態！一個『自由主義者』竟妄想靠一種最落後，最無知的宗教來麻醉人民，這些人民却在戰爭的廢墟中討論原子彈的教訓！接着，當然，這位『自由主義者』用愛惜『神道教』的同樣情感來反對『裕仁的遜位』及『宮內組織的改變』，他認為這是『沒有理由的』。一切『絕對主義』和『世紀的舊東西都要保持下來，日本的奇特的『自由主義』是需要一個皇朝和一個國教的！還有，這位老耄的政客在中國人民的難於抑制的責難中，居然有勇氣替過去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動機辯護，把一切責任推在中國人民的誤解上面，這一點連美國的新聞記者也覺得有把握預言：幣原內閣是不會長久的。

日皇最初把修改憲法的責任讓之於近衛，近衛被列入戰犯罪單中之後，便把這個任務讓給幣原。日本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代表對這部不名譽的憲法的修改採取什麼態度呢？在他所主持的『修改憲法委員會』中宣稱：『日本憲法是富於伸縮性的，故實行真正民主政府，可以不消改變憲法。』『真正民主政府』可以建立在一部凱撒主義的憲法之上！修改憲法機關的主持人反對『修改』！當然幣原這種白痴式的頑固只是整個的統治階級的心理學上的結晶而已，他是生活在一種共通的心理的氛圍中的，因為十二月二十九日，當無任所大臣松本在貴族院會議席上大聲說：『在原則上憲法無須任何更動』時，議會便『認為滿意』。無論東久通官，無論幣原，他們只是日本資產階級心臟活動的記錄器而已。

難怪麥克阿塞在致美國陸軍部的報告中不滿地指出：『自幣原執政以

來，一切毫無變更。』但當他說到『至於民主，日本人素無經驗，僅有封建主義與全能主義為其背景，幾千萬農民及一般婦女，在政治上可謂一無知識。』這就全是偏見了，皆因為這位將軍慣於將統治者看成為人民的天然的代表之故。其實並不是日本人民不懂得民主，而是幣原之流的統治者以『封建主義與全能主義為背景』頑固地抹殺人民的要求，而，唉，麥克阿塞本人則不幸拿這個口實來幫助日本的『封建主義與全能主義』的代理人！

自去年十二月以來，爲了略略宣洩日本人民那種爆炸性的情緒，麥克阿塞頒布了兩道訓令，第一道命令是限日本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擬具土地改革的實施方案。第二道訓令是規定於一九四六年四月間舉行選舉。這兩個『鞭策』迫使幣原陷於進退維谷中，三月的土地改革法案交了一個不及格的卷，四月十日的不澈底的選舉已足夠把這個『自由主義』的老廢物拋到該去的地方去了。當然，他下台之前還有充分的時間耐心地選擇了自己的繼任者。

從去年八月到今年四月選舉，日本資產階級已有足夠的時間重行改編，竭力遷就新的環境了。她簡單地把那個臭氣薰天的大政黨會還原爲民政黨與政友會，前者改稱進步黨，後者則改爲自由黨，進步黨的總裁町田忠治就是日本侵華初期的民政黨總裁，一九四〇年以後，他又做了大政黨贊會的顧問。這兩個黨全然操縱在過去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者手中，牠們的背景仍然是三菱、三井之類的大財閥、大地主。現在他們把帝國主義的面目收斂起來，拿一些廉價的自由和民主等詞句來掩護自己的利益。吉田臨近組閣的時候才加入自由黨，做了牠的總裁，這表明日本的官僚政府與這些黨棍是連結在一起的，連偽裝的區別也找不出來。

但吉田的自由黨內閣立即暴露牠的眞面目出來，牠立即恢復治安維持法與宣佈工人管理生產爲非法來答覆民衆的革命行動，自由黨的內閣反對自由！關於這一點，我們上面已指出過，牠是得到麥克阿塞的贊許的。

直到今天爲止，短短一年功夫，日本政府已經過三次內閣的變換，除了對任何改革發生頑強的抵抗和怠工之外，牠僅僅起草了一部憲法修正案和一個土地改革法案，這兩份東西充分證明麥克阿塞企圖經日本統治階級去改革牠的統治基礎多麼滑稽。日本資產階級的一八八九年憲法並不是一種任意的選擇，許多人指出牠抄自普魯士的法典，但這也並不是偶然的，因爲日本資本主義的催生婆是封建皇朝，資產階級是封建貴族地主蛻變而成，所以無力

完成許多民主主義的任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土地革命），而民主主義便自然變成了日本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批判的武器』。日本資產階級剛出生就陷於孤立，這就難怪牠一開始就要藉助於普魯士的凱撒主義法典來維護牠的軍事獨裁的權力。現在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後，日本資本主義已陷於死亡掙扎中，人們却希望牠在這個時候能夠做出一部『魏瑪憲法』，這不是有點幻想得稀奇；六月間，吉田交到九十屆議會的憲法修正案是『經過了多次修改的』，但其全部內容只不過是用『人民』來掩護天皇，用較美麗的『民主』詞句來粉飾原封不動的凱撒主義，一句話，用模稜兩可的烟幕來掩蔽資產階級的醜惡的動機而已，這無怪遠東委員會急忙通過了幾項未發表的原則，阻止這件不名譽的修正案被通過了。●

關於土地改革法案，最可以表明美國統治者與日本統治者之間的分歧點，前者從較遠大的資本主義利益着想，覺得不將這個急不容緩的問題加以相當解決，則牠始終會成爲革命的禍根的。『犧牲是必要的！』牠對日本統治者警告着。但後者却在這個舊土地制度中生出了根，牠的物質基礎如是薄弱，牠很難捨棄這種世代相傳的殘酷剝削方法。但在革命的嚴重威脅與美國主人的不斷警告之下，牠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勉強做出了一個土地法案，這個法案規定日本地主保有的土地額爲五町步，而現在耕作中之佃農土地大半除外，農地價格規定非常之高，地主還可以得到補償金，而且，土地的轉讓則交由地主勢力佔多數的市町村農地委員會來處理。結果，牠既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也得不到麥克阿塞的同意。今年三月間，一個新的修正案交到美國佔領軍當局，地主土地保有額已減爲三町步，農地委員會略加修正，但地主勢力仍占優勢。這種修正仍不中用。直到八月十四日，一種最後的修正案才得到麥克阿塞的批准和嘉許。這個修正案規定本州、九州、四國三處，地主僅能保留一町步（約合二·四五英畝）的土地，北海道則限爲四町步，『不在地主』所有之佃耕地悉予強制收買。在本州、九州、四國三地經營三町步以上，及在北海道經營十二町步以上之佃農，亦受限制。政府收買之地主土地，其價格爲全國平均水田一段（○·二四五英畝）七五七圓六角，旱地一段四六四圓九角八分。地主可以獲得實金，水田一段爲一三〇圓。佃農爲購買田地應付與政府之款，水田一段規定爲七五七元六角，旱地一段四六四元九角八分，但得以三十三年間年賦逐漸償還，年息三分二厘。農地委員會由地主與佃農各佔半數，另外共同選出第三者補足之。

表面上看來，這個法案較之去年十二月間的初步法案急進得多了，但實質上這種土地改革所收的效果，對於廣大僱農和貧農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因爲他們要出差不多八千元日金的高價才買到一町步的土地，沒有現款償付，只好成爲政府的長期債奴，而在往後收成不良，高利貸榨取的種種威脅之下，還勢必重新喪失土地，何況除了一塊土地之外，他們還要借一筆生產資本。但農村的富農却無疑得到很大的好處，他除了可以佃租三町步的土地之外，還可以收買一町步的土地，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用合股公司的名義擴大他的田地耕作範圍。日本的地主與富農往往是連成一體的，地主用優越的條件（除了土地價錢之外還有補償金）賣出土地之後，可以把這筆資本投資於工商業和農村的高利貸剝削。而且這個修正案只提到『不在地主』，沒有提到皇室和寺院廟宇的土地，假如這兩種土地除外，則這個改革的價值更值得懷疑。不過，無論如何，日本這次土地改革無疑要引起日本農村更劇烈的變化，麥克阿塞和日本統治者可以取得一班富裕農民的支持，並且在農村中暫時造成一種幻想。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廿二日，沙皇首相史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法雖然一時收到農村分化的效果，但這並沒有阻止一九一七年的勝利的農民暴動，幫助俄國無產階級把羅曼諾夫皇朝推翻。一種遲遲而又不澈底的改革，往往足以鼓勵而不是緩和人民的革命鬥爭。美國統治者和日本資產階級能否把農民從工人階級方面拉開？歷史將給他們一個否定的答覆。●

除了上述幾點之外，日本資產階級無論對失業、糧食和通貨膨脹問題都作不出什麼良好的結果來。八月十日，麥克阿塞又在他的報告中對吉田內閣下如次的結論：『吉田內閣基礎不甚穩固，難於解救人民的困難，故難得人民之信賴。尙未能解決之問題甚多：如地方制度及教育制度之改革，政界肅清令之澈底執行，失業、財政、軍需賠償、修正憲法等重要問題，均未得圓滿解決，尤以修正憲法草案，成爲世人批評之中心。』這無異給牠判了死刑，土地法案不能延緩牠的壽命呢？這很難說，史托雷平也沒有因爲他的

●八月廿五日紐約廣播：日本新憲法已在下院通過。究竟這是六月間的修正案，抑或又是一個新的修正案，不得而知。——編者註。

●蘇聯向日本管制委員會提出之土地改革案也僅限於收買日本地主的土地，但據東京二十五日電：蘇聯對吉田的土地改革案也覺得『其對於地主之土地所有，仍在予以庇護，』因此牠『決不能實現農村改革，乃可斷言。』——編者註。

土地令而得救呀！

六 革命之前夜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便恒久徘徊於兩不相容的前途中：對外的帝國主義擴張或內部革命。從一八六八年至一九〇四年，日本因為受了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推動，連續擊敗了兩個偉大的封建專制主義的近鄰：滿清和沙俄。第一次大戰時期，由於各強國均埋首於歐洲戰事，日本又乘機攫取了許多利益，使她的帝國主義的羽翼完全豐滿起來了。但我們剛才已指出過：日本資本主義因為出生太晚，雖然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走上帝國主義的皇座，她卻不僅把內部的不可忍受的矛盾積累到爆發點，而且還在國際市場得到很少插足的機會，這就是她不得不自始就藉助於野蠻的武裝力量，不斷向外舉行軍事侵略的理由。特別是第一次大戰之後，整個日本已處於向下斜坡的發展，她內部已為空前緊張的工農鬥爭弄得衰弱不堪，這迫得日本帝國主義要對外舉行更頻繁的軍事冒險。而內部革命醞釀與對外戰爭的節拍更緊湊，我們還沒有在別的國家看到這樣的例子。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日本工農鬥爭受了中國革命的影響，已形成本國前夜的局勢，迫得天皇第一次把普選權頒賜給人民，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緩和這一危機，便產生了田中義一的有名的反動奏摺和出兵山東事件。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日本國內又發生新的農工鬥爭的高潮，結果促成了滿洲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起的畸形的經濟復興又造成了一九三七年的第三次罷工高潮，是年七月間便正式爆發了中日戰爭。這是最雄辯的歷史事實，證明日本只有靠對外侵略才能暫時緩和內部的危機，但每一次軍事冒險過後，內部的衝突又瘋狂地醞釀起來，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好還是引證日本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三個鬥爭高點的數字：

年份	罷工次數	參加人數	小作爭議次數
一九二五	一、二六〇	一二七、二六七	二、〇二九
一九三一	二、四五六	一五四、五二八	二、二三一
一九三七	二、一二六	二一三、六二二	

一九三七年雖然罷工次數較之一九三一年略形減少，但參加人數方面却保持牠的最高點，又一九三七年全年農民小作爭議的數字雖然得不到，但一九三六年小作爭議已達五、七一四件，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與一九三六年同

期的數字相當，則一九三七年的小作爭議次數無論如何仍是最高點。這個不很完全的表已足夠證明日本國內一次又一次的走上更兇猛的革命爆發的程度了，而日本帝國主義則為這種愈來愈可怕的內部危機所推動，走上一次比一次更擴大的對外戰爭。這次戰爭的最後失敗究竟含有什麼災難的意味，這在日本的統治者，甚至自宮主人也十分清楚，他們現在所做的正是防止這個不可抗拒的大革命災劫的懲罰，東京戰犯的審判和這種懲罰一比，簡直是一幕微不足道的滑稽劇！

自日本投降後，由於「盟軍當局」有系統的封鎖政策，我們當然很難詳細知道日本內部工農鬥爭的情形。但僅僅根據我們手頭上的一些不完全的材料，我們已可以作出一種較為準確的診斷了。據日本官方統計，自今年一月份至三月份止，工人罷工次數達三百六十七次，而參加人數則達三十九萬二千餘人，比一九三七年全年參加罷工人數還要多！當然前後兩種官方的材料也許是不完全可靠的，但我們作出這樣的分析大抵不會錯：這次戰後工人罷工所捲入的部門更大規模，因此更帶兇猛性和擴大性。譬如本年六月份光是一個郵政大罷工便捲入四十萬工人，這證明我們的推論不錯。還有一點我們是不能忽略的，日本工業在一九三七年還在改編過程中，今天，日本工人已有一個重大部份集中於許多規模甚大的重工業部門中，這也足以改變日本罷工鬥爭的整個陣容。根據過去的經驗，凡是罷工鬥爭從小廠蔓延到大的生產部門，從輕工業發展到重工業，這就表示罷工鬥爭很快就要從經濟性的防守轉向政治性的進攻。最近日本工人鬥爭的另一個重大的特點便是迅速走上工人管理生產，這是從資本家的藉故闕廠怠工中發生出來的步驟。據日本官方的統計，從去年停戰至今年五月，管理生產的事件已有一百零三起，影響的工廠共二十八家，其中最富於象徵意義的便是日本報紙通訊社僱員組合直接監督幾家資產階級大報的事件。牠禁止這些報紙刊登反動的、反勞工的紀載。資本家的一部份權力無疑已落入工會等工人組織手中，而這些管理生產的工人組織就是工人權力機關的萌芽。

今年五一勞動節，日本工人的盛大示威與五月十九日的飢餓大示威，據目擊者估計每次參加人數起碼有五十餘萬。這無異是日本工人階級的一種革命的檢閱，他們高舉紅旗，唱着革命歌，但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他們提出：『按照生活程度規定最低工資！』『民衆管理糧食！』『反對解僱！』『生產怠工和通貨膨脹是喝血的資本家造成的！』這些口號，連同生產管理顯然是工

人開始走向政治攻勢的最有力的過渡口號。

工人的罷工鬥爭馬上傳染到小資產階級隊伍中，東京的市政府公務員也居然仿照工人管理生產的辦法，進行『業務管理』。農林省的員工也成立協會，要求將日本公務機關澈底加以民主化。城市貧民直接進行搜查和分配日本官藏糧食和日用品的事件也發生了。整千人以上的飢餓遊行已成了家常便飯。

農民的鬥爭情形雖更缺乏材料，但資產階級報紙洩露出來的零星記載已證明農民也開始趨向於反對強徵米糧及恢復傳統的反地主鬥爭（小作爭議）。事實上根據過去的一貫經驗，農民的鬥爭總是隨着工人的鬥爭而高漲的。最近麥克阿塞的連迫帶勸的促成了日本政府的土地改革法案，最清楚的反映農土地鬥爭的嚴重性，否則這種讓步起碼還可以延宕一個長時期。

我們重新指出：工人管理生產的組織、工會、各種自發的管理業務、糧食、生活物資配給委員會及農村的農民組織已逐漸開始蠶食統治階級的權力，形成工人農權力機關的萌芽，這就難怪日本統治者那樣仇視日本工農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這種可怕的鬥爭方式。

日本戰後一般的局勢分明含有如下幾個特徵：（一）統治階級陷於無能和完全失却自信；（二）小資產階級趨向左傾，寄同情於工人解放方面；（三）農民爭鬥開始新的週期；（四）工人已逐漸走向政治的攻勢並開始經過管理生產的方式，侵犯資本家的財產。這就是革命前夜局勢所具有的幾個基本的條件。

日本資產階級及其主人企圖一方面採取鎮壓的手段，一方面趕速恢復一些輕工業生產，恢復部分的國外貿易（據官方發表日本自投降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出超已達二千餘萬美元），進行土地的某種改良，……等來分化工農的力量，緩和革命的威脅，但日本幾千萬人民對這一點子可憐而又過遲的『救濟』是很難得到滿足的。過去日本幾十年的歷史趨勢告訴我們，失去了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安全塞，日本只有走向革命爆炸之一途，其他任何應急的改良主義的藥方都不能醫治這個病人膏肓的社會制度！

七 日本的前途

中國的新聞記者近來發表不少憂傷的言論，他們不斷指出麥克阿塞從『雷訓』日本走向『保護』日本，給了她許多讓步，如日本重新得到原料和糧食

的供應，日本漁業擴展至中國海和南冰洋，出口貿易之不斷增加……等等。每一樁這一類的讓步總引起中國敏感的記者們歇斯得里的大驚小怪，他們總是指出：日本走上復興的道路了，將來首受犧牲的還是我們中國。這也難怪，中國人民一貫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和搶劫的對象，現在日本雖然戰敗，但她本身的問題尚未決定，日本資產階級正把這次戰敗視為中國古時的『吳越之戰』，希望儘可能爭取時間。她左手握着內部革命的一張牌，想向美國統治者方面一步一步的爭回自己已喪失太多的陣地，她右手又握着美、蘇衝突的另一張牌，希望將來從這種不可避免的矛盾中收回一切。這些都是日本資產階級的如意算盤。但今天來談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興，還未免太早，她已失去了全部艦隊，所有重工業還握在麥克阿塞手中，至少她那個征服美國的狂妄計劃需要加以嚴重的改正。她的佔領者——美國當局，現在正加倍努力向日本資產階級證明，美國不僅是日本不可克制的力量而且還是她的救命恩人，沒有他，日本資產階級無疑將葬身於革命的火窟中，更壞的，還有落入克林姆宮掌握中之虞。如果日本資產階級需要找尋一個新的安全瓣，美國統治者已在準備一個反蘇戰爭，必要時，日本資產階級可以向這個『無誤』的方向發展，除此以外，留給日本資產階級的機會很少。當然，如果日本將來在新的戰爭的前夜或當中重新武裝起來，這將是一種最危險的步驟，她將不僅有隨時背叛美國的可能，而且中國將又受到更可怕的威脅。

但所有這些可能的、或然的甚至必然的發展還尙處於出發的階段，在這些『可能』實現之前還有充分時間留給日本人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而現在一切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一個革命比之那些壞的『可能』具有無比的現實性，日本資產階級還在爭取時間，日本革命則不僅已有了時間而且已具備了一切成熟的客觀條件了。所缺乏的僅僅是一個主觀條件：一個真正革命的黨。現在在日本民衆中以代表工農利益自居的有兩個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前身就是那個臭名揚溢的社會大衆黨，這個黨的老腐敗差不多全部充當過『大東亞聖戰』的鼓手，他們都有足夠的資格加入戰犯的名單中。現在他們又爭先恐後唱起『民主主義』來了，但他們的政綱和他們的行為却掩飾不了他們的真面目。社會民主黨仍然擁護天皇制度，她認為天皇的保持仍是必需的，爲什麼呢？她不好意思講明白，但我們却十分了解：爲的是保持資本主義的統治。貨幣原將要倒台，自由黨領袖鳩山一郎爲挽救危機的本能所驅使，向社會民主黨提議組織聯合內閣時，她立即表示如果能在內閣

中獲得四席，牠就可以提出名單。僅僅由於內部的不滿，才打斷了這個合作。但往後當共產黨向牠提議聯合時，牠便堅決拒絕了。這表明這個黨對日本資產階級的依賴甚深，牠將來之準備隨時出賣和背叛是無可懷疑的。共產黨自戰前經過幾次鎮壓和打擊之後，尤其是自從牠的領袖佐野學投降日皇之後，久已陷於瓦解的狀態，只有少部分還在活動着，主要還限於中國的『解放區』。自去年末釋放三千政治犯之後，日本共產黨領袖如德田球一等均獲釋出獄，於是這個黨才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受長期監禁的共產黨員都是一些忠誠的革命家，他們還保存一種革命的本能，所以他們出獄之後便如出籠的猛獸，舉行示威，高呼『打倒天皇』！這些天真的革命家還不知道十年或八年的期間，已經過了一次天翻地覆的戰爭，這次戰爭已足夠把許多人，許多事物改變了本性了。他們也許還緊緊記着列寧的教誨：一個無產階級的黨絕不能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絕不能替資產階級負任何政治責任，但現在各國的共產黨都在提倡聯合政府，把這種事視為當然的任務了。又他們也許牢牢的記着往日的黨綱：實行沒收土地歸農民，但管制委員會裏的莫斯科代表却提出了一個逐漸收買的計劃了。爲了這些天真的黨員得到再教育的機會，野坂參三便從延安急忙趕回東京，據說，是取得麥克阿塞的同意的。野坂參三回國的第一個影響便是重新確定一個方針：（一）向社會民主黨及一切自由派提出『民主陣線』的建議，準備成立聯合政府；（二）爲了遷就一般『民主派』對於天皇的『愚忠』，把完全打倒天皇的口號改爲主張『廢止作爲政治制度的天皇制，而皇室的存續與否則由人民決定』。把天皇制和皇室區別開來已够離奇了，放棄了正面的主張而諉之於『人民決定』則無非是放棄責任的妥協表示而已。野坂參三一九四六年初的回國與列寧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回國，構成一個多麼諷刺的對照呵！一個向日本工農提議與資產階級及皇朝妥協，成立克倫斯基式的聯合政府；一個則率直地提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奪取政權的四月提綱，貶責一切妥協的傾向！而在沙皇的俄國與天皇的日本之間我們找不出任何根本不同的社會條件。

事實上，今天日本人民比之以往任何時期都迫切地要求徹底推翻天皇政制的統治，澈底的無代價的沒收皇室、寺院和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沒收戰爭罪犯及所有大財閥家族的財產，充分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召集一個普選的不記名投票的全權立憲會議。但實現這些要求却不可免要全面侵犯到資產階級的財產權，所以日本革命本質上是一個社會主義革

命。這不是任何主觀願望的推斷，而是客觀的社會規律引導到這個結論。共產黨却企圖在這個無可緩和的千瘡百孔的局勢中，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及那個最卑鄙的小資產階級社會黨建立『聯合政府』，而這個未來政府的『改革』還不敢觸到『天皇制度』，這種妥協政策當然要在那些剛剛從『天皇』的監獄中出來的共產黨人中引起不滿和離心的傾向的。今年八月十一日大公報東京電：日本一個著名的共產黨員佐野已另組一個名叫『民主前鋒同盟』的新黨，據說這個組織將來要改爲『工農前鋒黨』，牠的主張是在日本與朝鮮間完成一個社會主義聯邦之永久性計劃。他曾猛烈地攻擊共產黨，『稱其爲保守勢力之爪牙，目的在於引導日本人民走入半殖民地之歧途』。許多屬於德田球一之日本共產黨員，因反對日皇仍保持守態度，或將脫離該黨而參加佐野之組織。關於這個黨的詳細内幕我們還不知道，但這個新黨的成立無疑是日本革命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進步的分化，這些不甘於妥協而尋求澈底道路的革命份子雖然尚在向前摸索中，這個黨也只是代表一種進步的中派主義的傾向，但一個認真的觀察者是不會忽略牠的劃時期的重要性的。日本革命的希望就在於促進主觀條件的成熟，而這個新黨的出現也就是保證實現這個希望的表徵。中國人民要想避免新的災難，必須用一切力量幫助日本的民衆去澈底根絕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全部物質條件！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完

日本無產階級之弱點及其出路

日本工人階級生長在腐臭與卑屈的政治氣氛中，所以牠雖然比中國工人階級年長，牠的政治覺悟力和鬥爭經驗卻遠落在後者的後面。日本工人階級一直到了一九一二年才認真開始組織工會。而牠的正式參加政治鬥爭還是一九二二年。自此以後，日本工人的工會組織才如加速增長起來。但一直到最近，日本工人階級在組織方面還表現得非常薄弱。日本九百五十個工會只有三十八萬工人，即只佔全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七。政治覺醒的遲緩，鬥爭經驗的缺乏，與組織力量的薄弱，是日本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是牠易於受敵人欺騙和出賣的基本原因。日本工人階級長期陷於孤立和無領導的狀態。牠的隊伍中侵入了許多明目張膽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和并不改良的改良派。……今後……日本工農的解放運動……如果想順利地走上勝利的大道，首先必須找尋新的正確的領導。

——摘自一九三九年亞東出版之『顯微鏡下的日本』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

張大重

唐虞世先生先後發表了「維新與革命」（求真第二期）、「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求真第三期）二篇大文，拜讀之下，對於唐先生的歷史、科學知識的豐富，實在是欽佩之至！

唐虞世先生對於「維新運動」是愛護備至的，這不但可從唐先生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贊頌中看出，而且在「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一文中，劈頭便說：

「康有為是以復辟黨資格死去的。現在青年人聽到「康黨」二字，也許以為這是守舊的，落伍的，反動的人物罷？可是當時的人對於「康黨」，猶如一九一一年前後對於革命黨一樣，一九二五年前後對於共產黨一樣，都是視為洪水猛獸的。事實是十九世紀末幾年做「康黨」的人，比較後來做革命黨或共產黨的人，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從桐城謬種或選舉妖孽到「康黨」的距離，是比從「康黨」到革命黨或從革命黨到共產黨的距離，更遠得多的」（求真三期五四頁）。因此，唐先生歌頌道：「康有為、梁啟超諸人所發起和領導的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影響的深遠是秦以後中國歷史所未曾見。」

唐先生以老前輩的態度，針對着現在的青年人對於「康黨」的感覺，下了嚴正的評語，筆者自然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現在青年人」對於十九世紀末幾年的「康黨」，以為是守舊的、落伍的、反動的人物；這於時代、立場、以及理論上是否應該和正確的問題，我們且不必浪費篇幅去分析。不過，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唐先生對於「康黨」及其維新運動的愛護贊頌的程度是多麼深刻的。

問題也就因為唐虞世先生對於康、梁及其維新運動的過份偏愛而起。

由於唐先生對康、梁及其維新運動的過份偏愛，他老人家（註：我得聲稱，這完全是以現在青年人的立場的一句尊敬稱呼，絕無諷刺含意）便把維

新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價值和意義，等量齊觀。這還不算，最值得提出討論的是：唐先生將維新運動的階級意義，視同革命運動（指辛亥革命運動）一樣。

唐虞世先生這樣說：

「無論是維新，是革命，都是中國資產階級底政治運動」（求真雜誌第二期廿二頁）。

「康、梁底維新運動，就其本質說，則是代表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則是企圖將政權從士族或地主階級移置於資產階級基礎之上。」（求真三期五四頁）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資產階級運動。」（同前）

說維新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資產階級運動」，持論的先決條件，當然必須說明此時（戊戌年以前）中國的資產階級業已形成，因此，虞世先生正確地指出：「認真說來，中國社會出現一個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侵入以後的事情。帝國主義將前資本主義的中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其中成分是：海外華僑富商及其國內家族，通商口岸直接與外國人交易的商人（買辦）大小城市販買洋貨的商人，舊式商業資本家（此時不依附於士族而依附於新興階級）官僚資本下發財的人，士族自身改營商業者，等等。大小城市商人和手工業主人都組織起來，成為「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求真三期）。中國近百年史幾乎無一不與帝國主義發生密切的關係；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甚至維新運動的掀起，自然是帝國主義侵入以後的事情，不過，帝國主義的侵入，並不一定立刻就將「前資本主義的中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的侵入，是刺激中國資產階級強大的因素之一，但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是必須經過一個長時期的醞釀的，我們還該注意一下近百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史中，帝國主義阻礙和破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成長的力量正和帝國主義刺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的力量一樣是那麼鉅大的。我們之所以重述了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關係的如上常識，是爲了說明「戊戌」以前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其國內家族」，在沒有鉅量的向國內工商業投資而在國內形成了鉅大力量和基礎時，並不能因華僑富商及其國內家族的

本身已是資產階級或可能成爲資產階級而認定中國在戊戌維新運動以前業已形成了資產階級。何況，「通商口岸直接與外國人交易的商人」（買辦）等等，是否即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成分，也是值得研討的呢？

事實上，戊戌政變以前，中國國內的工商業及交通事業的控制者，除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成果之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微小的。有的是：一八七八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開平礦務局，以及開採山東嶧縣煤礦（一八八〇年）貴州清溪鐵礦（一八八五年）熱河四道溝銅礦，黑龍江漠河金礦（一八八七年）四川冕林麻哈金礦（一八九五年）。此外還有：唐桐開辦東川白錫鑛銅礦（一八八七年）陳家箴在湘設立官礦局及礦政調查局以進行開採（一九〇四年）並辦理廣西富賀煤礦，陝西延長石油礦（一九〇五年）山西涑川銅礦，江西贛州銅礦，任子煤礦，廣西煉錫師（一九〇七年）吉林盤石銅礦（一九〇八年）直隸鷄鳴山煤礦，雲南個舊錫務公司（一九〇九年）等等。在輕工業方面，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甘肅蘭州設立織呢總局，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織布局，一八八六年張之洞在粵設立纜絲局以及織布局等等，直到一八九〇年上海才出現了官商合辦的紡紗局，一八九四年盛宣懷才請李鴻章委派招商股八十萬兩，籌設湖北的聚昌、盛昌火柴廠及洋布局，到了一八九五年蘇州才開始設立官商合辦的蘇綸絲廠，上海有了商辦的大純、裕源等紗廠，一八九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一八九八年張蔞在南通設立大生紗廠，孫多森在上海設立阜豐機器麵粉公司……。

這一篇『流水帳』，說明着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發達的遲緩，同時，我們還該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工商業，幾乎完全是政府當局受了帝國主義壓迫而施行的『新政』；這些『新政』，雖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萌芽，但却是控制在封建官僚之手的。這似乎並不能確認此即中國的資產階級。

那時候，封建官僚爲甚麼要有這些『新政』措施呢？顯然地，那是受了帝國主義經濟政治高壓的結果。恩格斯於『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裏，敘述當時英、法、俄在亞洲的瘋狂侵略之外，又說：『我們這裏又看到這樣的一個亞洲帝國：這個帝國，極其衰弱，極其殘破，它甚至沒有力量來渡過人民革命的危機，甚至武裝起義的劇烈爆發，在這個帝國內也變成了慢性的和顯然不可治療的痼疾。』這就是說：封建官僚的『新政』，除了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之外，絕不是什麼『企圖將政權從士族或地主階級基礎移置於資產階級基礎之上』，而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臨死掙扎。

所以，在太平天國（這才是一個真正含有資產階級革命意義的人民運動！）既被救平之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便主張：創設『製造局』、『方言館』、『招商局』等，並派學生出國留學，甚至連滿臣文祥也用客卿蒲安司（美國人）爲使，以與西洋各國相交。順天府尹胡燏棻於光緒二十一年（民紀前十七年）便條陳『變法自強』事宜，列舉修鐵路、製鈔票、造機器、開礦產、拆南漕、減兵額、創郵政、整海軍、練陸軍、立學堂等等，光緒皇帝也諭旨：『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督各地方官，悉以籌劃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覆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夙薪膽之時』云云，由此看來，維新運動那裏是什麼『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資產階級運動』呢！

會、李的『新政』和康、梁的『維新』，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即是說：這同樣是較進步的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緩和危機及社會矛盾與爲了『富強國家』（這個國家其實就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特權罷了）抵敵帝國主義侵略的迴光返照而已。因此，康、梁的維新運動，無論以立場、出發點、形式、本質、任何方面說，實在不是代表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然，我們並不能抹煞會、李『新政』與康、梁『維新』的差異性，但在本質和階級意義上說，兩者相異處實不過程度和方式重點等而已。具體些說，會、李與康、梁同樣是站在維護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立場，利用資產階級的所謂『新方法』以圖『富國強兵』，支持封建政權抵抗列強侵略，實在不是像唐虞世先生所說的：資產階級『利用統治勢力，混入統治機構，擴大影響，以至最後獲得全部的政權』（求真二期：『維新與革命』）。

那麼，會李與康、梁其結果爲甚麼又截然不同呢？會、李以及其同一時代的人物如左宗棠、張之洞等，他們推行新政的結果都是昇官發財而爲『皇上』大加讚賞；康、梁及其同一時代的人物如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推行維新運動的結果，却被皇族特權階級恨得殺的殺跑的跑了。也許正因爲『維新運動』遭受着皇族特權階級的仇視殺戮，唐虞世先生就認爲『事實是十九世紀末幾年做『康黨』的人，比較後來做革命黨或共產黨的需更大的勇氣。』就認爲他們（維新人物）是『代表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企圖將政權從士族或地主階級基礎移置於資產階級基礎之上』吧？這就錯了！如果我們不看清那一運動的本質，和維新人物之所以被仇殺的實在原因，便認爲這就是代表與封建階級完全相反的新興階級，那就變成了『有

奶便是娘」的大笑話。

康、梁與曾、左等不同之處及其所以深為朝廷皇族仇視的原因，是這樣的：

第一、曾、李與康、梁雖然在原則上是站在一個立場的，但新政與維新在改良程度上是有深淺不同的。在方式和着重點上，曾國藩、李鴻章輩所着眼的軍事工業方面，站在這方面；不但於皇權無絲毫之損，而且這些軍事工業甚而交通教育專業等等的創辦，處處掌握於官府之手，這正是於皇族官僚極其有利的措施和機會。康有為、梁啟超輩所着眼的却是政治改革，政治變革，無疑地必然損害到皇族特權及其利益，且不说「立憲問題」於皇族特權的害處，就如：刪改各衙門則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以及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運之鹽道等等，都是直接損及皇族官僚及其系屬的權益的，當然必被仇視了。

第二、曾國藩、李鴻章輩之能順利推行新政，乃是在其立功居顯之後，一則與滿清皇族已有深切關係；二則立功無人敢為仇視；三則所行「新政」，辦理的工廠、鐵路、學堂、練兵等等，都有具體成績表現，不特皇族不加仇視，反而視此為「上好」「門路」，或自己爭着要辦，或介紹爪牙以間接獲利。康有為、梁啟超輩，過去於滿清固無特勳，就是到了戊戌政變的前一年，康有為也不過是一位小小的工部主事，光緒二十三年冬，給事中高燮曾荐康有為於帝，光緒決定召見；但還被恭親王奏訴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召見」的理由拒阻之。這已可見皇族對康、梁輩的印象之一斑了。存此心理，而康、梁變法又昂着眼於並非立時可見成效，難有具體成績表現的政治改革，直接損及皇族利益，這當然要遭受排斥了。

第三、光緒皇帝也是一個較進步的青年人，既召見康有為，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許專摺奏事之後，繼又擢用梁啟超為六品銜，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四品卿，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於是，奏摺皆經他們閱覽，皇帝的上諭也須經由他們起稿，這等於組成了「維新內閣」了。光緒這廢寵用維新人物，而且如此堅決的力行維新之治，老一輩的皇室宗親，必感冷落，因之而阻礙而妒恨而仇視這當然是平常的道理。而維新派連光緒皇帝在內，對老一輩的阻礙反對也愈愈感痛恨，試看戊戌七月廿八日的皇詔：

……今朕聞汝（按指楊銳）可有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誤昏庸之大

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之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

同日賜康有為詔云：「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安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這告訴我們，光緒皇帝的態度如何於皇族官僚守舊衰謬的老臣們是不利的，壓力大反抗力亦愈大，皇族官僚為了鞏固自己的特權和利益，自然仇視維新運動了。總而言之，這只是較進步的封建士族地主階級與守舊的封建皇族官僚階級的利害衝突，正如今日的資本主義國家內許多新與舊的衝突一樣，我們不能看到為現行執政者所仇視的便認定被仇視和排斥者便是代表着新興的勞動階級的利益。

維新運動的價值和意義，雖然不應估計過高，但我們也不應因此而低估了維新運動的價值和意義。換句話說，維新運動和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並不是全無關係，它刺激和幫助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正如曾、李、左、張等推行的「新政」一樣，維新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啓蒙運動，但這一運動的本身却不是資產階級的。

二

唐虞世先生對歷史有一個特殊的看法，那就是特別注視「人」的問題，在「維新與革命」那篇宏文裏，對孫中山先生、章炳麟先生等敘述極詳，在「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這篇大著中，也特別重視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出身、活動、著作等等，在這方面說，我們是佩服唐先生的見解和熟悉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說，個人只是歷史的參考資料之一，特別強調地依據對人的分析而判定這一歷史過程的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却是並不完全可靠的。歷史是發展的，人的變動性較諸任何事物的變動都大，尤其是在政治舞台上串演角色的人，投機性更強，活動的變幻也更迅速而驚人，由極左而極右，由極右而極左，左右搖擺，時時變換的人，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真不知有多少？尤其是在新舊交雜的戊戌維新前後的那種動蕩時代，人的變化自然更大。例如，御史李盛鐸本與康有為同是保國會的發起人，後因譏議大興，李恐被禍，竟上疏劾會。翁同龢原來可以說是康、梁輩的扶持人，到後來，「文恭日記」中翁同龢自己却寫道：

戊戌四月初七日。

上向臣索康有爲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素無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屬心臣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嘗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

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

新聞報載十八日諭旨，嚴拿康、梁二逆，並及康逆爲翁同龢極者，有他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時，已微臣去國之後，且屢陳此人屬心臣測，臣不敢往來……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

翁同龢、李盛鐸的這種態度，正是官僚羣中的一個典型，就是康有爲自己，從集公車一千三百人上疏請求變法，而任工部主事，而保國會，而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而流亡至組織復辟黨，這些過程，雖與其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寫『論語注』『中庸注』『孟子微』及後來創立『孔教』，自任爲第一任『教主』，以及如唐先生指出的康有爲『經歷了孔子主義中間各種派別和傾向』，且『走出孔子主義以外去學佛經，去讀基督教聖經，去研究新譯的西書』的過程一樣，雖有其一貫的精神，但却是發展的，變化的。年輕的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思想及活動過程，更是變化得厲害多了。但是，站在科學的歷史觀點來看，我們便斷斷不能因爲讀過梁啟超後來介紹達爾文的學說、孟德斯鳩的學說、盧梭的學說等等，便認爲會有梁啟超參加和領導的維新運動必然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雖然我們不能抹煞資產階級思想學說對於維新運動的影響）原因是由於個人思想是發展的、變動的。即梁啟超在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時，自己也下着按語道：『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換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飲冰室文集卷九）。再看看梁啟超的活動史，由參加維新運動、而辦新民叢報、而與乃師康有爲一同創立孔教、參與保皇黨等，到後來却一反以往，進而介紹西洋學說，更維護其弟子蔡松坡脫險起義（蔡鐔十三歲即從梁求學，袁世凱做皇帝擬除蔡，時蔡在京，由於梁任公之掩護始脫險），爲了倒袁，還親自冒險潛赴西並游說廣東，這種變動情形，我們又將如何用以判斷歷史呢？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注視維新運動當時的社會情況及其發生的背景和所起的效果；不應完全着眼於領導人物，即要注意人物，也應該把握住這些人物當時當地的思想、活動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

唐先生特別指出『維新運動底領袖是廣東人，而廣東人在全國佔據政治

運動領袖的地位又是自康有爲、梁啟超及後來的孫文開始。這乃是一食帝國主義侵略之賜』。這一分析是異常正確的。帝國主義侵略首當其衝者是廣東，華僑的祖家多半是在廣東，這些都是事實。不過，因此而說『廣東比其他各省更早發展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更早成立，也更早暴露其野心』，這雖然不能說是沒有理由，但其着眼點顯然是從國外資本主義影響的這一點上面的。國外資本主義對中國資產階級的影響，華僑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助力，這當然不容抹煞。但因此而強調『廣東籍華僑多，又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首當其衝，故而資產階級更早成立』，這未免太不重視民族資產階級成立的內在因素了。正如唐先生又特別強調的：

海外華僑、香港、上海、商人們先後辦了報紙，起初對洋商招牌，後來中國人自己出面。報紙之外還出新雜誌、新書、新小說等等，執筆者，如龍橙、王韜、吳沃堯、李伯元等，老實不客氣嘲笑那些官、那些紳士、那些世家舊族、攻擊政府外交失敗和內政錯誤……這些書無論是著作於維新運動以前或以後，我們總可以從中看出十九世紀末葉中國通商口岸資本主義發展概況及其對於各方面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可以看出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如何大，野心如何高，需要政權如何迫切了（求真雜誌第三期）。

都是一樣，只是片面的觀察。事實是很明顯的，他們之所以『老實不客氣嘲笑那些官、那些紳士、那些世家舊族、攻擊政府外交失敗和內政錯誤』，完全是由於憤恨滿清朝廷的過於腐敗，是激於民族主義思想而產生的。正如廣東與華僑，帝國主義問題一樣，我們如果不認清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是否成長，而從這些浮面表象去判定，那必將陷入錯誤的深淵中的。

以帝國主義侵略來說，雖則廣東是『首當其衝』，但沿海還有許多省份跟廣東的情形差不多都是一樣，尤其是上海等海岸城市，在經濟上、政治上所受的刺激，都較廣州爲大。以華僑人數說，閩台沿海各省向外發展的歷史和數量，比諸廣東實也相差不多。即使不及，試問：華僑向外發展的歷史有多久了？是不是由於有了可能成爲中國資產階級的主力的華僑資本家，便說中國早就成立了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成長以及華僑之成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主力，是在於中國資產階級本身具備了成立的基础，是在於華僑資本家的經濟力量業已深入了國內社會的內層而成長了一股鉅大量之後。我們假如着眼於國內的民族工業商業的經濟發展，那麼，江浙寧滬甚而東北奉天等地的工商業實較廣東發達的。

雖然，這一段話似乎與我們要說的康、梁生於廣東問題，並無多大關係，但這可證明廣東之能產生康、梁或孫文甚或汪兆銘（恕我加插得不倫不類了）並沒有甚麼頂了不起的特殊因素。即便說；廣東的民族性較強，官僚統治力量因疎遠而益為脆弱，受帝國主義及封建官僚的壓力更大，這也不過是刺激的因素之一罷了。總而言之，一個運動的領袖是某一地方的人物，並不應強調它的特殊性，尤其是企圖由此而判斷這一運動的階級基礎和意義，更是危險性極大的。

三

唐虞世先生對於資產階級與改良運動的關係，用了很大的氣力來加以解釋；唐先生說：

『各國資產階級運動，一開始都是利用舊政權，混入其內，改良之，使之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即一開始都是走維新道路』（求真雜誌第二期）。

因此，他又說：

『起初，商人插足政治舞台，做官，還是要經過士族道路的。他們照樣聘請明師，教育子弟，求得正途功名出身；後來，嫌太緩慢，便賄賂試官，購買槍手，求得參政資格；後來，又嫌太緩慢，便納資捐官，做候補道，由此爬上去。最後，商人以為這般混充士族才能插足政治，還是緩慢，他們要直接參加政權，甚至獨佔政權』（求真第三期）。

這些說法，事實的確是如此的。不過，這些事實，未必就能證明維新運動是由此發展而成，在中國，『獻寶狀元』、『納資捐官』的歷史並不自清末時期起，所有這些行動，只能看做『個人』的『晉階』問題，它並不能代表任何階級而成爲一種運動的表現（如果硬要說這是可以代表階級的話，也只是代表沒落士族地主階級）至於『各國資產階級運動，一開始都是利用舊政權』問題，我們不要說法國大革命，即以英國來說：大英帝國的封建勢力，是不像法蘭西的經過一次大革命而澈底清除的。而是依溫和的方法，逐漸去變質去肅清的。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不久，英商和製造家都仍然沒有像貴族地主階級那種崇高的地位。直到十九世紀初，富有的工廠鐵礦主人，猶不能在政治上佔有特權勢力。延至一八三二年英國會改革條例施行之後，下議院議員五分之四仍屬於一大半貴族化裝的地主階級（王亞南：『民主問題與經濟問題』）。由經濟衝突而政治衝突的階級鬥爭，是表現在國會的爭執

上的；如『穀物條例』的爭執，對於奧文組織『全國勞動者階級同盟』的誘導，以及選舉法的修改等等，都是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已有了鉅大力量而代表階級利益的鬥爭。英國商人工廠主企業家等的參與政治，是爲了階級利益，而有着階級的羣衆基礎的，中國商人插足政治（連康有爲、梁啟超領導維新運動也是一樣）的目的及其階級背景却不是如此。何況維新運動時代的中國連一個類似國會的機構也沒有，康、梁他們又是站在『中興』的立場去試行含有資產階級意義的『新法』呢？唐先生說得對：

『大抵社會矛盾未發展到飽和點，統治階級還有可能改良其制度以延長其統治的，總是用維新方法，如歷代底政變，甚至禪讓；但矛盾若發展到了飽和點，農民工匠及一般貧民就暴動起來，他們不要改良，祇要革命。』（唐作：維新與革命）

根據唐先生這一個正確的原則，我們更看到了唐先生對於『維新運動』判斷的錯誤。所謂『統治階級』，在維新運動時代當然指的是滿清皇朝的封建士族地主階級，而不是新興的資產階級，依『統治階級還可能改良其制度以延長其統治的，總是用維新方法』這一邏輯，維新運動在本質及目的上，實不過延長統治階級的政權罷了。其『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又怎能說是『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呢？

唐先生解釋其所以不正面提及資產階級在『維新與革命』（指前述原則）兩者間的姿態，和說明新興的資產階級之所以主張『維新』的理由道：

那時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已有政治野心，仍必須利用舊的政權機構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它還不敢提出『民主共和國』口號，提出『革命口號』（求真第三期）。原因是：

『他沒有長時期的城市自治經驗，還不知道怎樣去統治國家，她還不能從自己羣中推出統治人物，政治家，領袖。』（求真第二期）

這兩個意見都說明着那時中國資產階級的尙未真實成立和脆弱形態，正因此，她不但不能提出『民主共和國』及『革命』口號；也說明着在維新運動中牠們所處的地位。至於統治經驗問題，這根本不是有沒有『經驗』，而是有沒力量去獲得政權問題，維新運動時代中國資產階級沒有統治經驗，不知道怎樣去統治國家，因而就去混入舊政權中，去學習，去改良，那麼，維新運動爲甚麼又提出新的政策而不沿襲舊的以獲得經驗呢？牠們既有套新法，便證明不是什麼沒有經驗了。我們還要請問：在維新運動這一時

POWER

式樣新穎 書寫流利

九五四五三話電·號八十弄七三六路興泰

費華金筆

期中，資產階級究竟獲得了多少統治國家的經驗，而竟在辛亥年前後的運動中使用了「革命」方法？其實，這不是什麼經驗不經驗的問題，而是中國資產階級本身的成長和力量問題，正如資產階級不是「不能從自己羣中」推出統治人物、政治家、領袖一樣，而是牠是否需要和能否「產生」的問題。孫文和康有為的不同，原因即此；康有為是較進步的士族地主階級延長其將廢的統治特權所需要的，孫文所代表的却是恰恰相反。

最後，筆之管同陳人白先生的見解：

戊戌維新運動的基本傾向，是企圖將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改變為君主立憲的國家，並以此從上至下來改革舊有的社會經濟制度，逐步地走向現代的資本主義。（按：這並不與唐先生認為維新運動已經是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運動相同）但事實上，滿清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絕非光緒皇帝一人所能代表。相反地，光緒不過是寄生在那個龐大而頑固的官僚機構（即守舊的封建士族地主階級）上面而已。雖然年青的皇帝因受了種種外來的刺激（如甲午戰爭的失敗及隨之而來各帝國主教的種種要索）志願「維新」，切望實行某種民主改良來延續清廷的命運。……（袁真雜誌第二期。陳著：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完——

本誌創刊號目錄

創辦宗旨

撲朔迷離之東北問題

本社同人

時評

英內閣訪印國與印度問題

康君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孟元

△關於民主問題的意見▽

鶴阜

中國如何民主化

陳人白

現階段的民主主義

民主與特權

民主意見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古史辨的解毒劑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論古代希臘羅馬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論社會思想

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悲憤的歡笑（小說）

補佛拉提米爾論中國的民主主義

白母系氏族怎樣移轉為父系氏族

真與偽 社會的祕密 論實驗科學之生父

編輯室談話

編者

郭紹虞

李季

林漢達

胡山源

索非

竹雲龍

康君譯

李季

歐伯

盧寧著·冰夷譯

英C.考特威爾著·朱維基譯

童止齋

唐虞世

碧雲

李毓鏞

謝少翁

爲「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

李季

一 開口即錯

聽說古史辨派某君因我批評了他的大作，化名劉平，作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一文，登在東南日報文史週刊創刊號的首要地位。日前承友人寄來，打開一看，未免使我失望。劉先生在抗戰前讀過我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就想寫篇『批判的批判』，對於公式主義者的玄學方法，作個澈底的清算，『爲何藉口』後來感到八股式的理論和頑固派的成見，明眼人自能辨別，『因而』擱置」了呢？難道「公式主義者的玄學方法」，「八股式的理論和頑固派的成見」兩三句空話，便和符咒一樣，能够制服你的論敵嗎？劉先生如有高見的話，儘可出來「作個澈底的清算」，不要和投機商人一樣，在學術界買空賣空。

劉先生用上面幾句話「解決」了我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以後，滿不在乎地「偶而在求真雜誌的創刊號裏又翻到李先生的大文古史辨的解毒劑」，於是憤然填膺，立圖報復。我的原文在方法，研究範圍，科學素養，公式，腰斬中國歷史，和對外宣傳各方面指出他們的弱點，不意劉先生的解毒劑始終沒有對準這幾點向我反攻，一方面不顧我的偽書中有真材料，真書中有偽材料的鄭重宣言，離離萬里地從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中挖出我說史記殷本紀的世系與卜辭相印證，確係一部信史的話，硬作我「因一信百」的證據，尤其指摘我引證西摩勒耳所說公元前二三〇〇年（唐虞時）製鐵術傳入中國的話爲「玄學方法」，爲「一團糟」；另一方面枝枝節節，有氣無力地解釋神話和人話的因果關係，他們的公式「並不完全建立在『默證』上」，他們沒有腰斬中國歷史。像這樣七拼八湊，掛一漏萬的文章，代表古史辨派對我反攻，怎能不令我失望呢？

不過我雖失望，仍舊開心。因爲劉先生也是用一首詩開始，雖「先去其病根」不像詩句，總算挖空心思，唱和了一番。然一考詩的內容，可說開口即錯。因爲起首兩句是「疑古與信古，紛紛起爭論」。他們雖以「疑古大師

相標榜，但我未嘗自稱信古。我是信古而又疑古，我的疑信都是有條件的。所以問我信古麼？我的答案是唯唯否否，問我疑古麼？我的答案也是唯唯否否。可是在比重上，我的疑古要超過信古。疑古本不爲治古史的蘇門磚。馬克思所中意的標語是「對於萬物都懷疑」。然「馬氏的懷疑是對着種種包含真實事件的外表而發的。他對於宇宙、政治、和社會外表的懷疑，是每種批評的研究之開端。」（拙著馬克思傳中冊二七〇和二七二頁）這不是尋常懷疑主義的懷疑，則不是古史辨派那種爲着疑古的緣故而疑古的懷疑。這也就是我的疑古與古史辨派的疑古不同之點。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劉先生怎能把我列在信古一方面，與疑古對峙？他第一句話就弄錯了，還像煞有介事地要「出來做一番清毒的工作」！

二 唐虞夏進入鐵器時代的五大理由

劉先生的大文第二項是對準我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進攻，特別對準我所說的唐、虞爲鐵器時代一點進攻，自以爲深得兵家避實擊虛，善尋弱點的訣竅。尤其好笑的是他不獨盡量攻擊我，並遷怒到我所徵引的西摩勒耳，說爲「洋大人」，又嘆息他的書出版於一九二〇年（初版爲一九〇一年）爲「不幸」。如果這個洋大人的著作是紀元前二三〇〇年所作，那確是可靠的證據。「這真是玄學方法的胡說八道。材料是否正確，應先從材料本身去考察，不能專以紀錄牠的書出版的遲早爲標準。有時最古的記載絕不可靠，而現代的記載因新的發見，和科學的證驗，反十分可靠。他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還談什麼材料的鑑別啊。」

劉先生一方面可憐「洋大人」的書出版太遲，不合他的標準，另一方面對於出版很早的書又只准他們一派人專利，不許別人染指。例如我批評顧先生排斥章鴻釗先生引用「山海經的禹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說三代之初，已知用鐵，「自己却又用山海經證明禹爲神，劉先生仍然承認顧先生對而章先生不對。這個問題和唐虞夏進入鐵器時代有關，我在本項中可附帶

討論一下。

我要從黃帝說起。黃帝，不是已經由古史辨派甚至於郭沫若先生引經據典證明即皇帝，亦即上帝的轉變麼？（見古史辨七冊上編一九五至二〇九頁，十批判書一三三頁和六一頁）現在還談黃帝，不獨他們看見要笑，且讀過他們的著作的人，即使對我滿懷好意，也不能不慨嘆道：李季落伍了，難怪劉平罵他『八股式的理論和頑固派的成見』，『真是罪有應得！但是論敵們且慢笑，朋友們也不要慨嘆，雖則『耶穌自有道理』，『反對耶教的人』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黃帝本稱有熊氏，熊則那個氏族的圖騰，所謂黃帝是後人安加的尊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按有主德之瑞，土色黃，故曰黃帝。』）即使果如他們所說，黃帝是皇帝之轉，又是上帝之轉，一轉二轉，把他轉到天上去了，然有熊氏總不會上天的。即便又如楊先生的得意之作一樣，朱虎熊羆都是神獸，都是『替上帝服役的』，『有熊氏自不能例外。然三四千年前有人存在，他們也是承認的，這就夠了。我在下面所以談黃帝、談蚩尤、談共工、談堯、舜、禹等，並不着重在他們個人身上，不過因古代相傳下來，而又經得起考古學證據的一些史料，是由他們表現出來的，故不能不藉作時代的標誌和社會進步的符號。任何人推翻了三皇五帝的名目，推不翻考古學所推證的銅器和鐵器時代，因此也推不翻我以考古學為根據的說法，至多不過將黃帝、堯、舜、禹等的名稱另換成甲乙丙丁罷了。先說明了這一點，便可言歸正傳。

越絕書十一卷說：『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世本作篇載黃帝的臣『揮作弓矢，夷牟作矢。』又說：『蚩尤作兵。蚩尤以鑿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管子地數篇也說蚩尤利用葛盧雅狐諸山之金以作兵器。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云：『蚩尤……銅頭鐵額。』雲笈七籤軒轅紀也說：『蚩尤……銅頭鐵額。』而注則以為『蚩尤始作鎧甲兜牟，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鐵額。』黃帝原無銅兵，僅恃弓矢與蚩尤戰，竟獲勝利，並敵人的製銅術而擢為己有，這是可想而知的。史記封禪書稱『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證以銅頭考古學，不能不令我們有幾分相信。

安特森的甘肅考古記共分六個時期：即齊家期、仰韶期、馬廠期、辛店期、寺窪期和沙井期。他以前三期為新石器時代後期至石銅器過渡時代，約當公元前三五〇〇——二六〇〇年；後二期為銅器時代，約當公元前二六〇〇——一七〇〇年。每一期經過的時期本遲速不一，安氏平均以三百年計算

，已不正確，而因仰韶物器和後屬土耳其斯坦阿斯卡巴德（Aksakal）附近安諾（Anan）出土的陶器極多相似之點，遂取其時期以相比擬。不獨仰韶陶器當安諾二期或三期，主張不一，並且年代也有在紀元前九千年，二三千，或二千年等說，更無定評。安氏定仰韶期為公元前二〇〇〇——二九〇〇年，未免時期太後。因為沙井期的銅器既遠遜殷墟銅器，假定牠比殷墟時代早一千年，不算武斷。由此逆推上去，則開始發見銅器的辛店期不應如安氏所假定的公元前二六〇〇——二三〇〇年，而應為公元前二八〇〇年左右。這與黃帝蚩尤的時代相差無幾。

我們再拿黃帝時代（約在公元前三四五百年之頃）和小亞細亞銅器時代的開始期對比，已經落後四千五六百年，即和牠的青銅器時代開始期對比，也已經落後一千五六百年。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披山通道，……西至空桐，登雞頭。』在古代中華和小亞細亞本有交通，即使蚩尤不知製銅術，也應當從小亞細亞輸入了。所以假定黃帝時代為青銅器時代，實與得紙上和地下的兩重證據，並非『大胆妄為。』

黃帝時代既是青銅器時代，唐、虞時代銅器應用之廣，自不待言。所以世本作篇載『垂作鈔舞。……垂作鐘。』虞書載『金作臚刑。』至於夏代，這一類的記載，更隨在都是，試舉數例如下：

（一）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說：『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二）墨子耕柱篇載：『昔者夏后開便畫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

（三）孟子盡心篇載：『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

（四）呂覽求人篇載：『得陶，化益，真鏡，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於金石，著於盤盂。』

（五）越絕書十一卷載：『禹穴之時，以銅為兵。』

（六）管子山權篇載：『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

（七）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這些材料雖未必完全可靠，但我確切相信牠們不是合夥造謠，特來和我們的疑古專家開玩笑的。安特森所發掘的辛店期、寺窪期、和沙井期的銅器，或為之先驅，或與之並駕，就是明證。當瑞典王太子來遊我國，取道倫敦回國

時，曾以所獲仰韶陶器請英國博物院中國陶器專家郝步森 (Hobson) 加以鑑定，郝氏的結論中有『中國夏代(公元前二〇五——一八一八年) 銅器之用已廣』(地質彙報第五號第一冊中華遠古之文化)等語，這比我們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的『禹是石器時代的人，因為我們至今沒有發見夏代的銅器。』(古史辨一冊二〇八頁)哲學博士胡適之的『鐵固非夏朝所有，銅 (bronze) 恐亦非那時代所能用。』(同書同冊二〇〇頁)骨金文研究家郭沫若的『大批殷商以前只是石器時代。』(先秦史說述林二九頁)雖絕對相反，但有地下材料做參攷，不見得是『洋大人』的『大胆妄為』，或『玄學方法』罷！

可是我對於他們認唐虞以至夏為青銅器時代，並不滿意，其理由如下：

一·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證明氏族社會的末期(即野蠻高級)有鐵器和文字的發明，唐虞的公天下和夏禹的家天下(夏禹成立國家，比巴比倫和米索不達美亞遲一千八百年，比埃及也遲八百年)，是氏族社會末期和階級制社會初期的分水嶺，也應有鐵器和文字的發明，不當僅止於青銅器(古代未發明鐵器)構成國家的固然也有，但非所語於銅少鐵多的夏代)。

二·韓非子五蠹篇說：

『共工之戰，鑄鉛短者及乎敵，鐵甲不堅者傷乎體。』

所謂共工本有兩個：一為舜以前『伯九有』(國語魯語上)的共工，一為舜時的共工。上面幾句話是緊接『嘗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來，故知為舜時的共工，即荀子成相篇所謂『禹……除民害遂共工』是。共工之戰既有鐵鉛，可見唐虞時代是有鐵器了。

又禹貢的梁州『貢鐵銀錫箸器』，被考古學家(?)馬衡先生引鄭注『鏤，剛鐵』一語，大肆攻擊(古史辨二冊三四頁)。殊不知鄭氏只是誤解，即說文金部『鏤，剛鐵』下引夏書以相印證，也是如此。但徐鍇本作『梁州貢鏤，金也』，許氏也有『一曰鏤，釜也』一語，是梁州之鏤即不得為剛鐵，難道不認為『鏤』為鏤麼？(據布洛克豪斯——Brochhaus——科學辭書鏤字條說：『埃及人在公元前二千年已使用鐵製和鋼製器具。』這句話倘若沒有錯，夏時的鏤為剛鐵，又何嘗不可能?)後人誤以鋼鐵釋鏤，便可藉此推翻禹貢麼？尤其是梁州距禹都甚近，牠的貢鐵貢鏤是完全可能的。

其實何止梁州。禹貢荆揚二州之貢，都有『惟金三品』一語，孔安國傳：『金銀銅也。』然當時產鐵之山比產銅之山多八九倍，鐵又多浮在地面(

詳後)，斷無不貢鐵之理。何況荆揚二州古本產鐵，至今猶如此。究心古代銅鐵礦產的江淹便懂得這一點，對於『惟金三品』的解釋，獨具隻眼：

『古者以銅為兵，故禹貢云：荆揚貢金三品。……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為寶，赤金可為兵，黑金可為器。』(銅劍鑿序)

這和越絕書所謂『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相印證。至於黑金為器一點，特留在後面再說。

三·上面的證據，我們雖不相信是任何人故意偽造的，但疑古專家或鋤頭考古學家一定視為笑柄(不過除掉像丁胡郭三先生空口說白話外，也提不出反證)。因此，我還得繼續提出有力的證據來。管子地數篇說：天下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山海經中山經也說：禹曰：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兩書的材料是同出一源，還是誰抄襲誰的，暫且不管，後一書的『禹曰』大致不可靠，然兩書所說，合於中國古代的实际情形，則無疑義。自古至今，鐵多銅少的證據，隨在都是。例如戰國策趙策一載趙襄子因兵器材料不足，問張孟談道：

『吾銅少若何？』

江淹銅劍鑿序說：

『古者以銅為兵。……明知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至於秦時，戰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鐵代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下卷也說：

『凡鐵場所存在之，其實淺浮土面，不生深穴，繁生平陽岡埠，不生峻嶺高山，實有土錠碎沙數種。凡土錠鐵上面浮出塊塊，形似彈錘，遙望宛然如鐵，燃之則碎七，若起治煎煉，浮者拾之。又乘雨濕之後，牛耕起土，拾其數寸土內者；耕畢之後，其塊逐日生長，愈用不窮。西北甘肅，東南京郡，皆錠鐵之數也。燕京遵化，與山西平陽，則皆砂鐵之數也。』

『求鐵甚易』，『凡鐵場所存在之，其質淺浮土面』，完全是事實。尤其最後這句話，更是世界上的普遍現象。因為鐵大都生於地球表面，與氧化合，不過也與牠種金屬結合(主要的為鉛和銅)，有時且形成天然的鐵塊。在歐、美、非洲各處，此項鐵塊中的一種稱為流星鐵(Meteorite Iron)。

係以流星的形態，因重力的吸引而達到地球上的。左傳莊公七年，『星隕如雨』，不知是否即流星鐵？然無論如何，我國產銅的地方很少，產鐵的地方却遍佈全國，爲亞洲之冠。就古代所謂中原及其附近地帶講，如安徽的蕪塗、繁昌、銅官山，江蘇的鳳凰山，河南的修武，河北的涉縣，山東的金嶺鎮，湖北的大冶、象鼻山、官都等處，至今還產鐵。至於禹都所在的山西，一直到現在，鐵猶爲無盡藏。據李喜霍芬（F. Reichert）的測算，可供全世界幾千年之用。雖稍近誇張，然平定、盂縣、長治、高平、晉城、陽城、隰縣都是有名的產鐵地，含鐵自百分之三七至六三。

古史辨派甚至於銅與考古學家一方面習聞石器、銅器、鐵器三個時代順次發展之說，另一方面又堅持商是石器時代或青銅器時代的主張，所以一聽見我說唐，虞是鐵器時代，自然視爲『一腐糟』，視爲荒謬絕倫。但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的。波卡洛夫說得對：

『……認爲一切民族都是從銅到青銅，並由青銅到鐵的順次推移，亦屬疑問。於是某一地方之天然資源，就是決定在那地方用於用具之製造上的材料。』（世界史一卷一册四四頁，神州譯本）。

一個地方的天然資源決定牠的用具的製造材料，那麼，在銅少鐵多的古代中國，其青銅器時代對於持久，而鐵器時代的出現應當特別早，至少在產鐵獨多的地方當如此，這是完全沒有疑問的。（在產銅獨多的地方，銅器的應用當然也特別長久。如北魏魏鑿於東徐州『冶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魏書崔鑿傳——當時中國進入鐵器時代在二千六七百年以上。）唐虞夏均建都於產鐵獨多的山西（現在聞喜、垣曲、和絳縣雖有少數銅礦，然含量甚微，如儲量最豐的匏子溝銅礦含銅僅百分之二至三。）則那時鐵器的出現獨早於其他地帶，也是絲毫沒有疑義的。

還有一層，製鐵的技術比製銅更容易，尤能促成鐵器時代的早日出現。西摩勒耳說：

『現在有許多著作對於在鐵器時代前假定一個青銅器和青銅工具的特別時代，還在熱烈的爭執之中。依照現今古物學和技術的研究（伯克、布呂列和施列德一Beek, Bunnar, Schrader），大概粗劣鐵器的原始製造，幾乎到處還要較早一些，因爲鐵礦在攝氏七百度即熔化，而銅礦要到攝氏一千一百度才熔化。鐵礦到處都是，而青銅所必需的錫却極稀少。……』（西氏國民經濟學綱要一卷二〇五頁）

最後一句話不啻爲古代以至現代中國寫照。自古至今，中國北部和中部產鐵甚少，惟南部產錫較多（周禮冬官考工記有一吳粵之金錫一語，產地也是在東南）。所以殷墟出土的銅器屬於明器一類的，不用錫而改用鐵（並加砒素）爲合金，藉以減少銅器的氣孔，就是一個最明顯的證據。在銅少錫缺，而鐵獨多，又容易採取，容易製造的條件下，唐、虞、夏有不急速進入鐵器時代的理由麼？

四、在生產力發展之中，技術必定應時代的需要而不斷進步。古代中國既到處產鐵，自能發明製鐵術以應時代的要求。九黎原居江南一帶，後更北進，三苗據說是牠的後裔（恐不可靠，因爲國語周語下『王亦無鑿於黎苗之王』，仍是黎苗並舉），居洞庭彭蠡之間，爲大冶鐵礦所在地，鐵苗至今仍浮在地面。說文黍部：『黎……從黍，犁省聲。』艸部：『苗，艸生於田者，从艸田。』這可表見黎苗是農耕的氏族，而蚩尤相傳爲九黎之君，『銅頭鐵額』之說若確實不虛，則黎族當首先發明製鐵術，而苗族也保有此術。虞夏征服有苗，牠們的製鐵術即使不是自己發明的，也可採自戰敗者，無待外求。

現在再退一步，假定虞夏未曾發明製鐵術，黎苗也是如此，那西方當有輸入。西摩勒耳告訴我們說：

『鐵的製造在蒙古條頓諸氏族——古代每一種用鐵的人民爲黑海的哈利貝烏人（Chalaber），係此等氏族的分支——中似乎首先有一種更重大的意義，由牠們傳入中國（在公元前二三〇〇年）是可以證明的』（國民經濟學綱要一卷二〇五頁）。

所謂公元前二三〇〇年，約當唐代中葉。他的材料的來源現雖無從查考，然米勒利爾對於這一點，可以給我們一個旁證。他說：

『亞洲、非洲的自然民族的文化不過在半開化的階段，已有了鐵器。』（米勒氏社會進化史九〇頁，商務譯本）

『鐵最初在西亞發見，以後即代取青銅，紀元前一五〇〇年傳到埃及，在紀元前一千，傳到了希臘。』（同書一一四頁）

亞洲自然民在半開化的階段即已有了鐵器，可見蚩尤的『鐵額』不是無稽之談，而唐虞的鐵器不成問題。這裏雖沒有說及西亞的製鐵術何時傳入中國，我們可以斷定在牠傳入埃及之前，即至遲是在西摩勒耳所指的唐代。怎樣見得？史記六國表載『禹興於西羌。』水經注『積石之山』注：『山在

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西羌既在西塞之外，是和西亞相距甚近，尤其是『禹學於西王國』（荀子大略篇），有吸收西方文明的絕大可能性。所以傳播製鐵術於中國，如果不在禹以前的話，至少應自禹始。

還有一層，漢族西來說，舊的雖被廢棄，新的又已產生（以考古學家安特森的仰韶期陶器和解剖學家步達生沙鍋屯及仰韶遺骸比較研究作根據），雖未必可靠，然西亞次第發明的製銅術和製鐵術必定及時傳入中華。證據就是安特森在河南仰韶村的發掘所供給的。仰韶期（公元前三二〇〇——一九〇〇年，在實際上還要早些，理由詳前。）的彩色陶器與意大利的西西利島，北希臘的啓龍尼亞（Cheronia），東歐的格雷西亞（Glacia），俄國西南部基輔（Kiew）附近的脫里波留（Tripolije）等處所發見的陶器相近，尤其是與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安諾所發掘的陶器最為相似。可見中華和歐洲在五六千年前則有交通。既是這樣，中華和近鄰的西亞交通當然更多，而牠的製銅術和製鐵術也當然比歐洲的彩陶傳入更快。對於古代中華和西亞的交通，我們同樣有確切的證據。

文化史上的論證多實指中華文化出自西方的來源為可靠。因為我們在中華和古代巴比倫同樣發見一種建設在人力與獸力共同活動上的高度發達的農業，具有同一的畜種，同一的家畜種，和一種相似的國家組織、社會組織。在兩個文化中心點發見黍、小麥和大麥都有兩種，而家畜中如牛、驢、羊和山羊，在極古的時代已經飼養了。……人們可以由此作出結論道：無論如何，東西兩方的關係是由內部亞細亞沙漠中的沃地塔里木盆地地緣絡起來的……」（拙譯五格勒中國農書上冊一三〇頁，商務出版）。

由此看來，禹則不生於西羌，不學於西王國（舊注以西王國為西羌的賢人，非是，此為國名），唐、虞已因這種密切的交通而進入鐵器時代，是毫無可疑的。

五、一般人甚至於一班學者對於鐵器時代這個名辭的含義，都不甚了解，以致發生一種重大的誤會。試以顧先生所反駁而又聲稱『不愧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的章鴻釗先生的石雅為例，內中有一段說：

『銅器全盛時代：夏、商、周三代，即自西元前二十二世紀至前五世紀，其間當已有鐵，引俗以為鐵金，不專製器，殆是時冶鐵之術猶未精也。』

『治用鐵器時代：春秋戰國之期，即西元前五世紀，吳、楚諸國治鐵漸精。』

始製鐵兵，惟仍用銅為多。……（地質專報乙種第二號石雅四九頁）

章先生對於銅器分『始用』和『全盛』兩個時代，對於鐵器且分『始用』，『漸盛』和『全盛』三個時代。標準是什麼？第一是數量。所以他雖明知『三代時中國已有用鐵者，如刀劍錄云：『孔甲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博古圖云：『三代之斧，在夏執玄鉞，』古今注正謂『鐵斧，玄鉞也。』」（地質專報乙種第二號石雅四二頁，按古今注『鐵斧，玄鉞也』下有『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一語。）又引羅振玉函：『吾家藏古銅刀，觀其形制，乃三代物，柄中嵌虛，中實以鐵。又藏古矢鏃，其鋒刃以銅為之，而挺則用鐵。』（地質專報四二六頁）但因數量不足，終將夏、商、周列入銅器全盛時代。第二是兵器。所以『吳楚諸國……始製鐵兵』，才是始用『鐵器時代』。

其實這種標準完全是錯的。國語學說：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鉞斧斨，試諸士農。』

所謂美金就是銅，惡金就是鐵。在用美金以鑄兵器的時代，固不能證明必有惡金以鑄農器，但在用美金製刀和矢鏃而用惡金實柄中與作挺的時代，便可反證必用惡金以鑄農器。因為我們已經說過，古代中華銅少鐵多，在『鑄銅既難，求鐵甚易』的狀況下，農器用鐵製，是完全自然的事。『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鹽鐵論禁耕）這在唐虞三代，必已如此。章先生既不能因三代銅器中兼用鐵而不認鐵器的存在，我們却可由兵器中兼用鐵而確定鐵製農具的存在。何況前面已經指出共工之戰，使用鐵鋸，可見唐、虞時代的兵器至少有一部分也兼用鐵製了。

其次所謂銅器鐵器，範圍至廣，而農具和兵器為其中的主要部分。所謂『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鹽鐵論復古）。鐵器就是指農具。章先生以兵器用鐵製為『始用鐵器時代』，我們恰恰相反，是以農具用鐵製為鐵器時代的開端。鐵製農具先於鐵製兵器而出現，固是一種理由，但此外還有一種更重大的理由，即馬克斯所說的：

『手磨機產生封建社會，蒸汽磨機產生資本主義的社會』（哲學的貧窮）。

鐵製農具在提高生產力上所發生的效能，迥非兵器所能比擬。唐、虞時代氏族社會的崩潰，夏代階級制社會的產生，都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即由於鐵器的出現。摩爾根說得對：

『鐵的生產是人類經驗中最重要的事件，沒有能夠和牠相抗，沒有能夠和牠……』

相等的，其批詞發明與發見，在地理學上是無足輕重，至少也是對於附屬的地位。譬如鐘、錘、斧、鋤，都是鐵製，還有整要用鐵尖，並有鐵錐；總之，文明的基礎可以說是建築在這種金屬上面的。（《古代社會三四頁》）。

虞、夏的鑄器除上面所舉的鐵釘、鐵劍、鐵斧外，牠無可考，然「夏后氏上匠」（《禮記冬官考工記》），必有不少的鑄製工具。證以「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文王有聲》）「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信南山》）這種偉大的工作，非有鐵製工具，是絕對辦不到的。

綜合以上五項來看，唐、虞、夏進入鑄器時代是無可置疑的。古史辨派，甚至於鋤頭考古學家爲成見所困，藉口夏代無銅器出土，斷定禹爲石器時代的人，藉口於商代無鐵器出土，斷定商爲「金石併用時代」，至多不過青銅器時代。然全世界至今無銅器出土，我們不能否認銅器時代有銅犁，中國至今也無鐵犁出土，我們不能否認鐵器時代有鐵犁。鋤頭考古學方在萌芽時代，未能發見多量的古物，有什麼奇怪？他們對於唐、虞、夏紙上甚至於地下（如鐵產，如出土的銅器）的材料盲目不見，妄肆譏評，這是科學的態度麼？我在十幾年前列舉議，標出上述的主張，「大胆」則有之，「妄爲」則未也。劉先生及其同志對於以上五大理由如不能一一推翻，也就沒有資格斥爲「玄學方法」和「一團糟」。

三 神獸論變不出把戲

劉先生以爲在他的大文第二項中給了我一種致命的打擊，在第三項便可放胆替楊寬先生有名的神獸論作辯護士了。可是楊先生明明說（一）帝俊、帝嚳、帝舜、大皞、顓臾、帝堯、黃帝、泰帝本爲上帝；（二）禹、勾龍、契、少皞、后羿本爲社神；（三）后稷本爲稷神；（四）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閼伯本爲日神火神；（五）玄冥（冥）、馮夷、鯀，共工，實沈，臺駘本爲河伯水神；（六）四岳（太嶽）伯夷、許由、皋陶本爲嶽神；（七）王亥、蓐收、啓、太康本爲金神刑神或牧神；（八）句芒、益、象、鸞、龍、朱、虎、熊、羆本爲鳥獸草木之神（古史辨七冊上編三九九頁）；「益就是玄鳥鳳鳥，是服侍上帝的……朱、虎、熊、羆原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在神話裏也是奉上帝服役的。」（同書同冊楊序五頁）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在神話裏也是奉上帝服役的。」（同書同冊楊序五頁）既有這大批名字的肯定的鐵證，能够因他說過「吾人證夏以上古史傳說之出於神話，非謂古帝王盡爲神而非人也。」（也許文王武王不是神！）「由

於原始神話分化演變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會之史影存乎其間，」等空話，或模稜兩可之言，遂爾狡辯，說「楊先生並沒有認爲『我國三四千年前沒有人的傳說或歷史，只有神和獸的傳說』嗎？我說：他總不能否認當時人的存在罷？」這明明是說：楊先生當然也承認三四千年前人的存在。劉先生既徵引了我這段話，忽然反問我：「如果沒有人，試問神話怎樣會產生的呢？」由人的傳說或歷史牽扯到人的存在，藉此來反駁我，這是一種賣弄小巧小智的搗鬼方法，「明眼人」肚子裏應當明白。

最好笑的是楊先生反駁郭沫若先生「動物名稱」爲殷人圖騰之說，連吳其昌先生的「豸（即夔）或亦一鳥首人身之混合圖騰乎」的話也不承認，說「然吾人以史料之不足徵，猶未敢斷然判定也。」（同書同編四〇四頁）這種否定圖騰的話，一到了劉先生的手中，便變成「楊先生也認爲這些神話有出於圖騰遺跡的可能」的證據！這種翻雲覆雨的手段是神獸論在無可奈何之中變把戲，怎樣可能呢？

末了，劉先生又將楊先生「古代神話之原形如何及其歷史背景如何，尙有待於吾人之深考」，作爲他的「審慎的態度，是科學的歷史家應有的。李先生不能因他自己的大胆妄爲，一定強迫旁人也用武斷的玄學方法來治史吧！」楊先生要深考神話原形及其歷史背景，說法完全是句空話，是他愈加向黑暗方面前進的指路碑，談不到什麼審慎。如果真要拿審慎來說，那就是他對光明一方面特別「審慎」，對於黑暗一方面非常不審慎。否則他對於歷史上有名的人物不致於連篇累牘地一律描寫成神和獸，而以玄學的頭腦去否定他人用圖騰解釋古史的企圖，並得意揚揚地說：

「近人之治中國古代社會史者，每好以圖騰解釋一切，其意不善，惜多臆慮，無法憑信耳。」（古史辨七冊上編四〇四頁）

這種說法是在「審慎」的假面具之下，否定他人科學探討的結果。他明知「由混合圖騰而轉變爲一地之神，此在古代社會中非不能有」（同書同頁），那對於變爲混合圖騰之說，即無紙上和地下的證據，應當稱爲一種合於科學的假設，比他的朱、虎、熊、羆、是鳥獸中的佼佼者……是奉上帝服役的「瞎說，不是直截了當而合理得多麼？不意他竟用「臆斷」兩個字輕輕加以否定，而認爲「無法憑信耳！」殊不知既是古代圖騰，自無文書上的證據，而我國的發掘有限，自更難得到地下的證據；然近代考古學者對於近代野蠻人所作科學的考察，發見類似的情狀，就是鐵一般的證據，那裏是什麼「

臆斷」，那裏又是什麼「無法憑信」？難道一定要像他一樣，滿口楚辭天問，淮南子修務篇，山海經大荒西經、海內經，再加上他自己的「當爲」、「當不外」、「乃又爲」、「當又爲」（姑以古史辨七冊上編一五二和一五三頁爲例），才算是有法憑信，不是臆斷嗎？以這樣混沌的頭腦治史學，劉先生稱爲「是科學的歷史家應有的」，「那他罵我『大胆妄爲』、『用武斷的文學方法治史』，也正是他的一貫的邏輯，絲毫不足爲怪的了。

四 棄實就虛仍救不了破產的公式

古史辨派的先生們大都是沒有受過現代科學鍛鍊的古史家（？），最初由於胡博士的搗搗，學術界的瞎捧（「洋大人」——尤其是美國「洋大人」也在內），得意忘形，志高氣揚地作出一些「八股式的理論」，經人反駁，自知不對，又不肯認錯，只好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偷偷地修改。然後用這些偷偷修改的話來作理論的中堅，或反駁他們的論敵。有的是全部修改；如這一派的「疑古大師」顧剛先生明明說：「……『偽書』上的事實自是全部，只要把書的偽跡考定，便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古史辨一冊三五頁）。這是『偽書中實史跡的斬釘截鐵的說法。但劉先生便修改爲：「……有些『偽書』並不全出憑空杜撰，其中有些部分也是有所依據的。」有的部分修改；如我在古史辨的解毒劑中詳細證明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完全建立在不言「不知」沒有的公式上，但劉先生偏說「事實上並不完全建立在『默證』上。」這「並不完全」四個字至少也反證他承認有一最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是建立在那個公式上的。既是這樣，他便不能不承認古史辨確是有毒，也不能否認我替他們配解毒劑的權利，爲什麼咬轉舌頭，硬說「古史辨本沒有什麼毒汁，而這服解毒劑裏却反而配有毒汁在內」呢？

最奇怪的是顧先生用實例證明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經我上次慎密的總攻擊以後，完全塌台，即好些向來深表贊同的人都翻然改圖，棄而不顧，劉先生竟代表楊先生，提出「后」，「帝」，「皇帝」，「皇」幾個空洞的字，作困獸之鬪。這是古史辨派那個破產的公式最後的巢穴，我們應先行介紹，然後犁庭掃穴，予以廓清。

『（一）從「后」，「帝」，「皇帝」，「皇」等神號漸次的產生，與「后」，「帝」，「皇帝」，「皇」等古史傳說的變幻出現，完全相合上，可以見到古

史傳說中「后」、「帝」、「皇帝」、「皇」等名稱是由神話中演化得來，而「夏后」、「五帝」、「黃帝」、「三皇」等古史傳說也由神話中漸次演變而出，「夏后」、「帝」、「黃帝」、「三皇」的古史傳說正同神話中「后」、「帝」、「皇帝」、「皇」等名稱的漸次出現相同，而後世的古史系統三皇五帝及夏商與相反，分明是層累成的了。

『（二）人間尊號的由「王」而「帝」而「皇帝」，正與古史傳說中古帝號之「后」而「帝」而「皇帝」而「皇」相合，分明人間尊號是受古史傳說的影響，而古史傳說的層累造成，也可證明。』

除了這兩段話外，還有第三段，但我以爲沒有介紹的必要。因爲那就在顧先生的舊把戲，所不同的只在顧先生說堯舜禹，而劉先生則改爲唐虞夏。顧先生的話既被我們戳穿，這裏自無容重說。現在應當考慮第一段話。這不用說，是本於楊先生所講：

「卜辭之稱「后」僅用於先王，此正爲「后」爲廟主之證。……「帝」之爲廟主之稱，雖曾一度見之殷代末年，入周以後，則未見盛行，及周末此制始盛如戰國稱秦、趙之先王爲先帝是其例。「后」之廟號盛行於前，「帝」之廟號行於後，古史傳說亦先見「后」之傳說，而後見「帝」之傳說，由此可見先王廟與神祇稱號之混同，實爲神話演變爲古史之最要關鍵。」（古史辨七冊上編一四〇至一四一頁）

楊、劉兩先生的說法，未免東挪西扯，穿鑿臆說。史記周本紀說：「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蓀，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這話如可靠，自然將他們的說法一齊推翻，係偽造，應提出有力的反證。這是第一點。史記作於漢初，然呂刑大概爲周初作品據說作於穆王五〇年，即公元前九二二年，內中有「上帝」，有「后」和「三后」（還有「皇帝」，不過原作「君帝」，詳見後），試問怎能分出「后」、「帝」的漸次產生？如果那篇東西根本靠不住，劉先生又怎麼說「禹本爲神的說法，尙書的呂刑就顯見」呢？這是第二點。古史辨的解毒劑第四項所引國語展禽的一段話，內中談到古史上的「后土」和「黃帝」。這也是周初的作品。又在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說：「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堯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天，故記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這話拿次末半內詳。難道這些都是周末

帝」之廟號盛行一後，而後見「帝」之傳說？」這是第三點。戰國中期的陳侯因齊承銘文中有一「紹神高祖黃帝」一語，難道這又是周末「帝」之廟號盛行一後，而後見「帝」之傳說？「前三種紙上的證據還可說是戰國末或漢初人爲着對古史辨派搗亂而故意作偽（但楊先生又告訴我們：「持託古改制之說者，竟請少數諸子之方是以徇僞古史，此未免誇大其辭矣！」——古史辨七冊上編一四八頁），難道這種埋在土中的金文也無緣無故地作偽麼？這是第四點。「夏后」，「五帝」，「黃帝」，「三皇」的古史傳說正同神話中「后」「帝」「皇帝」「皇」等神號的漸次出現相同。「四個神號的漸次出現」，本屬無稽之談，即退一步，假定確是如此，然「夏后」，「五帝」，「黃帝」，「三皇」的古史傳說和牠們並不相同。因爲後人對於五帝的說法，儘管極不一致，除掉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廖平尚書宏道篇外，其他如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淮南子天文訓，世本，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五帝本紀正義引譙周，應劭，宋均說，鄭注中候勅省圖，梁武帝通史和皇王大紀等，無不將黃帝列在五帝之中，即楊先生的古史傳說來源表（古史辨七冊上編三九八頁）也是如此。至於尚書序，帝王世紀和孫氏注世本則將黃帝列入三皇之中，才排出於五帝之外。劉先生代表古史辨所作的說明，「五帝」「三皇」之外，又跑出一個「黃帝」，如果要他，固然與神號「相同」，但有兩個黃帝（即除此特別提出的黃帝外，「三皇」或「五帝」中還有一個黃帝），如果不要他，和劉先生在「而後世的古史系統三皇五帝及夏」一語中偷偷地去掉一樣，那與神號便不相同了。可見「相同」也不對，不相同也不對，未免進退兩難！這是第五點。小小的兩段話包含五種矛盾，甚至於不能自圓其說，劉先生偏說「分明是層累地造成的了！」這真是「明眼人」的「分明」。

劉先生的第一句話既不能成立，第二段話更是亂湊的。「人間尊號的由「王」而「帝」而「皇帝」，正與古史傳說中古帝稱號之「后」而「帝」而「皇帝」而「皇」相合。」一方是三項，另一方是四項，試問如何「相合」得來？其實劉先生爲着「相合」的緣故，應在三項之後再添一「皇」字，因爲秦始皇稱「皇帝」之後，漢也稱「皇」，白居易有名的長恨歌劈頭一句，不是「漢皇重色思傾國」嗎？但這還是不行。人間稱號既是模倣古史而來，何以要以「后」爲「王」呢？這不是一開始就不「相合」嗎？現在再退一步，承認兩者勉強「相合」，然人間尊號的模倣古史傳說，又怎能「證明」

「古史傳說之層累造成」呢？譬如我們證明日本事事模倣德國，便因此證明德國事事模倣英國或美國嗎？像這樣的邏輯只有古史辨派的「明眼人」作得出！

綜合以上兩項看來，顧先生歷舉史實證明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公式，一經宣告破產，無論楊先生怎樣「利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古史辨七冊上編楊序二頁），藉空洞的名辭來修補，除掉愈加顯示其強辭奪理，矛盾百出，經不起紙上和地下材料的證驗外，是絕對沒有成就的。劉先生說「他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那不過是人們早已偵教的古史辨派的「理由」罷了。

五 人話與神話的因果倒置

神獸論是被古史辨派推爲「顧頡剛先生以後，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古史辨七冊上編自序二第二頁）楊寬先生的「最厲害的武器」（同書同處三頁）。劉先生和楊先生既結了不解緣，故對於我所說的人話和神話的關係，更賣盡氣力，大發議論，幾佔全文篇幅的一半。他抱怨我「並沒有讀懂楊先生的大著，」其實是他沒有讀懂拙作。此話暫且不提，先把他所說的要點介紹如下：

「顧頡剛先生和楊寬先生認爲後世堯、舜、禹、鯀的傳說，是由古代的神話演變而來，而那些神話決不是由於後世堯、舜、禹、鯀傳說的神化而來，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和證據的，最重要的是有着許多明顯的證據擺在眼前。

（一）這類傳說在時代較早的書籍上是神話，較後的書籍上才演變爲人話的。

（二）這類傳說在文化較高的中原地帶已爲人話，而在文化較爲落後的地方還是保持着神話的狀態。

（三）這類傳說在儒士的嘴裏是人話，而在民間傳說裏還是保存着神話的色彩。

（四）儒士們把神話潤色爲人話的痕跡，尙多可尋。」

這種說法不獨古史辨派視爲顛撲不破的「真理」，即「國人之治神話學者」和「邇來國內史學者」（參看古史辨七冊上編一一九頁註五），甚至於素來相信鑄師考古學的人們，毫無不表同意。可是自我們看來，這是根本錯誤的。最大的缺點是預先規定一個死教條，一口咬定古史傳說是由古代的

神話演變而來。橫豎這是死無對證的事，他們自然樂得一方面曲解『時代較早的書籍』，另一方面抱着『文化較為落後的地方』的山海經，楚辭天問一類書做『科玉律』——這樣雙管齊下，當然可以形成中國古史上的神獸論。例如他們視呂刑為『時代較早的書籍』，在裏面抄着『皇帝』，喜出望外地認為與『上帝』為互文，皇帝即上帝（周金中本有此例），於是把『夏后』（諸酋長）和伯夷，禹，稷（『三后』）看做上帝的屬神，說得天花亂墜。實則所謂『皇帝』，經典釋文原作『君帝』（指堯），『皇帝』係後人所改。統觀尚書各篇，如盤庚，大誥，康誥，多士，君奭，立政，呂刑，稱上帝達十五次之多，再也找不出用皇帝字樣（除掉呂刑中的兩次）與上帝為互文。尤其是作呂刑的人明明在講人話，是以人間的史實為範鑑，即揚棄前代的刑制，作成周代的刑典，絕無誦張神跡的意味；一講到神，即稱為『上帝』，稱為『天』，從不稱作『皇帝』，如『上帝不弔，降災於苗』，『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是』古史辨派不顧全篇文意，任意矯揉造作，未免和真相相去太遠了。

然他們最注重並最堅持的還在第二第三項。如用實例來說，就是

『墨子·楚辭天問，山海經等所載，乃傳說之初相，儒家所陳，輒多潤色之辭』（古史辨七冊上編二〇頁）。

好，我們就拿山海經和史記來對比罷。

『看西國談，寫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卵』（山海經大荒中）

『王亥子振立，振亥子季立』（史記殷本紀）

所謂因氏國是在東海之外，大荒之中，並非中國；操鳥食卵，自是生食中『潤色』一下，變成『冥亥子振立，振亥子季立』，『振』，世本作『核』，顯係核之誤，而核又是亥之通假字。山海經和史記各持一說，到底是那一方面對？那一方面是『初相』呢？幸有殷墟卜辭來做鐵面无私的裁判官；牠宣佈王亥不是大荒之中因氏國的生食之人，而是中國熟食之人，係殷民族季

冥之子，上甲微之父，即殷人的祖先，故稱之為『高祖亥』（殷書堂文字一，四），『高祖王亥』（殷虛書契後編一，二一，一三），而以亥日祭，用牲之數，有時多至三百牛。這不是對古史辨派的死教條的一次諷刺畫麼？

什麼『困民國』之人，到底還是人。再看楊先生運用他的『最廉價的武

器』，根據楚辭天問和國語晉語等書，說王亥即蓐收，『蓐收本為金神，』『蓐收本又為刑神。』（古史辨七冊上編三八〇頁）依照他的『八卦式的理論』，此『乃傳說之初相』，『而山海經大荒東經郭注引古本竹書紀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話中演化而來。』可是碰着硬硬綿綿的銅甲獸骨的卜辭宣佈『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麼『金神』，『刑神』。這使『集一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變成當面說說，未免有點難為情罷。』

我們已經介紹過：古史辨派力持『從『后』、『帝』、『皇帝』、『皇』等神號漸次的產生，與『后』、『帝』、『皇帝』、『皇』等古史傳說的變現，完由全相合上，可以見到古史傳說中『后』、『帝』、『皇帝』、『皇』等名稱是神話中演變而來。』這也是把此等神號當作『初相』。我們已經說過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現在從造字上也可以顯示出來。卜辭中的毓字从女从古，或从母从古，或从人从古（『后』），象產子之形，是其本義。這就是『后』字，『即人的偽變，『后』即古（倒子）的偽變（王國維說）。』卜辭用作后禘之后禘和先後之後。帝為帝之初子，象在『蓐』全形，皇原訓冕，牠們最初都代表人類社會的事物而不代表神號，可見神號不是初相，也不是古史傳說所由演出的。

其實楊先生對於這一點，也曾入云亦云過說地：

『蓋神之境界雖出幻想，而實為當時社會環境之反映。』（古史辨七冊上編二〇〇頁）

神既『出幻想』，而實為當時社會環境之反映，『那麼，古史傳說至少至少有一部分由社會環境直接產生出來，為什麼定要開撥經過幻想的神話演化而來呢？他們這班教條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是無法答覆的。』由此又可以證明他們雖襲取了一點社會科學的皮毛，黏綴在自己的著作中，實在並不了解，更談不到活用。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古史傳說中雜有若干神話的材料，但絕不以神話為唯一無二的來源。例如太史公說：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雜辨先生雜言之。……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予，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史記五帝本紀贊）

這表見太史公做黃帝紀，對於書本上和民間的神話以至傳說，儘可能考慮過，然去取之間，經過了一番斟酌損益。他雖仍不免採用神話（如封禪書言黃帝鑄『鼎』成，有薄垂胡而下迎黃帝，黃帝上騎『之類』，但就『若神

先生難言之。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道。『封禪書』等語看來，對神話是去的多而採的少，而對人話則必定採的多而去的少。所以他雖沒有考古學的知識，所紀錄的黃帝『蕪五種』，『時播百穀草木』（五帝本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封禪書），竟與現代考古學所證明的相合。這一類的材料是神話中所具有的嗎？是從神話中演化而來的嗎？古史辨派的先生們應當深深地考慮一下。

末了，我要談到劉先生『並沒有讀懂』古史辨的解毒劑，而大發議論一點。我說楊先生『只知道堯舜禹舜之事初為神話，不為人話』而不知關於堯舜禹舜的神話原是由人話轉變來的。這和我在牠的上面一節所說『一切神原來都是酋長，帝王，大戰士，聖賢，或造福人類的人，他們在生前既已出類拔萃，所以死後便逐漸被視為神明了。』一段話相呼應的。劉先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偶然誤解那句話，竟徵引楊先生從書呂刑，洪範，詩玄鳥，墨子非攻，尚賢等篇所搜尋的堯舜、禹、舜的神話一大段對我示威，於是說道：

『這些證據，楊二先生曾提出很多，我們怎能倒果為因，便說前出的神話是由於後出的傳說演變的呢？』

神話（牠本身就有問題，如楊先生指出刑為神話是）與傳說，那是前出，那是後出，有時很難確定。即令神話前出，傳說後出，也不見得即有因果關係，山海經和史記對於王亥的記載不是一個明證嗎？現在即退一萬步，假定楊先生那一大段話是對的，也不能推翻我的說法。因為我的原意是在指出堯、舜、禹、舜都是人，因有大功德或大惡跡，死後便被人們逐漸神化了。試問這和前出的神話與後出的傳說有什麼關係？我明明說堯、舜、禹、舜的事初為人話，惟其為人話，所以有一部分直接流傳下來，有一部分却轉變為神話了。被轉變的部分的原形，除掉因地下的發掘，獲得新材料外，恐怕永遠看不見了。至於後人將這種神話再轉變為人話，另是一回事，和我所說的『初為人話』自難一致。劉先生對於我所說的『初為人話』輕輕改作『後出的傳說』，轉過來問我：『怎能倒果為因？』這未免太取巧了罷！

說到這裏，劉先生一定有些不服氣，要反駁道：『你在古史辨的解毒劑中不是徵引展禽的一段話，表現周棄，后土，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契，冥，湯，文，武，原都是人，而死後才被尊為神嗎？這不明明是以前出的神話為起於後出的傳說，倒果為因嗎？』不然，大大地不然。這

周初人根據他們的人話的傳說所作的報告。劉先生如不能提出鐵一般的證據，證明那段話是後人偽造的，便沒有資格說神話在前，古史的傳說在後，因為那段話的出現，遠在墨子，楚辭天問和山海經等書之前，怎能說前出的傳說是後出的神話的演變，倒果為因呢？

至於劉先生等說儒士將神話潤色為人話，我承認這是有的，他們的動機和行為也並非不正當。因為有好些史前的人物，如有熊氏，初本為一個氏族的酋長，因具有特別才能和功績，死後被人神化了，稱之為黃帝，於是傳說與神話交織在一起。研究史蹟的人一方面要存其真，另一方面思去其偽，而對於流行久遠的神話又不能乾脆予以否定，只好十分遷就地修改一下。試拿孔子家語五帝德中宰予問黃帝一段話為例：

『黃帝三百年；堯間黃帝者也，則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

『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後；故曰黃帝三百年。』

這種問答自然是後來儒士的假託。不過在沒有動用考古學的當時，他們要剝去黃帝身上的神袍，無所取證，只好這樣解釋一下：黃帝雖有三百年的神話，畢竟是人不是神呀！這比起古史辨派在原子能的時代，還想盡方法去擁護楊先生以至郭先生引經據典所證明的黃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的玩意兒，不是高明得多，進步得多嗎？

現在總括起來說：古史傳說的來源是多元的：一部分來自人話，一部分也許來自神話。兩者的比例，因人（古人與作古史的人）而異，原無一定，不過在一部够得上信史資格的史書裏（如史記之類），大概是人話多而神話少。古史辨派的先生們不懂得這種真偽，於舉史例證明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公式破產後，仍企圖用『后』、『帝』、『皇』、『皇』、『皇』幾個空洞的字證明古史的傳說係由神話演化而來，並徵請沈雁冰，馮承鈞，姜亮夫，和陶希聖諸先生作陪（參看古史辨七冊上編一九頁註五），藉壯聲勢。這樣雖是簡單而一元化，但處處和古代史籍相抵觸，尤其是卜辭的『高祖亥』，『高祖王亥』批准了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而否定了山海經一類的神話書，遂使這個公式不得不行宣告破產。

六 腰斬中國歷史的翻供

劉先生的解毒劑末了一項是：

『最後我們還得指明，古史辨並沒有腰斬中國歷史，只是想把虛偽的古史傳說回復他本來的神話面目，準備進一步從神話中再探索遠古的歷史背景的，如果認為古史辨只幹着破壞歷史的工作，殊不知他們的破壞偽古史，是要把古史傳說還其本來面目，回復其史料上的原有價值，也就在建設新的古史呵！』

這完全是說謊。適之先生明明『要把古史縮短二三十年，』顧先生明明『要從四千年的歷史跌到二千年的歷史。』（古史辨一冊三一和三四頁）不是腰斬中國歷史是什麼？胡先生後來更說：『顏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一劈直劈到禹。』（同書二冊三三八頁）不是腰斬中國歷史又是什麼？這樣明白的事實，劉先生能够否認嗎？

好，我們現在不咎既往，專就劉先生代表古史辨派所修改的計畫，平心靜氣地予以考慮罷。我以為他們的方法是玄學的，計畫是糊塗的。古史傳說的來源，上面已經證明是多元的，絕對不是完全由神話演化而來。現在要『回復他本來的神話面目，』如何辦得到？再拿黃帝來做例子。你們雖然可以說黃帝就是皇帝（兩者是否因音同而為同一人物，自然還有問題），也就是上帝，把他送上天去，算是『還其本來面目』了，但有熊氏又安置於何處？照楊先生的說法，熊是『林上帝服役的』，也可送上天。不過黃帝既是上帝，有熊氏竟變成上帝的奴才，這如何可能？不僅這樣。黃帝『執五種』，『採首山銅』等事又如何安置在天空？一律斥為史家任意附會，不管嗎？但史記股本紀和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偏得到卜辭的證實，二千年前史家的附會竟和現代銅頭考古學的成績相印證，完全不管，又怎樣說得過去？這是第一點。

治古史如不能利用現代科學做標準，是絕對弄不出成績來的。古史辨派的致命傷正在這裏。他們的一切去取，全憑腦袋中一種玄學方法，談不到科學。否則他們根本不會將全部古史的傳說歸結到『后』、『帝』、『皇帝』、『皇』幾個神號上去。他們現在的工作是靠神話吃飯。劉先生並且鄭重告訴我們：『在文化較為落後的地方，還是保持着神話的狀態，』由於淮、楚地帶的楚民族一直到戰國、漢初，還保持着濃厚的宗教色彩，所以神話的原形還都保持。『同樣，我們也可以做這種話說：』在文化較為落後的地方，還是保持着神話的狀態。『由於粵、桂地帶的苗族、獠族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濃厚的宗教色彩，所以神話的原形還都保持。』就文化落後和宗教色彩濃厚講，現在的苗、獠遠在周未楚民族之上，最够得上古史辨派所規定的資格。

又誰能料到童書業先生突然宣佈：

『大約盤古……決無其人。』（古史辨七冊上編自序二第二頁）

據苗、獠自承，盤古是他們的祖先。什麼盤古（淮安）、盤古亭、盤古祠（廣陵）、盤古山（江西會昌）、盤古壘（湖南湘鄉）、盤古皇（廣東花縣地名）、盤古墟（高要）、盤古嶺（廣西平樂）、盤古村（武宣，有三處）……簡直整個不休，古個不已。像這樣遺跡衆多的神話是我國任何神話所不及的，竟被古史辨派宣佈應當落空，不是和他們所守的教條相抵觸嗎？不是將他們『把虛偽古史傳說回復他本來的神話面目』的基礎搖動了嗎？其實這也無怪其然。連楊先生也說：

『民間傳說每多荒唐。』（同書同冊一六四頁）

這所謂傳說自然是指神話。然山海經上的神話也够荒唐的了，怎能把牠當作『初相』，而使古史的傳說回復到這種神話的面目上去呢？這是第二點。

基於以上兩種理由，古史辨派想把『古史傳說回復他本來的神話面目，』完全是一種幻想，絕無成功可能。現在再退一萬步，假定他們能够成功（像現在的胡說八道，不能算為成功），也決不能『進一步從神話中再探索遠古的歷史背景的，』因為自從遠古的人話變成神話，除掉人話中殘存的一部分遺傳下來，保存在古書上外，若非地下有新的證據發見，再也無法探索了。古史辨派所恃的唯一的武器是山海經、楚辭天問、淮南子等寥寥幾部書，他們的『回復』工作一經做完，已經鑽入牛角尖端，怎樣能够再進？所謂『準備進一步，』只是掩飾他們工作的反動性的說法，只是自欺欺人之談，絕無實現的可能。因為紙上的材料用完了，地下的材料沒有出來，怎樣動手？何況他們對於現已出土的地下材料都無法正確利用，怎能正確利用將來新出土的材料呢？他們以為『破壞偽古史，……也就在建立新的古史，』這樣連破壞和建設的意義弄不清，還有什麼話可說？即令他們弄清了，就他們現在的能力講，要擔任『建立新的古史』的責任，也就等於癡人說夢。這是第三點。

古史辨派只承認破壞『偽古史，』不承認腰斬中國歷史。但他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古史雖被後人加上『皇』（三皇）、『帝』（五帝）一類的尊號，並編入不少的神話，然並非全偽，真的因素仍佔一大部分，觀於有巢、燧人、伏羲、神農以來社會發展的步驟，山穴居野處，採取果實的食，而漁獵的熟食，而牧畜，而農業，次序井然，有條不紊，就可以知道。這和現代考古

學的證驗，完全相符。楊先生硬說「此等歷史進化觀疑皆得之邊裔民族之觀察。秦晉漢楚之間，夷狄雜處，所見文化，程度不一，其進化之跡顯然。」（古史辨七冊上編一一四頁）其實秦、晉、淮、楚之間，不過數千里，夷、狄雜處，佔地不過數百里，至多不逾一千里，古代地力有限，故人口稀少，尤其在採取果實，從事漁獵的地帶是如此，試問能養活多少夷、狄？而這少數夷、狄竟能代表人類幾萬年的發展步驟——從採取果實，到漁獵、牧畜、農業——供我們祖先的「觀察」。天下神奇的事有過於此嗎？古史辨派的先生們如果有絲毫科學的頭腦，便應當拋棄他們亂七八糟的幻想，馬上改變他們治古史的態度，絕不能將全部精力花在一種「不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事業上；就是大張旗鼓，把「古史傳說回復到他本來的神話面目」上去。他們只須利用現代考古學及其他有關的科學的成果，隨時附帶揭破古史傳說中偽的成分就夠了。失此不圖，竟假辨偽之名，將真的一齊推翻，並且還斥爲「偽古史傳說」，真是豈有此理！這是第四點。

楊先生十六萬字的中國上古史導論最後的結論是：

『據吾人之考辨，東方之原始神話主要僅六神：一、上帝高祖（帝），二、后土（契），三、勾芒（益），四、祝融（或朱明昭明），五、啓收（王亥），六、玄冥（冥）。西方之原始神話，主要的實僅五神：一、上帝（顛頊，堯），二、后土（禹），三、后稷，四、太岳，五、炎帝（至於黃帝乃皇帝之尊稱，「泰帝」乃「太帝」之演化，已非原始神話）。』（古史辨七冊上編四〇八頁）

所謂東西兩方的原始神，就是殷、周兩民族的原始神。關於玄冥等，卜辭明示爲殷代的先公先王，楊先生也硬要作爲神送往天上，這種武斷的態度，真是學術界所罕見。他們這樣破壞「偽古史」，仍舊是貫澈胡、顧縮短古史的主張，尚以前的古史完全看不見了。試問這不是腰斬中國歷史是什麼？這是第五點。

綜合以上五點，可以看出古史辨派二十多年來的工作，是對古史剝皮，抽抽筋，終於掏腰一刀兩斷，弄得血肉模糊，慘不忍親，便加上一襲神袍，送牠歸天，真是功德圓滿，法事周全！

七 結 論

昔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一個人能知道自己的錯誤，應是一樁可喜的事。尤其在學問上的錯誤，更是我們這個學業荒落，青黃不接的國

度內萬難倖免的事。錯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不接受他人的忠告，缺乏改正的勇氣，惟一味文過飾非，自欺欺人，便會造成一個嚴重的問題。古史辨派所標榜的屠某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公式，自以爲巨眼卓識的大發見，前後鬧了二十多年，復狂於十幾年前論爭中不斷的小勝利，於是不可一世，近幾年來又大吹大擂，以利用神話學清算「偽古史」，建立新古史和號召。其實這一公式始終沒有爲學術界所公認，牠只做到「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上次經我們的全面進攻，弄得牠焦頭爛額，體無完膚，人心爲之一快。他們應當深自反省，翻然改圖，才不失爲忠於學術的勇士。不意爲着面子的關係，竟老羞成怒，由劉先生出面，死力反攻，理屈辭窮，難以諷馬。我此次爲他的大文進一解，並不是通常所謂解釋，仍舊是解毒。因爲我的第一劑攻毒藥雖將二十多年的老毒攻破了，但餘毒未淨，復肆披猖，不得不再補一劑，以絕根株。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草成

本誌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時事評論（五篇）	鶴臯等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陳人白
維新與革命	唐虞世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西岑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竹雲龍
戰後蘇聯之經濟	彼得F·戴勒略著·劉少嚴譯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李季
行不得也哥哥	歐伯
回頭是岸	冰夷編譯
論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朱維基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英C.考特威爾著	李毓鏞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續）	謝少翁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蘇閑
旅途隨筆（自重慶到上海）	劉朝真
『勝利』在珠江（廣州通訊）	編者
編輯餘談	

法，都須加以適當的形容辭去指責的。果真應當如此，那李先生何以自解於他過去批評胡適之先生及其他論敵時所採取的態度？假如人們也學着李先生的辦法，將他的『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及他的論戰文章（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文章等）中對於他的論敵所使用的『一切形容辭統統搜檢出來，我想一定可以編一部『小辭典』，或者也可以叫做『針鋒不相對的宣傳式論戰法』的『術語辭典』，未知李先生對此將何以自解？在最近求真創刊號上發表的『古史辨解毒劑』一文中，李先生不也是用了許多挖苦和譏諷等的形容辭以指責了他的對方嗎？（就標題的『解毒劑』看來够挖苦了）即以這次『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來說，李先生雖自己聲明『願平心靜氣地提出全般問題來加以討論，希望歐伯先生也採取同一的態度，減少宣傳式的說法』。可是在這一自稱『平心靜氣』和非『宣傳式論戰法』的文章中，我們仍然看到了『偷天換日，自欺欺人的宣傳手段』、『矯揉造作』、『莫明其妙』、『未免有些可憐』、『費盡氣力去強解』、『牛頭不對馬嘴』、『一無所知』、『東拉西扯』、『大玩其宣傳手段』……等等一大堆責罵的形容辭。假如不是『平心靜氣』的話，那不知道李先生還要『嵌人』一些什麼樣的形容辭來進行『宣傳式的論戰』哩！然而我却不注意這些。

在我看來：凡是在思想論爭的過程中，參加論爭的各方面互相搜尋對方的『錯誤』，抓住對方的『弱點』來加以批評、指責、駁斥，甚至尖銳的諷刺或嚴厲的攻擊，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批評、指責、駁斥、諷刺和攻擊時，又絕不可免地要使用某些一定的形容辭或術語。問題絕不在於不應使用形容辭以形容論敵的思想和方法，而只在於形容得究竟『適不適當』。假如形容得不適當（李先生就常犯這種毛病），對於論敵不但毫無影響，反而暴露了自家的弱點。所以使用形容辭或術語以指責論敵時，必須儘可能採用合乎科學的術語，盡量作到『以真名呼實物』，不可只圖一時之快而輕率從事。然而這還不過是些論爭態度上的技術問題而已。在論爭時最緊要的是：必須嚴格注意所爭論的問題的思想本身，注意對方的思想體系及其要點；儘可能避免斷章取義，飾外生枝，離題發揮，咬文嚼字，……一類的把戲；嚴守正確的科學方法論，盡量從理論上和事實上（或在事實上）加以批評和闡發，務求達到真理而後已。凡是學術思想的論爭，『旨在求真』，個人的勝負是無關重要的。爭勝了，固然可算是一種榮譽；即使爭輸了，只要有勇氣在『真理面前低頭』，也算不得什麼恥辱。但如果一味企圖取巧爭勝，或

『死要面子』，不顧真理，那就不但毫無結果，反而一定要愈加暴露自家的弱點和錯誤的。再重複一句：對於任何學術思想的論爭，必須嚴格地遵守科學的方法論，特別注意所爭論的問題的思想本身，抓住論敵的思想體系及其要點，從理論上和事實上予以批評和闡發，務求達到真理而後已。這便是我認爲『嚴格的科學態度』，也只有如此，才能稱得上嚴格的科學態度！至於當爭論時採用什麼形容辭或術語以指責對方的錯誤，是無關宏旨的。

我在『回頭是岸』一文裏答覆和批評李先生時，正是採用了『嚴格的科學態度』，這有原文在，可資覆按。至於我對李先生的思想和方法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辭和術語，雖然引起了對方的『心理悻悻然』，但在我只是實行的『以真名呼實物』的原則，故直到現在，那些形容辭還是保持着它們全部的效力。

可是，李先生的論文，連這次『平心靜氣地』寫出的『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在內，都是缺乏『嚴格的科學態度』的。因爲李先生既完全忽視了老、孔思想的體系及其核心，而對我解釋老、孔思想的主要論據又故意躲避（例如：我在『回頭是岸』最末提出老、孔根本不同的四個要點時，李先生對於前三點即置而不論，單從第四點作文章），始終只是依照他二十年來特有的成見翻來覆去地兜圈子。至於『斷章取義』、『離題發揮』、『任意附會』、『咬文嚼字』在這次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例如：當我指出老子那時尚未發明『烏托邦』等的術語而不得不用傳統的『國』字以形容他的理想社會時，李先生便一把抓住了『烏托邦』的『邦』字，從周禮、詩經，乃至金文和甲骨文中去大肆搜羅，將『邦』與『國』大大地對比了一番，文長至一千數百字，真叫人看了『莫名其妙』！原來烏托邦這一術語是譯音，意思是空想主義或空想世界，李先生不是不知道的。但爲什麼偏要將這個譯音的『烏托邦』的『邦』字割裂下來，『引經據典』地大作其考據文章呢？這不但是表示『有意』『丟書袋』，炫耀自家懂得金文、甲骨文之類的『淵博』，而且是更古怪地暴露了『東拉西扯』、『牛頭不對馬嘴』哩！如果像這樣地瞎扯下去，簡直有如我們的俗曲中之『十八扯』，扯一輩子也是毫無結果的，只是徒然愈扯愈糟而已。因此，必須忠告李先生，像這樣的扯法，我是不來的。

我在這篇論文裏，還是保持我原來嚴格的科學態度，只是從老、孔的思想本身上來同李先生論辯，並以此擊破其根本謬誤。至於李先生扯出來的許多雜零狗碎的詭辯，非絕對必要時不作解答，寧可讓讀者自己去理會。因爲只

要將老、孔的根本思想弄清楚了，那些雞零狗碎的問題自會烟消雲散的。

此外，我還必須聲明：我們這次關於老、孔思想的論爭，純粹是一種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又因為老、孔的思想在我國二千餘年來的社會史發展上會起了重大的作用，對我國的社會人心發生了鉅大的影響，甚至直到現在還未曾終結，所以我認為在得化一些時間來對他們的思想重新作一番科學的檢討和評價。但要作到這一點，我們這次參加論爭的人們就必須採取真正嚴格的科學態度，儘可能將老、孔思想的本來面目從已往烏烟瘴氣的混亂和歪曲裏掘發出來，再現出來，以便正確理解它們在當時及後世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以便作一次正確的清算。因此，我特別希望李先生及其他參加這次論爭的先生們，都能以「追求真理」為主，保持思想家的風度，批評儘管批評，駁斥儘管駁斥，但絕對不要走到意氣用事，無聊謾罵，使這次的論爭又重蹈以往的許多思想上的論爭的覆轍，弄得無結果不歡而散吧！

二 關於老子的時代問題

老子的生存年代，原無問題，但自梁啟超提出六項懷疑說之後，已被人們攪得極爲複雜，致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若要對這一糾紛問題作一番詳細的檢討，不但須要寫專門的文章才行，而且也不容易得出最後公認的結論來。我個人在論「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曾採取了胡適之先生的判斷，即是認定老子約生於公元前五百七十年，與孔子同時，並略附解釋。但這次蔡尚思先生在「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求真第三期）一文中，又重複把老子的時代問題提了出來，他除指責李先生對此問題前後矛盾之外，並批評我「很信古」。同時李季先生在「再論老子和孔子」一文內也提出了他關於老子時代的修正意見，即從「戰國時代的末年人」改爲「戰國時代的中年人物」。雖然我不願意在此種專論思想的論文內來作考據工作，但蔡、李兩先生既已把問題提了出來，我也就不得不在此裏略略停留來解釋一下。

蔡尚思先生說：

「意見和李先生對立的歐伯先生也很信古的說：『梁氏的懷疑理由，經過許多人的批駁（如張煦、葉青等）之後，很少能站得住。……孔子曾問學於老聃，不僅爲史記所大書特書，爲老派的莊子所數數稱道（見莊子天道、天運和外物諸篇），而且爲門戶成見素深的孔門弟子所迭次引據（見禮記曾子問），這證明孔子曾見過老子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見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其

實，歐伯先生的議論，早在梁先生擊破之列。梁先生說：『……三、就令承認孔子曾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然照禮記管子問篇看，此人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記關於老子的紀述，十有八九是從莊子中天道、天運、外物諸篇雜湊而成，那些故事有些屬於老聃，有些屬於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確定。』

但蔡先生所引出梁先生的「三」「四」兩點意見，是經不起批評的。第一、禮記管子問篇把老子描寫成爲「一個拘謹守禮的人」，這只能說是孔門弟子眼中的老子，這正同莊子一書中，把孔子描寫得儼然一個「道家」（如德充府篇孔子與顏回的問答）或老子的崇拜者一樣（如天運篇孔子見老子後對子貢的表示）。如果相信莊子書中所描寫的孔子，那我們也可以說：『和論語的精神相反』。第二、「史記關於老子的記述」，假定「十有八九是從莊子天道、天運、外物諸篇雜湊而成」。但莊子這幾篇所說及的「故事」明明「確定主名」，即指的是老聃——孔子問學過的老聃，完全沒有提到老萊子或其他的人物。蔡先生說我的「議論，早在梁先生擊破之列」，實際上是蔡先生沒有看出梁先生的「議論」是「不堪一擊」的。

更有進者，我們從道家思想發展的進程上看來，如果承認梁先生斷定老子是戰國末時人的說法，那無異於承認老子是生在莊子之後，老子一書更不用說是出在莊子一書之後了。然而莊子書中所重三復四地徵引老子一書的文句而詳加解釋和發揮，像這樣的事實將何以說明呢？而且純粹從莊子思想的邏輯上說，如果沒有像老子那樣的思想存在於前，也是無法解釋其思想的淵源的。我們只要將老子和莊子兩書中的思想加以較爲精細的比較研究和分析，便可以發見後者在在都是在盡力解釋和發揮前者的思想邏輯，雖然其解釋與發揮另有偏向，但兩者思想上邏輯聯繫是十分清楚，而且絕對不可否認的。可是梁先生及其他的附和者們，却完全忽視了這種思想邏輯發展上的聯繫，以致弄到結果使「歷史顛倒」（即將老子放在莊子之後），這不能不說是對玄學家們的一種諷刺！

至於蔡先生提出：『莊子多寓言而非信史』，『老子有重禮反禮兩個』，並徵引宋明以來諸家（如羅璧、方鳳、姚鼐及陳師道、張載和宋無名氏等）——請參閱求真第三期三九頁）的意見以資左證，希圖以此來加強梁先生的主張。第一、我們且承認「莊子多寓言」，但可否就此得出一結論：莊子書中所敘述的人物與事實，全是虛構或偽造的！恐怕就是蔡先生自己也不敢作

這樣肯定的結論吧！因為即是『寓言』，其中也常常包含着若干可信的『史實』。例如『山海經』，以前是被認為最『荒唐不經』的著作，然而現在却已被人考證它當中所說及的人物和山川地域（例如『王亥』就已被甲骨文的發見所證實）等有許多是真實的了。就莊子一書說，例如其中常所提到的孔子與其弟子顏回、子貢等的問答，也許那些問答全是虛構或『寓言』，但你却不能否認在春秋末確有孔子及顏回、子貢的存在及他們的師生關係。莊子及其門徒都自認是老聃之『道』的繼承者，這是莊子一書中明白地表現出來的。難道他們對於自己根本思想上的，且最為崇拜的先師老聃，還一點不知道而要任意虛構嗎？而且必須明白：老子和孔子在當時的思想界是已經起了鉅大影響的人物，且距離莊子為時不遠，莊子或其門徒對於這兩個著名人物及其關係是絕不敢隨便虛構的。否則，一定會引起敵派儒家者流的指責和揭破。就儒家大師，像稍後於莊子的荀卿，雖對莊子的思想大加批評，但對它描寫孔子見過老子的事實，却未曾有一語指責；往後，儒家的禮記不僅沒有指責，反而完全承認加以引述了。單就這幾點，也就足以證明孔子見過老子，至少老子與孔子同時，在西漢以前是一公認的不成問題的事實哩。

第二、關於『老子有重禮和反禮兩個』的問題，蔡先生並引張載的話為證。張氏說：『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襄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殊不知這正是梁啟超的『六項懷疑說』之第三項的來源，這我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了。至於陳師道說：『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次之，闢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闢楊之後，孟荀之間乎？』『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殊不知楊子正是老子思想的一派代表，在戰國中期影響最大，所以孟子特舉而闢之。孟子之『闢楊』，正是『闢老』。

李季先生關於老子生存的時代，在他的『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中，除完全贊同梁氏的六項懷疑說外，並企圖自老子一書內摘出有關於經濟和技術的幾個文句（如『不貴難得之貨』及『人多技巧』等），企圖以此從工商業和技術的發展上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而是戰國末期的人物。但他現在又說老子是太史儋，以此將老子的年代提到戰國中期，即『後於孔子百二十九年』，『比孟子約早二十多年』。單由李先生對老子的時代這種移動看來，至少可以證明他以前從工商業及技術發展的觀點上所判定老子的年代，全是一種空洞的武斷了。假如像李先生現在的判斷，老子真是太史儋，『約大孟子二十多

歲』，而老派的莊子又差不多與孟子同時，我們試問：為什麼莊子及其門徒們還要重三復四地敘說老子見過孔子的一些故事呢？距離當時不過數十年的人物，可以隨便瞎造嗎？而隨便瞎造又可以避免敵派的攻擊和揭穿嗎？這些問題都是無法加以合理的解釋的。所以我說：老孔的門徒們都同樣承認孔子見過老子，是西漢以前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梁啟超及其附和者們，企圖用懷疑主義來推翻莊子和禮記關於老、孔關係的記載，實在是經不起批評的。像現在的李先生，昨天還肯定老子是戰國末期人，今天又修改為戰國中期人，但不知明天又將老子定為什麼時代人？

最後，我應當申明一句：關於老子生存的時代，只要有人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莊子、禮記及史記等所記載的全是錯誤，我是毫無成見的。但像梁啟超及其附和者們所提出的一些懷疑說，不但是出於臆測，而且多是自相矛盾。因此我寧願採取舊說，不怕人們賜以『很信古』之譏。

三 李季先生對於老子哲學的『影子』觀

李季先生在『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中只承認老子的一元論和辯證法『也許還有一點影子』，因此我批評他『帶的是特殊的玄學眼鏡』。於是李先生更加不服氣，便特闢『老子的辯證思想的評價』一節來辯護自己。他說：

『辯證法所以可貴，因為牠是自然界一種活潑潑的法則，因牠含有正、反、合三個局面，代表發展。即以穀為例，最初是正，把牠種在泥中，發芽生根，將原來的種子否定了，這是反。後來成熟為穀，便變成爲合。……在思想中，辯證法要有這樣的發展，才可寶貴，否則不成其爲辯證法。……歐伯先生說：『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滿了有——無、善——惡、禍——福、盈——虛、剛——柔、曲——直等等對立的公式。』但這種對立只是單純的對立，別無所有；如果勉強稱為正反的話，便沒有合，即沒有發展。』

因此，李先生便斷定：

『這種沒有成熟的玩意兒實既低下，單是量多有什麼用處？』（求真第一卷第三期四一頁）。

這段話，不但充分暴露了李先生是一個可笑的機械的玄學家，對於老子的哲學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意義毫不了解或完全抹殺，而且證明了他對於一般辯證哲學的了解也是異常機械和片面的。

首先，辯證法絕不僅僅『是自然界一種活潑潑的法則』，而且是人類社

會乃至人類精神界的『活潑潑的法則』。用恩格斯的話來說，辯證法乃是自然、社會和精神界運動的一般法則（見反杜林）。其次，『辯證法的所以可貴』更絕不是限於『正、反、合三個局面，代表發展』這一法則。據恩格斯的意見，辯證法包含有三個最基本和重要的規律，即：『對立的統一』、『量變質和質變量』及『否定之否定』（見『自然與辯證法』）凡是自然、社會及精神界，如果沒有對立或矛盾，便根本沒有運動和發展的可能（黑格爾說：『矛盾推着運動而前進』）。如果沒有質量互變，更加談不到發展。然而，李先生所謂『所以可貴』的辯證法則，不過是恩格斯所指出的三種基本規律中之一而已。並且依照列寧的意見，『對立的統一』或『統一的對立』是辯證法的『本質』。他說：『通常對於辯證法的這一方面（例如蒲列哈諾夫）是不十分予以注意的。……對立物之統一性（更正確些說『統一』……）的意思，是認識自然的一切現象與進行（包含精神與社會）的充滿矛盾的、互相排斥的、互相對立的傾向。對於一切世界之進行，如對於『自身運動』，如天然的發展，如在生的生存的認識的條件，就是牠們的對立物之統一的認識……』（中譯『辯證法經典』——亞東圖書館出版）。而李先生談到辯證法的『所以可貴』時，對於『對立的統一』這個『本質』的辯證法則，不但不十分予以注意，簡直把它完全抹殺了！這正是李先生從老子的辯證哲學中只能看到『也許有一點影子』的根因。

實際上，老子的哲學，他的一元論，尤其是他的辯證法，乃是中國古代思想上一種最富天才、最為光輝的表現。因為老子的辯證法，恰是列寧認為『本質』的『對立的統一』的辯證法（雖然尚未發展到完整的程度）。此種辯證法，據我們現在所知，在西方古代社會裏，只有古代希臘的赫拉克利特曾經第一次把它表現了出來。正因此，黑格爾和恩格斯都極力推崇他是古希臘的一個最偉大的辯證哲學家。老子的辯證法，固然帶着消極性，沒有能像赫氏那種富有積極性的和鬥爭性的精神（請參考求真創刊號四〇——四一頁），但在中國，甚至在全東方，老子的辯證思想總是最可注意，最為光輝，最值得推崇的。

不錯，老子的辯證法還沒有發展到『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的高度水準。但如果以此來輕視老子的辯證思想，如像李先生竟因此而說出『不成其為辯證法』，『這種沒有成熟的玩意兒質既低下，單是量多有什麼用處？』這就不但暴露了他本身對於辯證法是一個外行，而且也太唯心主義了！

因為辯證法思想也同其他的事物一樣，有它自己的發展進程，而其發展又全是受歷史發展的條件所決定的。高度的辯證法思想，絕不是任何時代隨便可以產生的，只有在高度發展的社會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量變質和質變量』及『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思想，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即資本主義高度的生產方法，階級關係及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反映在人的頭腦中之綜合的產物。黑格爾之完成辯證法的高度發展（且不管是唯心論的），絕不是偶然的。然而李先生却要求生活遠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封建社會條件下的老子，必須發明或發見『否定之否定』的高度的辯證法則，否則便『不成其為辯證法』。假使真如李先生所說的話，則所有古代希臘的辯證思想（連赫拉克利特的在內）都『不成其為辯證法』了！但試問李先生：何以黑格爾和恩格斯又那樣認真地研究了和推崇了古希臘的辯證思想及辯證法家呢？（見黑氏的『古代哲學史』和恩氏的『反杜林』及讀古代哲學史札記等）實在說，像李先生對於辯證法思想發展的這種觀點，除了稱他為帶着『特殊的玄學眼鏡』的唯心主義者，我們找不出更恰當的稱呼。關於老子的辯證法思想之受歷史發展條件的決定，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早已這樣地說過：

『真正『質量互變』的法則，只有到更高度發展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水平下，才能發見的。所以老子的辯證思想，只能進到此地為止。有人說老子只看到了事物或現象之對立，即表面的對立，而沒有看到事物的內在矛盾。人們便以此為老子辯證法的最大缺點。不過，事物內在矛盾的法則，如同辯證法中的『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兩種法則一樣，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揭露的。偉大的赫拉克利特也不會發見這一法則。』

這段話，不是等於預先指責了像李先生對老子辯證思想的這類看法的玄學觀嗎？但李先生帶着他的『特殊的玄學眼鏡』，是不管這一切的。

至於李先生之援引我對於老子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思想的弱點的批評（求真一卷三號四一頁），來辯護他自己對於老子哲學思想的抹殺和鄙視，這就愈加暴露了他自家的玄學觀。因為我對於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是：一方面，如實地闡揚了它們的可寶貴的優點，同時又指出了它們的弱點的所在，且解釋了形成那些弱點的歷史根因。這正是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研究和評價老子的根本思想的嘗試。而李先生透過『特殊的玄學眼鏡』，只抓住了我對老子思想的弱點的批評，却完全置我推崇老子思想的優點於不顧，——這

而這又是玄學的唯心主義或主觀主義的特色啊！

總而言之，李季先生對於老子哲學思想之如此地抹殺和鄙視，不但充分證明了他對於老子思想的深度、廣度及其歷史意義，茫然無知，而且暴露了他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除了僅是片面的了解之外，還只是在書本上記誦公式，有如一個游泳研究家，只是在書本上研究游泳術，一落水時就沉跌下去了。

四 老子的社會思想與其哲學思想的關係

我會說過：『老子是我們古代最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哲學家』，正因如此老子的社會思想是同他的哲學思想緊相聯繫着的，換句話說，老子的社會思想或人生觀，是從他的一元的宇宙觀和辯證的（對立統一的）方法論邏輯地開展出來的，——這乃是老子思想中的最基本的特點。而李季先生既對於老子的哲學採取了極端抹殺和鄙視的態度，所以就根本無法理解這一基本特點。但欲研究和評斷老子的整個社會思想而不理解這一基本特點，那便絕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因此迫着我不能不從這一方面來再加一點解釋，以便引起參加論戰的先生和讀者們的特別注意。

老子全部社會思想的核心或出發點，就是他的『自然』與『無爲』的思想，即所謂『清靜無爲』的思想，這差不多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然而這種自然主義或無爲主義的核心思想，却全是從他的一元論的宇宙觀邏輯地演繹下來的。因爲老子的一元論既認定『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便是『道』之別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但『道』雖爲『萬物』所由『生』，是至高無上的，就『道』的本身說來却是『自然』的（『道法自然』），『無爲』的（『道常無爲』），然而又是『無不爲』的（『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夫物莫之命而常自然』，『萬物將自化』，便是老子對於『自然』和『無爲』的恰切解釋。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說，所謂自然，所謂無爲，就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而，不受任何人爲的干預的意思。

老子從這種『自然主義』或『無爲主義』出發，進一步又派生出了他的『無知無欲』的另一根本思想，前者可稱之爲『無知主義』，（即莊子所謂『同

乎無欲』）或『愚人主義』，後者可稱爲『無欲主義』（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或『知足主義』。因爲依照老子的自然主義，一切知識，如『奇技淫巧』等所表現的，都是『人爲』的，違反『自然』的，因而不合乎『道』的。要合乎『道』不違反『自然』，便只有『絕聖棄智』，『絕巧棄利』，『見素抱樸』，『絕學』（『絕學無憂』），以『返於樸』。『智』的反面是『愚』，所以在老子看來，『愚』正是合乎『自然』的，因而也就是合乎『道』的。這便是老子公開地並堅決地主張『愚』的根本理由。其中絕不會有什麼『愚民政策』（像李季先生所描述）的意味。所以我會道：『老子主張的『愚』，絕不限於『民』，就是『統治者』自身也必須『愚』的』（求真一卷二號四四頁）。換句話說，老子主張的『愚』是一切人都應該『愚』，一切人都應當『絕聖棄智』，應當『絕學』以『返於樸』，即返於無知無欲的『素樸』的或『自然』的原始狀態。老子說：『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這裏所謂『不學』，就是『愚』或『無知』，然而這正是『聖人』所『學』的。把『學不學』翻成現代的話，就是『學愚』，或『學得無知』，只有如此，才能合乎『自然』，所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正是合乎『道法自然』的意思。

老子之自稱『愚人』，正因爲他曾作到了『學不學』的功夫，所以才能『返於樸』，而表現其『混沌』、『昏昏』、『悶悶』和『頑似鄙』的『素樸』的或『自然』的狀態。這又表明老子的『無知主義』是『知行合一』的。另一方面，老子認爲一切『奇技淫巧』，一切『難得之貨』，總而言之，一切可欲的東西（如『五色』、『五聲』、『五味』、『文綵』及『財貨』等），都是『智』的產物，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大家『無知』（或『愚』），這些可欲的東西也就不會產生了，因而也就『無欲』，也就『知足』，也就『自然』了。如果大家都『無欲』，都『知足』，當然不會發生什麼罪咎與禍厲。因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甚愛（多欲）必大費，多藏（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同時，老子從他的辯證哲學，從他的對立或矛盾的哲學觀點出發，看到對立物之中，往往是消極的戰勝了積極的。例如：『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爲奇，善復爲妖；『物或損之而益，由益之而損』；……這就愈益加強了老子對於『自然』、『無爲』、『無知』、『無欲』等等消極思想的自信。

假如我們明白了老子的社會思想的核心與其一元論和辯證法的哲學之這種邏輯的有機的聯繫，則對於老子的一切社會思想和政治主張，對於他所給予當時一切社會現象的批評和攻擊，也就『迎刃而解』，不難得出明白的觀念和正確的解釋了（請參考求真創刊號三八——四二頁）。可是，李季先生恰好對於老子的哲學的重要性和在他社會思想上的決定性，全無理解，於是只有根據他特有的（化過裝的）玄學觀點，他的經院主義（或煩瑣哲學）尤其是他『二十年前』所發明的成見，從老子一書中胡亂地去搜索一些文句，並用『斷章取義』，『咬文嚼字』以及各種各式的曲解和附會，將老子整個的社會思想系統與其本來面目，弄成一副完全相反的奇形怪狀，令人不可辨識了！

說到這裏，李先生將一定憤激地叫喊起來：你又在玩『針鋒相對的宣傳式的論戰法！』但我必須預先忠告李先生：假如你不進一步認真地去理解老子的哲學思想及其與他的社會思想的邏輯關係，你是一輩子也不會懂得老子的社會思想的。例如李先生看到了『古之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就斷定這是『愚民政策』；看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若使民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就斷定這是『替統治階級打算盤的說法』。假如李先生懂得了我前面所指出的老子的『社會思想的核心』，他是絕不會得出這樣與老子的根本思想完全相反的荒謬結論的。因爲根據老子的『無知主義』，所謂『將以愚之』，僅僅是叫人民『學不學』，『絕聖棄智』，以『返於樸』，即回復到『無知無欲』的『自然』狀態。同樣，根據老子的『無爲主義』，是反對任何人爲的干預的，何況『殺民』！因此，李先生在『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中之『老子的『愚』和『殺』的問題』一節內所扯出的一大批議論，我覺得除了是在『舊的曲解和附會』上（參考求真一卷二號四四——四五頁）再加上一些『新的曲解和附會』外，實在沒有別的什麼了。假如人們看清了我前所說的一切，對於李先生的『新的曲解和附會』是不難一眼看穿的，所以在這兒便省得浪費筆墨去批駁了。

五 關於老子的理想社會問題

要判斷老子的理想社會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社會，我們必須注意三個基本要點：第一、老子的根本思想是『自然無爲』，因此，他的終極的理想

社會自然是回返到他那時代的人們（尤其是農民們）所能想像的或所能回憶的（根據傳說的）最原始的社會裏去。第二，老子既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思想家，因此，他除了對於當時的現實社會政治加以批評、指責，而提出某些『改良』的辦法外，勢必提出他的終極的理想社會來，——這看老子一書在前面對當時現實的社會政治現象從各方面加以批評、指責及提出一些改良辦法之後，把『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放在最末後，就可明白了。雖然，老子對於我們現代所謂『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或『過渡綱領』的區分思想尙遠未知道，但這類的意識在老子一書中却已經隱約可見了。第三，我們研究古代的社會思想家的思想，必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去了解它，換句話說，必須了解他們的思想，尤其是說話，爲時代所限制，往往是雜亂的，有時是自相矛盾的，很少能一貫而自具條理，自成系統的。所以研究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必須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從常是雜亂而自相矛盾之思想和文句中去發掘其思想的核心而理出其邏輯的體系（這方法，即研究近代的思想家的思想也是必須運用的，如恩格斯之對於傅利葉，聖西門及歐文等就是如此）。

如果不理解上叙的『三個基本要點』，則對於老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句間的某些離亂和矛盾，乃至他的對當時現實社會的批評和主張與其終極理想社會間的雜亂和矛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着自陷於雜亂、矛盾或武斷的泥沼之中。不幸，李季先生正是如此！他將老子對於當時現實社會政治的某些批評和主張與其終極的理想社會的思想完全混雜起來，最後則以前者去代替後者。他這次在『再論老子與孔子……』第三節『老子的理想社會是什麼？』（求真一卷三號四二——四四頁）所表現的，就是顯例。

李先生在這一節裏提出了三種論據出來反駁我，企圖以此證明老子的理想社會是『初期的封建社會』。第一是他『統觀老子一書，提及『邦』字三次，『國』字二十二次，『國家』二次。……凡他講『國』或『國家』的各章，我們從上下文可以看出統治關係來』。由此便『證明』了『老子滿口小國鄰國爲他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先讓我們反問一句：在一個『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社會裏，可能『雖有舟車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乘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嗎？其實，李先生完全沒有理解：老子在前面所提出於許多『國』和『國家』，『從上下文可看出』的『統治關係』，只是批評或敘述當時現實社會政治時所帶出來的，與其『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的『國』是兩樣的，我們絕不應把前者的『國』來同後者的『國』混爲一談。（其

說見下)。第二是李先生舉出「……故立天子，置三公」一點，也算是「老子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另一「證據」。但根據上面的同樣理由，老子所謂的「故立天子，置三公」也還不過是指當時封建社會所以設立「天子」「三公」的原意，與其所主張的理想社會並無關係。至於李先生將「食稅」一點也放在老子的理想社會裏作爲「老子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證據」，那就更顯得奇怪了！因爲老子所謂「民之饑，以其食稅之多，是以饑」，顯然只是指責當時人民的饑餓全是由政府當局的苛捐雜稅所造成的，這怎能扯到他的理想社會當中去呢？第三，便是李先生抄出了老子「五十章」（據老子本義）的全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證明其所攻擊的正是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出現後的情形，即封建末期的情形。他假託聖人的口氣，要以「無爲」、「好靜」、「無事」、「無欲」去診治這封建末期的毛病，這完全站在統治階級說出的理想」。我們且承認五十章「所攻擊的正是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出現後的情形，即封建末期的情形」。但從何處便證明了「這完全是站在統治階級說出的理想」呢？難道在封建社會（連初期的封建社會在內）裏真有所謂「無爲」、「好靜」、「無事」、「無欲」的統治者嗎？即退一萬步說，承認在封建社會中也有無爲、好靜、無事、無欲的統治者，但還沒有能證明老子的理想社會內也一定有這類的統治者的。因爲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裏顯然標出「使人結繩而用之」。試問李先生：在人類歷史上有那一個封建社會是「沒有文字」的？

所以我說：老子的「小國寡民」乃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求真刊號四二頁），就是說，老子的理想社會是「烏托邦主義」的。然而這正「是廣大的農民羣衆的地位之反映……農民……根據傳說，根據神話去回憶過去，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來安慰自己。『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便是由這種追念稍加以理想化形成起來的」（同上引四一頁）。這不但是關於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之一種最合乎歷史科學的解釋，而且在老子以後的繼承者中還可以找出充分的證據來。讓我們先從莊子中摘引一段關於描述其理想社會的話來看吧：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頽頽。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

羣生，連屬其德。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雀之巢可攀援而窺。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斲喪爲仁，蹶跋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漫漫爲樂，摘僻爲禮，天下始分矣。（《馬蹄》）

這段話所描寫的「至德之世」的社會生活狀態，恐怕李先生也無法否認它是一種「原始部落社會」的反映吧！然而這正是根據於老子的理想社會的傳統思想加以發揮而來的。因此我們儘有理由說，莊子的「至德之世」不過是老子的「小國寡民」之第一次的較爲詳細而清楚的注解罷了。

最後，晉鮑敬言，被稱「好老莊之書」，是老莊思想之最光輝的繼承者。他說：

仔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諱諱言亦欲之者爲辭哉？夫強凌弱，則弱者服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夫役彼蒸黎，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然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土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亂禍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阱？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綏冕玄黃之服。……夫賴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險，百官備則有坐糜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抱朴子』『詰鮑篇』）

鮑敬言在這裏所描述的「曩古之世」，是一種「無階級無政府」的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想任何人當不致加以否認，因爲他寫得實在太清楚太明白了。然而鮑敬言的「曩古之世」，又不過是繼承莊子的「至德之世」將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的傳統思想，加以進一步的解釋，描繪和理想化而已。

由此我再肯定一遍說：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是當時廣大的農民羣衆的意識之反映，不但從老子的根本思想中得到了確切的解釋，而且從莊子和鮑敬言的文件中也獲得了充分的證明。李季先生的「初期封建社會」說，不但與老子的根本思想格

格不入，而且絕對無法解釋莊子和鮑敬言的那種理想社會的傳統根源。

六 關於老子思想所代表的階級問題

如果老子的理想社會，像前面所充分證明了的，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之理想化』，是廣大農民羣衆的意識之反映，則老子所代表的是農民階層也就絕不成問題了。而且關於這一點，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早已明確地指證了出來（請參考求真創刊號四三頁）。但李季先生在摘引了我的『指證』的原文之後（見求真一卷三號四五頁），不但毫無理解，反而提出了最可笑的最機械的反駁出來。現在且將李先生的反駁妙文抄錄如下，讓大家都欣賞一下吧：

照這段話（指摘引我的話——歐伯）看來，老子的全部思想和學說都是由農民那種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得來！但他不獨盡情諷刺『衆人熙熙』、『俗人昭昭』，並且說『我獨異於人』，當時佔絕大多數的農民即使不在『衆人』、『俗人』之列，總應該在『人』之列，老子何以這樣忘本？再就農民講，既能知道『戰爭、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這許多事爲多事，又懂得傳說、神話、能『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而且體驗到『一切的知識是多餘的、騙人的、有害的』，那他們都是知識豐富的大博士，頭腦并不『單純』。……何以像一個垂死的階級一樣，『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竟反映『無爲』、『無知』、『無欲』、『不爭』、『知足』這一大串主張呢？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不去暴動，却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著地去深思苦索，想出或反映出『不爭』和『無爲』等等的辦法來，真是未之前聞！最奇怪的是老子從農民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所學得的廣大知識，所反映的『不爭』、『無爲』等辦法，不從農民的立場傾吐出來，竟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曲曲折折，半吞半吐地予以發洩！

我將李先生這一段煩瑣、冗長而又十分乏味的妙文引了出來，實在覺得有累讀者。但爲了暴露他的異常的機械觀點，咬文嚼字及其對於我的原文語意的曲解等等，也只好如此。現在且來一一檢討如下：

第一、老子所『諷刺』的『衆人』、『俗人』及『我獨異於人』的『人』，從語氣看來顯然指的是當時剝削和壓迫農民或一般人民的統治階層中人物及其自覺或不自覺的追隨者們。而李先生却偏從『衆人』、『俗人』和『我獨異於人』的『人』字中，嵌進農民全體，以使得出老子不是『代表封建地主

階級』，就是『這樣忘本』的結論！這還不够證明李先生的機械觀點和咬文嚼字的把戲嗎？

第二、對『戰爭、刑罰、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傳說』、『神話』、『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一切知識是多餘的，有害的』，……這一切，在李先生看來，不是農民完全不懂得或體驗得，就是完全懂得或體驗得之後而能自己看出『更好的前途』，總之，二者必居其一。但歷史上的經驗，尤其是古代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農民羣衆對於統治階級所加於他們的剝削、壓迫、痛苦、災禍，及統治階級本身的橫暴腐敗等現象，根據自己的直覺、經驗，他們是少能懂得或體驗得一些出來的。然而他們自己不但往往是看不出『更好的前途』，甚至連他們多少所懂得或體驗得的東西竟也無法表現出來。正因此，農民往往須要別階級的人們來指引他們，或代表他們。這不但在古代是如此，就是近代也還不能例外。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時候，代表農民利益說話的常是資產階級或小資階級的代言人（如法國大革命時代），而在末期則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如列寧等）。假如我們明白了這種歷史的事實和經驗，則出身貴族的老子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意識和要求並爲之表現出來，不但毫不爲奇，而且是完全合乎歷史的辯證邏輯的。實際上，不但農民是如此，就是現代的工人也還是如此。李先生你能否認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是首先從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映出來並代爲之完成起來的嗎？真想不到，李先生的機械觀點竟發展到了如此可驚的程度！

第三、李先生認爲『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是鐵一般的史實。然而『史實』並不完全如此的『鐵一般』。就『史實』看來，農民起來暴動，往往是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如歐洲），或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的時期（如中國）。例如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歐洲波希米亞、法、英、德等國的農民大暴動，以及中國秦以後的農民大暴動等等就是這樣。但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和中期（如歐洲各國），甚至末期（如中國），農民大暴動是極少見的。這裏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工商業經濟尚不够發展，影響農民的都市階級份子尚未生長至相當程度，因而封建階級的傳統勢力尚能勉強支配農民，使不致走到大規模暴動的地步（至於小規模的暴動或反抗一定是有的，不過未經歷史記載下來而已）。因此，在歷史上，農民雖然『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

到了失望』，但並不起來暴動，仍然是『忍受』了下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農民的暴動也同其他的事物一樣，不是在任何時期和任何條件下都可以產生的。因此，我可以說，李先生所理解的農民暴動是超歷史的，玄學的。

第四、李先生說：「當農民受到……但不起來暴動，却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想出或反映出『不爭』、『無爲』等等辦法來，真是未之前聞！」這段話不僅僅是機械的，而是荒謬的。因為農民受到不可忍受的痛苦，但又不能起來暴動的時候，難道就連『想』也不能『想』了嗎？實際上恰好相反，農民在受到不可忍受的痛苦而又不能暴動的時候，是更加要東想西想的，雖然『不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也正因為農民在痛苦而又不能暴動的時候表現他們的情感和思想，大思想家（像老子和托爾斯泰等）才能『那麼地去深思苦索』，反映出農民們的意識形態來（如『自然』、『無爲』、『無知』、『無欲』及『不爭』等）。李先生對此表示『未之前聞』，其實是『少見多怪』哩！

第五、李先生最後說：「最奇怪的是老子從農民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

腦』中所學得的廣大智識，所反映的『不爭』、『無爲』等辦法，不從農民的立場傾吐出來，竟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曲曲折折，半吞半吐地予以發洩

！我們看到這段話，覺得更加『奇怪』！因為站在農民立場上攻擊當時的統治階級，在當時，老子總算是最痛快，最勇敢，和最尖銳的了（請參考求直創刊號四一頁所引的老子原文）。然而李先生鼻梁上架着一副『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眼鏡，不但在老子一書中所看到都是『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姿態，而且所聞到的聲音也都是『曲曲折折，半吞半吐』的了！

現在我更有權利學着李季先生作出如下的結論：『凡是不懷成見的讀者將上面所說各點綜合比較一下，馬上會看出：認老子爲反映農民的意識，爲農民的代，非常切合真相，翻閱老子全書，甚至莊子和鮑敬言的許多解釋，無一處講不通；但如認老子爲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的代表，那就沒有一處是講得通的，即李季先生費盡力去強解，也終不能自圓其說。何去何從，不難抉擇！』

（老子思想部分完）

本誌優待閱戶啓事

本誌創刊以來，迭承遠近各地讀者，來函徵詢長期訂閱辦法。祇因物價起伏不定，影響成本每期不同，致本誌全年定閱辦法，暫難訂定。茲爲酬答各方雅意起見，特別訂出優待閱戶辦法如下：

- 一、請先匯付一萬元或五千元，開立『訂戶』；款盡，再行通知。
 - 二、截至本年十月底止，照每期定價七折優待。
 - 三、郵寄分『普通』、『航快』兩種，訂閱時請爲註明。所需寄費，照實列入『訂戶』項下。
 - 四、訂閱函件或匯款，俱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發行部收。
- 附註：如因匯款不便，郵票代替，十足通用。

求真雜誌社啓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
子規譯

在我們的近代史上，在東歐落後的波蘭，出了兩位最偉大的婦人。一是盧森堡，一是居禮夫人。居禮夫人是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鐳的發見者。而盧森堡不但是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尤以經濟學專長），而且是一位偉大的社會革命底實踐者。她的輝煌底天才、她的高貴底性格、她的科學底遠見、她的堅定底革命意志，尤其是她那一往直前的勇敢和犧牲精神，都是近代史上所少見的。本文是盧氏對於第一次大戰的分析、預測、主張、以及對於當時陷入機會主義泥沼中的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的批評。這是一個極富於歷史意義的著作。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早成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已結束了一年，但第三次世界大戰又正在威脅着整個的人類和文化。因此，盧氏這一著作，直到今天還是最為生動、最富於教訓意義、最值得新的一代人加以認真研討的。因為我們人類要認真防止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便必須研究第一和第二兩次大戰的慘痛教訓；尋求根本消滅戰爭的道路。而盧氏在本文中所指示的，正是這一道路。所以特別值得介紹。末了，我們得聲明，本文是從日譯本重譯的，容或錯誤之處，俟將來找到原本，即當校正。（編者）

一 世界戰爭即將勃發前社會民主黨的論調

情形完全變了。六星期來向巴黎的進兵，擴大成了世界的戲曲。無限的殺戮，已是漫無止境的單調的日常工作；而所謂解決的方法，前前後後都找不出來。資產階級的政治學，陷入了作繭自縛的窘境，人們無法制御這所招來的魔鬼。

爛醉的人看不見了。街道上愛國的喊聲；搬運車後面的追跡；遭了虎列拉細菌所毒害的湧泉似的互相衝撞；想向柏林鐵橋拋擲炸彈的俄羅斯留學生；飛行於祇倫堡上空的法國人；被密探所監視着的滿街滿巷的民衆；咖啡店裏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愛國歌謠的雜沓喧噪；都看不見了。下層社會已經一變而為告密者；凌辱女人；呼喊萬歲；自身也為恐怖的流言，陷於神經錯亂。而那佇立於街頭的巡捕，是唯一像人類的人的屠殺空氣，也看不見了。

專賣實行了。『踉踉跄跄的死人』的德國學者們，久已緘口無言了。尾隨於豫備兵隊伍後面的年輕的姑娘們以及歡呼的聲音，都沒有了；豫備兵們也不從火車的窗口堆着歡笑回答羣衆。他們是提了紙箱，靜悄悄地走過街道；人們無精打彩地對付着日常的工作。

在這陰暗的沉滯的空氣中，却響着另一種合唱，那就是戰場上老鷹和

驚鳥的啞着嗓子的呼叫。

一萬個天幕的用具，已經依照命令弄完備。每一個配給所十萬斤的豬油、可可、咖啡的代用品等的供給；手榴彈、回轉椅子、彈藥車、陣亡者的寡婦的結婚介紹，皮帶、軍需品的供給等等，祇有這些事是在虔心考慮。八月九日輸送出去的大砲的貴重的食餌，那是燃燒着愛國心的白熱，但已經都在比利時、華格森、瑪斯倫等戰場死滅。而在那些地方，却發生了莫大的利益。那些收穫，是值得急急忙忙搬回穀倉裏來。同時在海上，幾千隻貪婪的掠奪的手，正在伸展。

於是這些事在廢墟之上繁昌起來：市鎮變為空坪，村落變為墓地，教會變為馬廐。國民的權利、條約、同盟、神聖的話語、最大的權威，一概都遭了破壞。上帝的恩寵所在的君主們，互相謾罵他們的中表兄弟為：混蛋！沒有信義的東西！外交家們謾罵他們的敵對國的同行為：狡猾的流氓！而各國的政府，謾罵對方是以他的國民的命運作為侮辱的標的。威內薩，里斯本、莫斯科、新加坡等地，起了飢餓的暴動；俄羅斯流行着瘟疫；各地充滿着窮困與失望。資產階級的社會遭了恥辱，名譽掃地，步行於血泊之中，塗得一身污穢。這正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他們拼命以文化、哲學、倫理學、秩序、和平、法治國等等的假面具，裝飾一身。一旦脫去了假面具，即刻變得如同

猛獸；如同惡魔的休息日那樣的狼籍不堪；如同疫病的對付文化和人類；暴露了他們的赤裸裸的形相。

在這惡魔的休息日的時候，發生了世界史的大不祥事件——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投降。倘使想掩目不看這事實，想隱蔽這事實，將是無產階級所能夠經驗的最大的愚蠢，最大的不幸。馬克斯說過：『民主主義者（所謂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毫無自覺地陷入最不名譽的境地，也應該得到毫不染上污點，脫出這樣的境地的勝利。他們和他們的黨，應該不放棄原來的見解，而且要抱着事情不得不發展的新信念。』近代的無產階級，正從歷史的試驗做着個別的推論。他們的使命越大，他們的錯誤也越大。從沒有一個預先描好的各種機會都用得着的樣本；不誤事的指導者，也從不指示你一條可以走的道路。歷史的經驗，是他們唯一的教師。自己解放的荆棘叢生的道上，橫着有無數的苦難和無數的錯誤。無產階級的旅行的目的地——解放，完全要看他們從錯誤中學習有所得或無所得。對於事情的根底，透徹的、峻嚴的自我批判，這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生機和光明。目前的世界戰爭，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未會有的災難，是人類的幸。假如國際無產階級，不考慮這災難的嚴重的意義，不從其中去學習，社會主義是要滅亡的。

這兒所成爲問題的是過去五十四年間近代勞動運動的發展。巴黎公社的墳墓是歐洲勞動運動的第一階段，給了第一國際一個結局。現在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在自然發生的革命、暴動、巷戰等等之後，無產者老是陷於消極的狀態。取而代之的乃是有組織的日常鬥爭，資產階級議會利用，大眾的組織，經濟的鬥爭與政治的鬥爭的結合，社會主義的觀念與淺近的日常利益的防衛的結合等等。嚴密的科學理論的北極星，這才開始對於無產階級和他們的解放問題，給予了光明。從各國的分派、學派、空想家、經驗等之中，產生了單純的國際的理論基礎，使各國歸於統一。馬克主義的認識，給了世界無產階級一個指南，使在日常事件的漩渦中知道正確的位置；能够隨時決定作戰計劃，以適應準確的最終目的。這新方法的信奉者、防衛者、擁護者，就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一八七〇年的戰後，和巴黎公社的敗北之後，歐洲勞動運動的重心，移到了德國。正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第一期法國所佔的地位一樣。當時巴黎是歐洲勞動階級鼓動和輸送血液的心臟，而德國的勞動階級，便是第二期的前衛。他們不屈不撓，由於細心的努力和大量的犧牲，形成了有力的模範的組織；發行了最大的機關報紙，使成爲最活潑的教育啓

蒙手段；糾合有力的選舉人，舉出了多數的議員。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可算是馬克斯社會主義的純粹的具體化，佔第二國際的教育者、指導者的特別地位，他們沒有辱沒這個地位。一八九五年恩格爾斯在馬克斯的著作『佛蘭西的階級鬥爭』所寫的有名的序文中有如下的話：『別的国家無論發生了甚麼事，德國社會民主黨總是站在特別的位置；因此無論如何，先要擔負一種特別的任務』。他們在鬥爭場裏送出去的二百萬選舉人，以及沒有選舉權而支持他們的青年和婦女，乃是國際無產軍隊的最多數，是鞏固的大部隊，是絕對『有勢力的集團』。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如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維也納勞動新聞所記載的：『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組織的寶玉。』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諸國的社會民主黨以及荷蘭、斯堪的納維亞、瑞士、美國等地的勞動運動，非常熱心地追隨；斯拉夫系統的俄羅斯人和巴爾幹諸國的社會民主黨者，幾乎是無限地無批判地給以尊敬。第二國際中德國勢力的集團，是演着決定的角色；在大會或者在國際社會主義事務局的會議席上，大家都期待着德國的意見。的確，對於軍國主義和戰爭的鬥爭，德國社會民主黨常常是斷然地突進。『我們德國人不贊成』，這句話常常可以決定國際的方針。國際老是寄以信賴和尊敬，服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導。這是各國社會主義者的誇耀，也是支配階級的恐怖。

然而當那重大的歷史的試驗襲來的時候，我們在德國所經驗的是甚麼呢？不是大大的墮落和急速的崩潰嗎？像德國這樣澈底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是這樣被帝國主義所驅使，這樣無抵抗地進行戰爭；而且又這樣的報紙受干涉，輿論受壓迫，勞動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階級鬥爭澈底給放棄；這樣的情形，甚麼地方都沒有的。

可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最精銳的前衛，是國際的主腦。爲了這個原故，不得不進行黨和他的墮落的解剖，亦即自動的恢復意識的過程。他們應該有拯救國際社會主義，毫不容赦地實行自我批判的義務。資產階級社會的別的政治，別的階級，是不敢當着全世界，將自己的錯誤和弱點，放在批判的明鏡之中。因爲這面鏡子，同時也要反映他們面前的歷史的鬥爭場面以及他們背後的歷史的命運。勞動階級是不迴避真理的，是可以面對着峻嚴的自我批判。因爲他們的弱點，不過是一個錯誤。而嚴正的歷史法則，可以使他們恢復力氣，保證最後的勝利。

毫無假借的自我批判，不但是勞動階級存在的法則，而且是最高的義務

。我們是以我們的船，搬運人類最貴重的寶物，無產階級受命警衛。當此資產階級社會已被血腥的蠻幹所污辱，失了他們的名譽，命運非常危急的時候，國際的無產階級，不可不恢復自己的力量，將那因霎時間的混亂與怯懦，捲入了戰爭的漩渦而弄沉沒了的黃金寶物，打撈出來。

世界戰爭，無疑地將使世界完全改觀。但我們不能因為等候恢復將來活潑的步調，便像野兎避在林叢以待暴風雨的終結似的讓戰爭繼續進行；這是非常愚蠢。世界戰爭使我們的鬥爭條件發生變化，使我們自身也發生顯著的變化。乍看起來以為現在是一反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法則，資本與勞動的生死鬥爭，彷彿可以迴避或者可以緩和。但現在戰爭之中，已經剝脫了他們的假面，以前的舊面貌，在我們面前露齒獠笑。由於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對於發展的速度，給與了一個有力的衝動。即社會內部深刻的曝露，給與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一個重大的使命。這也就是使得以前的勞動運動的全部，彷彿是一首悠長的牧歌。

這個戰爭，負有使無產階級的地位進展的使命。以豫言者的眼光，發現老遠的將來的許多歷史事件的馬克斯，他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中，下面的一段話很值得注目。

在法蘭西，照理是工業資本家非做不可的事情（關於議會權利的獲得的鬥爭），小資產階級已經做了。照普通是小資產階級非做不可的事情（關於民主政治共和國的獲得的鬥爭），勞動者已經做了。但是該為勞動者而做的事情，甚麼人也沒有做。這在法蘭西是沒有得到解決，法蘭西曾經宣言。凡屬勞動者的事情，在國民與國民有着間壁的内部，不論甚麼地方，不會有成就的。法國社會内部的階級鬥爭，發展而為各國國民相對峙的世界戰爭；要得到解決，是要因為世界戰爭而無產階級將那支配世界市場的國民即英國國民推上前衛。現在還不是它的終局而是組織的發端，像這樣的革命，決不是短時間的事。現在的人們，正像由摩西領導到了曠野的猶太人。他們非但要獲得新世界，而且要讓位給生長於新世界的人們而自己死去。

以上是一八五〇年時代所寫的，那時英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唯一的國家，他們的無產階級組織得最完善，由於他們經濟的飛躍，儼然是站在國際勞動階級的指導地位。假如某些地方，把英國讀成德國，那麼，馬克斯竟是豫言今日的世界戰爭的天才。世界戰爭驅使德國的無產階級做了諸國國民的前衛，同時也使他們帶了一種使命；即他們應以國內的政治勢力，對於存在於

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龐大的國際的總決算，要成為組織的端緒。然而我們對於世界戰爭，竟以為我們的角色，僅僅是個別的。而以前我們是多久回返復敘述過那將要來到的事件，我們應該還記得的。

『到那時候慘禍要起來的。歐洲的地面祇要響一次召集的軍鼓，各國國民的精華一六〇〇萬乃至一八〇〇萬的人們，一定是要加以最優良的武裝，互相進行敵對的戰爭的。可是照我看來，那響得很高的召集的軍鼓的背後，一定是非有非常騷動的聲音；那不是我們發出的，是你們自己發出的。你們將事情導入於危殆的境地，你們是要收穫你們所散播的種子的，人類世界的黎明，已經近了。』

『你們牢記着罷，這將要走近的事項！』這是我們的議員倍貝爾在議會中關於摩洛哥問題所說的。

『帝國主義呢，社會主義？』這是數年前我黨公開發表的發行了十萬部以上的小冊子，那是以這樣的話結束：『因此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越發達到了資本與勞動的決定的鬥爭。問題可以如下地提出：有戰爭的危險和飢餓的資本主義呢？抑或所有的人都幸福的社會主義呢？歷史進入了大大的歧路，無產階級應該不屈不撓，為世界史的使命而努力。必須加強組織的力量，加強透澈理解的能力。然後無論發生甚麼事情；或者是無產階級能够避免世界戰爭的可怖的暴行；或者是資本主義世界如同歷史上所見的一樣，在血與暴行之中淹沒消逝；在那一瞬間，就可以看出已經有了準備的勞動階級的姿態。這已經有了的準備，便是一切。』

而最近爲了帝國議會的選舉，一九一一年公開發行的『社會民主黨選舉人必攜』的四十二頁上，關於將要來到的世界戰爭，這樣寫着：

我們的支配者和支配階級，敢於相信能以這樣可怕的事強求於我們國民嗎？驚懼與憤怒的吼叫，不能激動我們國民終止他們這場殺戮嗎？

他們不反問自己一下嗎？這一切到底是爲了甚麼人，爲了甚麼事？被他們這麼安排，而且使得他們這麼安排的我們，難道都有神經病嗎？

對於歐洲大戰的現實性，靜靜地思慮過的人們，是不能得到這兒論證了以外的結論的。

未來的歐洲戰爭，是世界未曾有的大擾亂，是最後的戰爭，這是可以豫料的事。

這些議論，使我們今日的議員們，在爲獲得他們百分之十的政治的委任

而努力。

一九二一年夏，向北非阿喀提（Aschir）派遣邦德爾軍艦的時候，德國帝國主義者性急的野心，是想使歐洲戰爭迫於眉睫之間。可是八月四日，倫敦的國際會議，作了如下的決議：

德國、西班牙、英國、和蘭、法蘭西的勞動者團體代表，現在宣告將準備以一切的手段，反對宣戰。派遣了代表的各國國民，負有服從他們國民的會議和國際的會議的議決案，與支配階級的一切不正當的計劃抗爭的義務。

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巴塞爾召開國際會議，勞動者代表的綿長的行列到了寺院的時候，出席者的胸中，感覺着刻刻逼近的決定命運的偉大戰鬥，閃耀着英雄的決心。

冷靜而懷疑的維克多爾·阿特拉叫起來了：

同志們！最重大的事情使得我們在這裏站在我們共同力量的源泉之上。我們爲了共同阻止戰爭的罪惡，每個人要以他國內既有的組織與手段，傾全力盡其所能；那在國內工作的力量，都要從這個源泉汲取出來。

而在這罪惡實行之日，真正地實行之日，我們必須努力以之作爲最後的投彈。

這種信念，要使整個國際感動。

一想到殺戮、燒燬、惡疫風靡文明的歐洲時，我們禁不住要戰慄。我們的胸膛，爲了反抗與憤怒，幾乎要破裂。而我們自己反問：我們這些人，我們的無產階級，難道到今日還仍舊是默默地被牽到屠場的羔羊嗎？

特勒斯特拉以弱小民族和比利時的名義這麼說：

國際的小國的無產階級，爲了要避免戰爭，是將貢獻一切以服從全體議案。我們更希望：假如一旦大國的支配階級，爲了要在弱小民族的血贖之中，國土之上，滿足其政治的權力與貪慾，驅使無產階級的兒子們武裝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兒子們，由於他們的父母，他們的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報紙的強有力的鼓勵，希望他們於參加破壞文明的企圖，危害我們大眾和他們的兄弟朋友之光，再三再四地考慮！

喬勒斯以國際事務局的名義，朗讀對於戰爭的宣言，而下面的話結束他的演說。

國際是代表世界一切道德的力量。當一朝悲劇的時期到來，我們不得不貢獻一切的時候，這個意識是可以支持我們，鞏固我們。這不是隨隨便便的話，不！這是我們衷心的表白。我們有犧牲一切的覺悟。

這簡直是像幽特里山的誓約（維廉·退爾想打倒暴君，與同志登幽特里山宣誓。）世界的視聽，正集中於巴塞爾寺院，以聆聽那寺鐘爲了警告勞動軍與資本軍的將要大戰而發出的響聲。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社會民主黨議員團中的演說家達伍德，他在德意志帝國議會中這麼說：

那是我生活經驗中最美麗的時間之一。寺院的鐘聲，伴着國際社會民主黨的行列響着；紅旗插在教會的高座和祭壇之上，風琴的聲音，有如宣告和平一樣歡迎各民族的代表入場。那時候的印象，是終身所不能忘記的。那裏是在做甚麼諸位大概明白：大眾已經不是沒有意志，沒有思慮的家畜。這種是歷史上的新現象。以前大眾全不知道誰在戰爭中得到利益，誰驅使他們互相仇視而作集團的殺戮。但是現在不是這樣了。大眾已經不再是戰爭中得到利益的人們的爪牙，或沒有意志的武器了。

世界戰爭勃發的一星期之前，即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國的黨報還有如下的論調：

我們不是傀儡。我們要拿出全力向那驅使人類成爲盲目的支配關係，成爲沒有意志的器具的那種組織抗爭；我們要向那準備驅使渴望和平的歐洲變爲戰亂之巷的資本主義抗爭。倘使最近生氣勃勃的示威運動中所表示的德國及各國的無產階級要求和平的堅決意志，還是不能阻止戰爭的時候，至少要使它成爲最後的戰爭，使它成爲社會主義的黎明。（佛蘭克福的民聲）

又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有如下的論調：

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於昏迷的喪心病狂的資產階級所招來的一切事件，完全不負責任。他們知道：新的生命正要在廢墟之中開花，從今以後，一切的責任要落在支配者的頭上。

在支配階級，這正是生與死的問題。世界的歷史，是世界的法庭。

終於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勃發了未曾有的事件。這難道是非來不可的嗎？難道存在着必然性嗎？固然，這不是偶然的惡作劇，這一定有深刻的廣汎的客觀原因存在。但是這原因，可能是存在於無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的指導錯誤，這裏看不出我們的鬥爭的意志，我們的勇氣，我們的確實信仰。科學的社會主義，告訴了我們歷史發展的客觀的法則。一件事物人類不付出犧牲，是不能創造那歷史的。無產階級在其行動上，固然受那時代的社會發展的程度所限制，但社會的發達，它的本身並不通過無產階級。它的成效，

與那原動力的大小為比例。沒有人能跳過影子的我們，欲使歷史飛躍地發展雖則很困難，但欲對之促進或使之停滯，是可能的。

社會主義對於人類的社會行動，是以激發自覺、計劃、思致以及自由意志為目的，而且由於歷史付與的使命，它是世界歷史最初的民衆運動。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是人類脫出動物的境遇，走入自由的國土的飛躍。而這飛躍，也是與歷史的牢不可破的法則，即以前充滿了無數困難，發展非常緩慢的許多階段，互相聯繫。但不到從物質的先行條件形成的歷史發展的許多材料之中，將大眾自覺的意志的火花點燃起來，這飛躍是決不會實現的。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是像天命一樣地降落下來。這勝利是要從新舊兩勢力之間不斷的激烈的試練——在這試驗之中，國際無產階級是要立於社會民主黨的指導之下，把它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操縱社會生活的舵輪，自己學習做沒有意志的歷史的皮球的聰明的御者——而得來。

恩格斯曾經說過：資產階級社會，已經陷入了不是向前進而為社會主義，便向後退而為野蠻狀態的進退維谷。由高度的歐洲文明，「後退而為野蠻狀態，」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們把這話祇是漠然地讀了，從沒有豫料它的可怕的真相。但是現在，我們祇要把自己的周圍一看，資產階級社會的後退為野蠻狀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馬上就可以曉得。世界戰爭——這正是向野蠻狀態的後退。帝國主義的勝利，要招致文化的破壞；——在近代戰爭的繼續中，是分散地發生——假如現今開始了的世界戰爭，不阻止它而讓它繼續前進，那一定是破壞到底。今日的我們，與五十年前恩格斯向他的同時代的人豫言了的完全同樣，要就是帝國主義的勝利，即文明的破壞，古代羅馬似的人口絕滅、荒廢，成為大大的墳墓。要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即國際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他們的戰爭採取戰鬥行為。二者必取其一。這是世界歷史的窮境和歧路，又可以說是在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的決心之前兩邊動搖的天秤。文化和人類的將來，全要看無產階級是否肯下堅決的決心，在天秤的一邊放下革命的寶劍。這次的戰爭，是帝國主義佔了勝利；它那染了血的劍，聲勢兇猛，將天秤的盤子押入苦惱與恥辱的深淵。這苦惱與恥辱的總賬，要無產階級在戰爭中，學會脫出支配階級的奴隸地位，自己做自己的命運的主人，然後才能償補。

近代勞動階級，費了很高的代價，獲得了關於歷史使命的諸種認識。階級解放的道路，覆蓋着極可怕的犧牲。六月的鬥士，公社的犧牲者，俄羅斯

的革命殉難者等血跡模糊的亡魂，真是數不勝數。但是，他們是倒斃在榮譽的戰場，如同馬克斯關於公社的勇士所寫的一樣：他們是「永久祭祀在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心臟之中」。現今各國數百萬的無產階級，口裏唱着奴隸的戰歌，充滿了恥辱、殺戮兄弟、守在即將粉身碎骨的戰場。而我們也不免要遭到打擊。的確我們是像由摩西領導漂泊於曠野的猶太人。我們若不忘學習，我們不會失掉甚麼，而會得到勝利的。但若無產階級的指導者社會民主黨，不知道學習，則因「讓位於生長在新世界的人們」，而將滅亡。（未完）

盧森堡的人生觀

盧森堡是一個最偉大的女革命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墮落是她最先指出的，考茨基的墮落是她最先察覺的，第二國際擁護帝國主義戰爭，是她最先諷之為「發臭了的死屍」的，法國社會黨領袖米蘭參加資產階級內閣，替資產階級做奴僕，成立「聯合政府」，她也是最先最堅決反對的人。但她之成為偉大的革命家並非偶然，她是建築在最偉大的人生觀上面的，一九一七月廿六日，她從獄中寫信給一個女朋友說：

「這樣完全溶解於庸俗之中，在我看來，是不可瞭解的和不可容忍的。舉個例說，你看，歌德如何高尚地超出於事物之上。你祇要想他經歷過的事情：法蘭西大革命（初時被他視為一種無目的亂殺人的力量）以及後來從一七九三至一八一五年，一連串不間斷的戰爭。我並非要求你寫些詩同歌德一樣，但他的人生觀：興趣底普遍，內心的和諧，——任何人都可取法的，或至少可以努力達到的。如果你同我說：歌德不是政治上的戰士，那我就回答你：一個戰士恰好應當努力超出於事物之上，否則他的鼻子就脫離不了種種醜惡事情的，——自然，我這裏說的是一個規模闊大的戰士。」這幾句話現出了一個出類拔萃的女戰士！（明）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

唐虞世

大多數歷史家每逢記載革命時候，都是把革命視為人類歷史發展上一種病態，一種可以避免的或不可以避免的病態，但其實整個人類史不過是一部廣義的革命史罷了。我們找不到一個民族，牠的歷史發展上沒有革命記載；各民族歷史間所不同的，就在革命次數有多有少，革命時期有長有短而已。每一民族歷史，其革命的時期，普通總是比較所謂非革命的時期為短，而且短得多。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做出結論說：非革命是一般的法則，而革命則是這法則的例外。恰恰相反。歷史上所謂『非革命時期』其實乃是下次革命底準備，或上次革命底收穫，或收穫和準備兼而有之。歷史上若有一個段落，與革命底準備或收穫都無關係，那才是一般法則底例外哩。

當代一位歷史家說：『經濟的、國家的、政治的、法律的問題，以及家庭的、個人的、藝術創造的問題，都要被革命重新提出來，從下而上地重新檢查過。……人類創造無論那一部門，都要被真正的人民革命所闖入，而留下巨大的里程碑。……革命暴露了社會底一切經緯，而投射顯明的光輝於社會學底根本問題上。……倘若我們不是為歷史而去研究歷史的，倘若我們是為了認識人類社會發展底根本法則，為了明瞭社會學底根本問題，為了未來行動指導，才去研究歷史的，那麼從上引的話可以明白：短短幾年間的革命時期史，比較幾十年以至幾百年的所謂非革命時期史，還更重要些，還更富於教訓意義些。』

這話對於一般革命史說若是恰切的，那麼對於一七八九年發生於法國的那個大革命底歷史說，更加是恰切的了。法國大革命對於人類發展上究竟有甚麼影響，我們現在還不能正確估計。總之，我們多過一個世代，就多感覺這影響底重大和繁複，而年復一年發現的關於這次革命的史料，以及研究者拿愈來愈新的視角和方法去整理和使用新舊的史料，都與我們這種感覺相符合的。倘若沒有此次革命，這一個半世紀的世界歷史就要完全不同了。倘若沒有此次革命，我們眼前也要遇着完全不同的問題。近代世界歷史就是以法國大革命為樞紐，而當前民族的、階級的、制度的、思想的、種種鬥爭，

也都是法國大革命遺留下來，或與此革命有密切關係的。我們這樣說，決不是誇張的，即：如果我們不研究法國大革命史，不澈底瞭解這段歷史，則我們對於近代史以及當代根本問題之認識都是膚淺的。

不幸，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太欠缺了。一般世界史的智識，在中國本很幼稚，但世界史中關於法國這段革命歷史的智識是更加幼稚的。我們從出版的書籍和雜誌的論文，可以相當證明這個。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我們的前輩對於這段歷史還有相當智識。無論康、梁維新黨，或孫、黃革命黨，都常徵引法國革命史實以為議論之助。新民叢報、民報等上面不乏這類文章。當時的『大清帝國』不有幾分像路易十四那位曾孫所治理的國家麼？共和成立了，教育民主化了，前輩當作禁果一般去研究的法國革命史，照理能變為家喻戶曉的罷？可是，奇怪得很，在新教育下培植起來的人，知道華盛頓、知道拿破崙，但很少知道馬拉、丹敦、羅伯斯庇爾，更不用說辣斐葉特、彌拉波、布里索了。為了甚麼呢？也許是教育當局和社會名流認為革命，這個『病態』，已經『成功』，再無研究過去歷史之必要了罷？

但革命實在並非成功，一九二七年又爆發一次了，比一九一一年爆發得還更激烈些。中國有一部分人現在還在稱一九二七年革命為『大革命』，並解釋道：世界史上有過三次大革命，第一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第二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第三就是此次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我們姑丟開這個問題，姑不問此次中國革命是否可與法、俄那兩次革命相提並論，但不能不驚訝於這次革命時，中國智識者，以至革命者自身，對於法國革命歷史是何等缺乏智識的。當時的革命文件和黨派爭論，幾乎全沒有徵引過法國革命史實。這又是為了甚麼呢？因為當時的革命者已經進了步，不是以法國革命為榜樣，而是以俄國革命為榜樣了，——雖然當時的人對於俄國革命歷史也是一知半解的。可是，不懂得法國革命，我們就無法認真懂得俄國革命。

革命失敗後，我們才看見人們對於法國大革命發生興趣。這可以從當時

★本文乃馬迪野著『法國革命史』中譯本序言。該譯本將由某大書局出版。

出版的書看得出來。幾年之間，出版界供給我們幾大部『法國革命史』譯本，小本的通俗的編著書且不算在內。我們有伍光建譯的馬德楞著的法國大革命史（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但銷行最盛在一九二八年後），有李季譯的威廉·布洛斯著的法國革命史（一九二九年亞東圖書館出版），又有克魯泡特金著的法國大革命史（此書同時竟有二個譯本出版：一九三一年神州國光社出的劉鏡園譯本和一九三一年北新書局出的楊人榭譯本）。這幾部大書（其實都是通俗的書，不過在中國成爲大書罷了）銷路都相當可觀，尤其是克魯泡特金底著作。但這不過表示當時人們對於法國革命發生興趣而已，對於這革命的智識增加了多少，以及這興趣維持了多久，尙無法知道。

我們現在介紹這部法國革命史到中國來，不僅是爲了給有心研究者增加一種材料，而且是爲了介紹法國革命史新學派底著作，其最有權威的著作。

『法國革命史』也有其發展的歷史。『法國革命史』底『史』也可寫成一大本書的。這個『史』的起源，同法國革命本身一般長久。在革命當中，參加者，無論是反革命者，或革命者，都有人於鬥爭餘暇執筆寫當時的歷史，有些還隨時發表在當時出版的報紙雜誌上。革命風潮過去之後，回憶的記載和通信底搜集，給後人留下史料。一世代之後大史家輩出。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後，有不少的名著產生出來。很奇怪的，這個時期的歷史家本身就是革命家，就是以著作歷史爲革命鬥爭的一種手段，其中有好多竟是在當時革命的和政治的領袖。底耶（Thiers）寫了法國革命史，不久之後就參加一八三〇年革命，趕走查理第十（即本書中的阿士亞伯爵）而建立『七月君主國』，奉路易·菲力（即本書中的夏特爾公爵）爲王。他歷任大臣、首相，直至第三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一八七一年，但此時他是反革命領袖）。路易·白朗（Louis Blanc）寫了法國革命史，當時他就參加和領導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路易·菲力，加入臨時政府爲代表工人的閣員，一八七一年革命中也有他的份。詩人拉馬丁（Lamartine）寫了季隆黨史，一年之後，他就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爲臨時政府領袖。其他一些有名的歷史家雖非行動領袖，也是富於反抗精神的。彌希列（Michelet）寫了法國革命史，他爲了自由的思想，兩次被停止教職。彌涅（Mignet）寫了法國革命，他寫到進攻巴士狄監獄時，自己的感情也同當時的羣衆一個樣。那個時期自然也有站在反革命觀點來寫歷史的，泰因（Taine）就是其中比較有名的一個。總之，那個時期的歷史家距離大革命還不久，其所著的歷史簡直就是大革命鬥爭底

餘波。譬如底耶著書時並不以死的文件爲滿足，他還親自訪問才遺的人物，無論是王黨，或弒王黨。

這個時期的歷史有其不朽的價值，可是當代的歷史家對之有微辭。他們認爲這些歷史不是科學的，即不是客觀的、冷靜的、建立在絕對可靠的史料之上的，而是論戰的、政爭的。

『科學的』『法國革命史』產生於法國革命百週年前後，這大部份不是個人底勞作，而是團體的，甚至國際的勞作。第一個專門雜誌，法國革命，創立於一八八一年；第一個專門講座，巴黎大學的『法國革命史講座』，設立於一八八六年；第一個專門學會，『革命史學會』，成立於一八八八年。雜誌、講座、學會，三者主持人都是歐拉（Hauray），他致力於這工作足有四十年。（學會於一九三四年解放了）在他領導之下，發現了、整理了、出版了，好多的史料，爲前期歷史家所未會寓目的，對於革命真相明瞭得多了，對於當時是非也有新的見解。

歐拉底代表著作名爲『政治的法國革命史』，顧名思義，這本書以及歐拉底整個工作是偏重於革命底政治方面的。在他稍後，若勒斯（Jaurès）根據他的學會底史料，以及其他的史料，著作了社會主義的法國革命史。約翰·若勒斯，從性格說，不從時代說，應列入於前期歷史家內的。他是歷史家、兼革命家、兼政治領袖。他幾十年間爲法國社會黨領袖，最後一九一四年七月底，他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被法國沙文主義者刺死了。他著作歷史，就是一種鬥爭。他的書與轟動當時的歐拉底書不同的，就是在於他第一次注重革命底經濟的方面。但是關於法國革命中經濟的和社會的研究，並非若勒斯創始的，甚至不是創始於法國，而是創始於外國，尤其俄國基輔大學。此時法國以外的國家也羣起研究『法國革命史』了。因爲大家都感到這實非法國一國底歷史，而是世界性的歷史。早期注意法國革命的是英國，但主要是以反革命精神寫成的。一七九〇年，即革命第二年，英國人柏克（Burke）就寫了對於法國革命的思想，大有助於當時歐洲諸國反對革命的輿論。一八三七年，有名的英國人加萊爾（Carlyle）寫了他的法國革命史，以其文字底優美、俏皮、潑辣，成了文學名著，但這是一部反革命的歷史，著出來警告當時英國執政者的。他爲了有意把法國革命寫成窮兇極惡原故，遂歪曲了事實。在若勒斯影響之下，法國創立一個『革命中經濟研究委員會』去搜集和發表歐拉主持的學會所忽略的關於革命中經濟生活的文件。

本書著者馬迪野 (Albert Mathiey)，於若勒斯死後，受人道報委託校改社會主義的法國革命史 (再版一九二二年，初版一九〇一年)。他在序言中說起若勒斯底判斷有些為後來發現的新史料所證實了，有些則為新史料所否定。他說這是難得的，因為直至一九〇七年為止，法國祇有一個研究革命史的團體。

一九〇七年以後，法國有好幾個研究革命史的團體產生了。新團體設立是與馬迪野姓名不可分離的。

馬迪野生於一八七四年，死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據說是死在巴黎大學教室內的，因為他扶病授課。他在那裏教法國革命史。他本在『革命史學會』中與歐拉合作，後來為了對於丹敦和羅伯斯庇爾兩人見解不同，遂與歐拉決裂 (歐拉最推崇丹敦)。一九〇七年他創立『羅伯斯庇爾研究會』辦一雜誌，名革命年報。『研究會』和年報並非以研究羅伯斯庇爾及其徒黨為限的，其範圍擴大至於整個革命，至於革命前和革命後，約從一七七〇年起至一八二五年止。一九一〇年『研究會』內部分裂，一部分另辦法國革命史雜誌，一九二二年又改名法國革命史和帝國史雜誌。一九二四年兩雜誌合併了，改名為法國革命史年報。從成立起至馬迪野逝世止，這二十五年間，年報重新審查了有關於法國革命的一切問題，各方面都沒有遺漏地審查到。新發現的史料也經過攷證、整理或出版。這大工程底靈魂就是馬迪野。他在法國和外國被人認為『謹嚴的、剛強的和深刻的研究家』。他死後，年報為他出了專號 (一九三二年五、六月合刊號)。

馬迪野底勞作大大推動了『法國革命史』研究工作。他的勞作，就性質說，可以分為二個時期：一九二二年以前是『攷證家』時期，一九二二年以後是『歷史家』時期。關於此二者的分別，他自己在本書第一卷序言上說道：『是』歷史家』時期。關於此二者的分別，他自己在本書第一卷序言上說道：『是』攷證家』時期。攷證是一回事，歷史又是一回事。攷證搜集過去的證據，加以分別研究，加以對勘，而從中推出事實真相。歷史則是重現和敘述事實。前者是分析的，後者是綜合的。』一九二二年以前，他做的正是那種分析的工作。除了年報及其他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不算，他的並行著作已有二十多種了。這裏不能把這二十多種書名錄下來，祇能指出其中牽涉的方面是很多的：宗教的、戰爭的、外國人活動的、議員貪污的、法律的、羣衆運動的、社會經濟的，其中在羅伯斯庇爾周圍一書有英文譯本 (改名為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恐怖時代底生活昂貴和社會運動』 (

書有俄文譯本。

但我們現在介紹來的，是『歷史家』馬迪野，不是『攷證家』馬迪野，即是說我們現在介紹他的法國革命史，而他自己在第一卷序言上說過：他把一切有關於攷證的部分都刪去了。

這部法國革命史放在 Armond Colin 叢書裏面，嚴格依照叢書限定的篇幅 (每本約十三萬字) 分卷出版。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二二年 (叢書第十七號)，第二卷，一九二四年 (第五十二號)，第三卷，一九二七年 (第九十三號)。這三卷書出版，不久就譯成英文 (英文名 *The French Revolution*, 同上書局)，俄文、挪威文和意大利文了。有人批評此書為『剪裁得當，敘事生動而公正』。這綜合的工作是做得好的。

這三卷書雖沒有史料攷證部分，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幾十年攷證成績底結晶，不僅是馬迪野自己的成績，而且是整個科學的法國革命史研究底成績。法國革命史研究還在繼續下去，將來自然還會進步些。但目前應以這部歷史為極限了。

然而致使馬迪野獲得廣大的國際聲譽的，還不是這三卷歷史，而是他的另一部書『熱月反動』。

鑑於前三卷歷史底成功，書店主人遂允許著者不受叢書篇幅限制，可以自由發揮，由此續著第四卷，『熱月反動』，遂成爲一部獨立的書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此書出版後，立刻有幾國文字譯本出版 (英文名 *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 同上書局)。這第四卷所以特別風行者，除了其中添入攷證材料以爲結論根據之外，還因為著者在這段歷史裏 (從羅伯斯庇爾上斷頭台至執政府成立) 有多處推翻前人成見而恢復歷史真相。革命從最高潮開始降落這一段歷史本是極混亂難寫的，且不僅法國底熱月反動史爲然。馬迪野著作底成功，以及國際讀衆對於此書的歡迎，也許同我們這個時代底事變不無關係罷？

譯者現在也將這有名的『熱月反動』介紹到中國來，但不作爲獨立的書，而作爲『法國革命史』底第四卷。

著者在第一卷序言中預告的本書第五卷『執政府』，尙未著成，便絕筆了。他的學生們拿他的講義編成一書單獨出版，篇幅既多，且不完全，故不擬譯出。

論古典主義戲劇

【中A】

冰夷編譯

一五四八年，基督受難會(Confrères de la passion)租到了布爾貢公爵的府邸『Hôtel de Bourgogne』(布爾貢宮)，就在這裏繼續中世紀戲劇的傳統，上演神秘劇、道德劇和俗劇。一五九九年，該會把自己的劇場租給伐雷朗·德康特。德康特以常年的俸金聘請劇作家亞歷山大·亞爾第(1562—1631?)來工作。亞爾第可算是古典主義戲劇的奠基者之一，因為他開始在布爾貢宮(通常稱為德康特劇場)上演古典主義劇本來代替中世紀的劇本。不過他的事業中清晰地顯露出新舊的鬥爭，因為古典主義悲劇當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形式的。譬如說，像中世紀神秘劇那樣把發生劇情的各種地點都同時設置在台上，優伶從一個佈景裝置轉到另外一個佈景裝置，從王宮轉到海洋等等，這原則保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在這一個時候，還談不到地點的一致，時間的一致也沒有遵守，在兩三個鐘頭裏表演的事蹟，在劇情過程中常常相距好幾年。

亞爾第主持布爾貢宮幾乎直到高乃依悲劇出現的時候，即十七世紀初葉的三十年中。古典主義悲劇的風格不是他創立的。在他的演出中，可以感覺到那些遠離宮廷社會的觀眾們的要求。光臨和支持布爾貢宮以物質保障的是些商人、手藝人、職員、學生、侍僕之類的觀眾。寫過許多古典主義悲劇的亞爾第也並不堅持這一個劇目，爲了酬答他的觀眾的趣味，他也上演糾紛複雜而羅曼蒂克的劇本，其中交織着各作家和各時代的風格和題材。

亞爾第的功績是吸引世俗社會注意戲劇。世俗社會本來是輕視職業劇場而喜歡豪華的宮廷劇場的演出的。宮廷階級開始在戲劇中探尋那可以適應他們所需要的藝術要素的形式。還沒有在亞爾第劇場得到地位的禮儀漸漸停留在舞台上。於是爭取規律，尤其是爭取三一律的鬥爭開始了。

新時代古典主義戲劇中的三一律(即時間、地點和劇情的一致)，是劇作家梅萊所建立的。於一六三四年上演的他的悲劇『索福尼斯巴』(Sophonisbe)是第一 部遵照古典主義戲劇的一切規律所寫成的悲劇。

布爾貢宮非但保持着基督受難會的傳統，而且承繼着它的中世紀式的佈

景和舞台裝置，所以這劇場並不是十分適宜於發展古典主義戲劇的地方。

比較容易接受改革的是巴黎的另外一個馬雷劇場(Le Theatre du Marais 1600—1673)。這劇場在丹勃爾街，是當時在『索福尼斯巴』中演馬西尼薩一角的名伶蒙陀里主持的。該劇場有包廂的設備，劇場建築的本身是比較適宜於上演古典主義劇本的。

當時戲劇界分成兩大陣營。一派是維護一致律和悲劇性與喜劇性的分開。另一派是繼續討好廣大觀眾的趣味，並且和過渡時代的五花八門的戲劇形式妥協。

到三十年代末，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勝利了，悲劇佔據了支配的地位，成爲宮廷趣味和學院派批評相結合的產物。這些『規律』並不是強制的，事實上和我們現在距離那時這末遠的時候所常常描寫的那種情形是頗不相同的。舞台上的一切表演都受着約束。在當時的戲劇條件中，那負有惡名的三一律是一種約束，它在達到舞台的幻覺和使虛構的東西接近現實真理這兩方面是一大進步。實際上，像上面說過，佈景同時都並排裝置在台上，表示許多相互之間距離很遠的地方。德意志隔開丹麥祇有幾尺地方。舞台裝置也不更換。而且，在幾分鐘內，要表演經過好幾年的事情，這也是很真實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創作一種劇本，劇情一直在在一處地方進行，劇情所佔有的時期儘可能不要展延得太長久。因此，從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中借用來的三一律，是使演出具有了真實性，使要求觀眾想像的原素減輕了。藍遜說得頗公允：『在亞里斯多德的規律之中。理性主義找到方法來根絕舞台上最後殘餘的中世紀的天真的狂想了。』

四 法蘭西古典主義戲劇的極盛時期

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的出色的代表作家是庇埃·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和琪恩·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早期的高乃依，在他的『西德』(Le Cid 1636)中，還沒有遵守三一律，他所作的悲劇，

在脚本上使人想到像是神秘劇。而且有一個特點，在內容上，這一部悲劇還保持着封建主義的（非但是絕對主義地主貴族的意識形態的成分。這劇本得到過很大的成功。法蘭西學院曾經在全能的紅衣主教李顯里歐（Richelieu）教唆之下，武裝對抗這劇本的成功。在學院攻擊『西德』之際，非常清楚地形成了對古典主義悲劇所提出的要求（詳後）。『西德』之後，接着來了高乃依的其他的悲劇：『荷拉斯』（Horace, 1640）、『西那』（Cinna, 1640）、『波留克特』（Polyeucte, 1642）、『龐貝之死』（La Mort de Pompée, 1642）、羅陀鳩娜（Rodogune）等。這些劇本和拉辛的劇本共同使法蘭西悲劇的榮譽保持了許多時候。拉辛，在他早期的悲劇中，是摹倣高乃依的，從『安德羅瑪克』（Andromaque, 1667）開始，他走上了獨立的道路。在『伊菲格尼』（Iphigénie, 1774）和『菲德兒』（Phèdre, 1677）中，他達到了創作的高峯，把衝突的中心從責任觀轉移到人物的心理鬥爭上去了。

在高乃依及拉辛同時代以及追隨他們兩人的作家中，可以指出的有德·李埃、羅特魯、西拉諾·德·貝爾傑拉克、布西葉、基諾、克萊皮里昂等。

這一個時代的出名的喜劇作家有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原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他貢獻了法蘭西古典主義喜劇的燦爛的典範之作。

和高乃依與拉辛的冷靜的修辭與精心琢磨的風格相比較，莫里哀在他的喜劇中是比較情感的，雖然他和高乃依與拉辛一樣，描寫的也是單一情感的典型。關於這一點，單是他的喜劇的名稱本身就已經可以作為明證：『守財奴』（L'Avare, 1668）、『假想病人』（Le Malade Imaginaire 1673）、『女學者』（Les Femmes Savantes, 1672）、『厭世者』（Le Misanthrope 1666）、『暴發戶』（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1670）等等。他的作品已經鮮明地表現出第三階級的傾向。他有許多抨擊假貌為善的喜劇引起了僧侶階級和貴族階級的攻擊（『塔邱夫』（Tartuffe, 1669）、『厭世者』、『唐璜』（Don Juan）等等）。然而，莫里哀在他的喜劇中，同時對於有些喜歡摹倣貴族的第三階級，也抨擊的相當兇（『暴發戶』）。莫里哀的這種傾向，甚至於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都不了解他，指它他為趨奉諂媚（致達朗貝函）。有許多布爾喬亞的諷刺家——李柯波尼、奴伽洛、居比埃、梅西愛等等——都擁護盧騷的言，跟着他爲了『安菲特里昂』，『丈夫學

校（L'école des Maris）等而殘酷地進攻莫里哀，因為他們看出這些劇本有爲了討好貴族觀衆而嘲笑布爾喬亞的地方。

A 庇埃·高乃依

一 西德

高乃依第一部悲劇『西德』的出現是法蘭西戲劇界的一件大事。劇本的內容如下：

卡斯蒂里亞 ● 首都塞維里亞（Sevilla）地方，有兩個貴族騎士，一個叫唐·第愛哥，一個叫唐·戈美斯，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前者有一個漂亮的兒子，名羅德里哥，後者有一個美麗的女兒，叫希敏娜。這一對少男少女互相愛上了，父母也不反對他們的結合。一切好像都很順利，幸福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希敏娜預感到像要發生大禍。

這時國王正爲自己的王儲找請師傅。唐·第愛哥和唐·戈美斯兩人都希望得到這一個榮譽的職位。國王選中那過去曾經爲國家立過許多汗馬功勞的年邁的第愛哥。那智勇雙全的大將戈美斯很不高興，在他的競爭者作不愉快的談話之際，打了他一下巴掌。騎士受了侮辱是要以血來洗刷的，但是年老的第愛哥的手握不住劍。兒子應該代他出去決鬥。全家族的榮譽要求他這樣做。

經過一度動搖之後，年青的羅德里哥向自己愛人的父親挑戰決鬥而把他刺死。這時家族的血仇更深了。現在希敏娜要求國王處決他的愛人了。國王遷延着，想把這案子加以鄭重的審理。

這時，摩爾人突然駕舟來襲城市。唐·第愛哥急忙召集五百名向他效忠的騎士；他們推選羅德里哥爲他們的領袖。夜戰三小時之後，羅德里哥得勝而回，並且虜獲摩爾人的兩個國王。全城共呼羅德里哥爲救國志士。國王稱他爲『西德』（首領的意思）。所以治羅德里哥以殺戈美斯的死罪，那是談也不用談了。但是希敏娜抑制着自己的愛慕之情，繼續要求處決羅德里哥。

國王最後宣布自己的決定：誰想要希敏娜，就讓他向羅德里哥挑戰決鬥；誰戰勝，誰就得到希敏娜。唐·桑霍，愛上希敏娜好久了，他挺身出來與

● 十一世紀時，西班牙分裂成幾個獨立的國家，卡斯蒂里亞（Castilla）是其中之一。

羅德里哥對敵。但是決鬥失敗：羅德里哥擊落了劍。根據國王的決定，希敏娜應該屬於羅德里哥，但是婚禮暫時延擱下來：希敏娜要安靜自己的不安的情緒，羅德里哥要動身到摩爾人的國中去征討他們侵犯塞維里亞的罪。

我們從劇本『西德』的內容中可以看出，劇中的主要人物是貴族騎士，將軍。劇本的基礎是愛情和責任的衝突。劇中的主人公青年羅德里哥髣髴是兒子的責任之擬人化，是自己一族中的榮譽的担当者，同時而且是國家的保衛者和國王的柱石。責任感也在希敏娜的心中和愛情起了鬥爭：她愛羅德里哥，但是却應該向他復仇。她決計服從責任感，雖然這也使她痛苦非凡。主人公們的崇高的情感表露於冗長的獨白之中。這些獨白是以艷麗而動聽的字句構成的。沒有一個平凡的場面，沒有一個說笑的場面是破壞了這一個不斷展開的宿命的衝突之莊嚴的過程的。劇情發展得很快，差不多是在一晝夜之間完成的，而且沒有越出塞維里亞城的境界。上面所敘述的一切事情沒有在劇本中完全表現出來，所表現的祇是在短時期中發生的最後結尾的插曲。有許多事情在啓幕之前就已經發生，觀眾祇看見前面的事蹟的結局（許多古典主義劇本都是這樣構成的）。沒有一個插曲阻礙或者使劇情脫離所指定的路線。結果，羅德里哥的美德勝利，但是爲了得到這種圓滿的解決，必需要由國王來干涉，他以自己的權力來斬斷無法解決的矛盾的結。

劇本完全是『照規律』寫的，是照古典主義理論家們爲悲劇所制定的規律寫的。似乎一切都沒有問題：台上有國王、將軍、騎士；注意的中心是情慾與責任的鬥爭；悲劇性和喜劇性分別得很嚴格；遵守着時間（一晝夜間完成劇情）和地點（不換佈景）的一致律；劇本結束之際，美德高奏凱歌，而且得到好報。

但是，當時爲藝術作品所立立的『規律』在法蘭西竟這樣的嚴厲，以致於高乃依的『西德』雖然得到觀眾們狂熱的擁護，却還是受到法蘭西學院和當時全能的大臣李顯里歐的嚴厲批評。高乃依錯在那裏呢？——他容許在台上『打耳光』。據宮廷階層的意見，這是不雅的，這應該放到台後去進行。希敏娜沒有和自己的情慾堅持鬥爭到底。結果她的情慾似乎勝利了。劇情超過二十四小時而繼續到三十小時之久。這是破壞。劇情雖然發生在塞維里亞一個城市中，但還是換景。甚至於這一點，高乃依也要受到責備：劇本取材於西班牙的生活；題材應該取自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

法蘭西的天才的劇作家們巧妙地反映出了當時現實生活的某種特點和

人類心靈的真摯的活動。像希敏娜就是表現這些特點的，而另外一位古典主義代表作家的女主人公們所表現的則比之還要深刻。

★ ★ ★

自從『西德』出現之後（一六三六年），那些專以複雜的戀愛糾紛、改裝易服、粗俗的說笑和不雅的場面等等取勝而內容空虛的劇本就此壽終正寢了。悲劇的趣味並不在於外表豐富的情節，並不是在於許多插曲和廉價的效果，而在於劇情的嚴格的一致，在於把一切劇情集中在一個插話周圍的原則，譬如說，在『西德』裏，劇情就是集中在羅德里哥與希敏娜兩人的愛情與責任的衝突的周圍。悲劇中有許多像以榮譽、責任、愛情爲題的論文似的獨白和議論。理性主義的精神已經在這裏支配着這第一部真正偉大的古典主義悲劇。這裏已經是理知佔優勢。羅德里哥和希敏娜建立了榮譽與責任的理論，他們努力遵照這些理論來愛和恨。我們處身在崇高的境界中，處身在以高貴的情感作爲行動準則的英雄們中間。

劇本中，人物不多，其中沒有一個是偶然的，或者是多餘的。每一個人物都決定於作者的藝術的目的和戲劇的真理的要求。主人公們的行動起源於他們的情慾，情慾起源於他們的性格。悲劇的發展是由內部的必然性所形成的。『西德』的成功超過了一般的預料。

過了四年，在『西德』之後，出現了高乃依的悲劇『荷拉斯』，劇中的主題也是愛情和責任的衝突。這部悲劇是以比了『西德』更嚴格的古典主義格調寫的。以後的高乃依的悲劇：『西那』，『波留克特』，『尼阿美德』，尤其是『羅陀鳩娜』，都清晰地證明那種真理：任何戲劇，戲劇的一切的新偉大成就，一切重新發現的風格，都是相應於某一階級的需要。

二 羅陀鳩娜

爲了解高乃依作品的缺點和優點，我們且把他的悲劇之一『羅陀鳩娜』來作稍詳的檢討。這悲劇出現於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年間。這並不是高乃依最好的作品，不過它在一百年之後，曾經引起德意志詩人萊辛格（G. E. Lessing, 1729—1781）的嚴厲的批評。這位詩人想解除德意志戲劇所受到的法蘭西古典主義的人工做作的束縛，使它回到自然發展的路上去。我們看了萊辛格在他的有名的『漢堡戲劇』中所寫的批評，就可以了解高乃依作品的缺點。

羅陀鳩娜的內容如下：

叙利亞國王尼卡諾，爲巴非亞人所虜。當他不在國內時，他的妻子克麗奧佩特拉抵抗老叛徒特里豐的進逼。這時傳來消息，說尼卡諾已死於俘虜中。爲了解除特里豐的壓迫，克麗奧佩特拉就嫁給尼卡諾的弟弟安蒂奧赫，安蒂奧赫戰勝特里豐而即了王位。克麗奧佩特拉有一對學生子，一名安蒂奧赫，一名賽留克，她把他們送到埃及去求學。這時，真相大白，原來尼卡諾沒有死在俘虜中，他帶了巴非亞的軍隊到叙利亞來了。尼卡諾要向他自己的妻子復仇，他娶了巴非亞王的妹妹羅陀鳩娜爲妻。克麗奧佩特拉向她自己前夫開戰，她打败巴非亞軍隊，手刃尼卡諾和俘虜了羅陀鳩娜。她派人到埃及去接兩個王子，向他們誓言，誰得到第一，誰就得到王位和羅陀鳩娜。兩個王子都愛她，但是互相立誓保持不變的友誼和忠貞，無論母親選擇哪個人，都要守約。羅陀鳩娜告訴她的侍女，說他愛王子中的一個。克麗奧佩特拉知道了這事之後，開始對自己的企圖怕起來了，她決定保留自己的政權，並且說，那一個兒子爲她向羅陀鳩娜復仇，就把王位讓給他。但是沒有一個王子願意做這件事，他們兩人的關係更密切了。另一方面，心存復仇的羅陀鳩娜也許下了心願，王子中有誰肯爲她和她的丈夫復仇的，她就嫁給他。

比較軟弱的賽留克拒絕了，安蒂奧赫是兩弟兄中比較堅強的一個，羅陀鳩娜和他見面時，向他表示愛意。安蒂奧赫想使這兩個女人和解。克麗奧佩特拉假裝感動了，她擁安蒂奧赫登基，自己却繼續進行陰謀的活動。她勸誘賽留克去復仇，允許以王位酬謝；但是結果失敗，克麗奧佩特拉就把賽留克殺死，並且企圖以藥酒毒死那就要和羅陀鳩娜結婚的安蒂奧赫。在喜宴中，安蒂奧赫接到一杯毒酒，但是，這時他的師傅向他報告賽留克死亡的消息，臨死前賽留克請人轉告他，叫他小心，不過沒有說出兇手是誰。宴會時，起了騷擾。羅陀鳩娜忽然起了疑心，她逼克麗奧佩特拉飲那一杯毒酒。克麗奧佩特拉履行了這一要求，她感受了臨死時的痛苦，咒罵不絕而死。悲劇以安蒂奧赫的祈禱結束，他祈求神寬恕這一切罪行。

悲劇的題材，高乃依借用於紀元二世紀時亞山大里亞的阿庇揚。根據歷史，萊辛格說，克麗奧佩特拉殺死自己的丈夫是由於嫉忌。『由於嫉忌？』高乃依想道。『那末這完全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人了；不，我的克麗奧佩特拉應該是一個巾幗英雄，她當然情願喪失丈夫，而不願失却王位的。她的丈夫愛羅陀鳩娜，但是這一點沒有像下面這一點那樣的使她痛苦：羅陀鳩娜和

她一樣是女王。這種動機就崇高得多了。』結果，女主人公的確是崇高了，但是因此却不大真實了；在女人的行動的動機中，嫉忌心比了權勢慾要自然些。女人爲了權勢而慾望權勢，把一切癖性都從屬於野心，除了發號施令、作威作福、蹂躪人民的幸福之外，不知有別的幸福，——這樣的女人是例外，是我們要驚爲怪物的畸形人物。謝謝老天爺，造物主在千年中祇弄錯一次，而詩人竟決心舉出這種怪物當作人來給我們看，那多麼遺憾。甚至於像在描寫理查三世(Richard III)這樣的惡人的時候，莎士比亞也要以幾點人的特性來使他的性格柔軟化。高乃依的克麗奧佩特拉是罪惡的形象化，高乃依的女人是比了最狂亂的男子更難馴，而他的男子却比了最可憐的女人都更像女人。他利用阿庇揚的題材，作爲不平常的效果的泉源，他竭力想使劇情和災禍更可怕，但是假使他是真正的詩人的話，他就應該以別種方法來利用這題材，他應該鄭重考慮劇中人物的性格，使那些誘起他的主人公們行動的事蹟，以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一個一個連續產生出來，使情慾嚴格地和性格調和起來，自然而然的循序發展。

德意志偉大批評家萊辛格所寫的這種對於「羅陀鳩娜」的批評有些地方未免有點誇張；但是也含着不少真理。爲了追求英雄主義，高乃依忘記了自然。他從他的戲劇中排除了主要的動機——愛情，因爲他覺得這種情感會減低人物的性格。因此我們看到的常常不是活的人，而是各種思想或者苦痛的擬人化，是關於美德和惡德的議論。形式的端正更加强了這些人物的抽象的性格。他們議論多於感染，他們研討和談論自己的情慾。

三 高乃依的時代

不過高乃依對於法蘭西文學是有相當的功績的。法蘭西古典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啓蒙運動的準備。它形成下一世紀中法蘭西哲學家們所利用的那種語言，那種傾向於正確而合於邏輯地思想的習慣。古典主義把理性作爲他們主要的美學的原則；古典主義詩人們努力以理知的方法來了解情慾及其現象。所以情感和情慾的描寫也應該相應於理知的概念。十八世紀時就把這種理性及其抽象而合於邏輯的組織的教條和傾向轉移入宗教、哲學和政治的領

● (Parthia) 古代波斯一小國。

● 莎士比亞悲劇「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

域中去。

最近，非但有為高乃依辯護的企圖，而且想把他推崇到相當的高度了。

藍遜在他的『法蘭西文學史』一書中證明，高乃依在他的劇本中細膩地描寫的不是真實的性格，而是心理的性格；假使說，有時他容許有複雜的事故或者太人工做成的巧合，那是因為他考慮到細緻的心理狀態和英雄主義的情感衝突。高乃依，藍遜說，生是一個獨特的時代。他自己所有和在他劇本中所描寫的是比較堅強有力的性格，是有好多時候為法蘭西人所特有的理知而堅決、自覺而積極的性格。在他那一個時代，這種性格是特別近乎真理的。我們在高乃依的心理題材和當時真實的心理生活之間可以找到非常的諧和；甚至於在女人身上，當時也很少帶有女性的成分，——她們的生活比較多用腦而少用心。高乃依依人物的情感總是很理知的，他們知道自己的情绪，他們加以研討，把它們變成思想，然後又把思想變成自己行為的原則。所以，高乃依的作品，和所有的作品一樣，是迎合社會的需要的。這是法蘭西上層社會的作品，他們還沒有解除封建主義的英雄主義傳統，而且他們此外還加上了合於邏輯、規律和秩序的原則。

當國王亨利四世為拉伐里亞克的匕首刺死的時候，高乃依正四歲。亨利四世是一個生性愉快而身世慘憐的國王，以無數的寵姬和無數內戰出名，他在華福朗之夜以後剛剛脫離危險，為勝利的絕對主義建立了鞏固的基礎。在血流遍野之中，救平了封建主和內省的領主，在國內建立了秩序。他的儲君路易十三，差不多和高乃依是同輩，他和他的首相紅衣主教李顯里歐繼續向叛亂的貴族鬥爭。在這些戰爭中，培養出了峻嚴而毫不感傷的一代。這是殘忍的一代人。他們具有鐵的精力和不屈不撓的意志，政治鬥爭是他們的自然現象，所以，我們看見政治也會在高乃依的作品中起着支配的地位。人物的個人的情感常常和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政治的野心，愛國的情緒，宮廷的糾紛，——就是由這些主題佔着優勢。高乃依，首先是英雄主義的詩人。他是為那還記得嚴酷的鬥爭時代的貴族而寫作的，他們在非常的奇蹟中看不出有什麼牽強附會和過分抬高的地方，他們還記得凱塞琳·梅狄奇，所以高乃依悲劇中會有那種權勢欲很強烈的殘忍的女人，就是萊辛格覺得是歪曲女子性格的那種女人，這是不足為奇的。藍遜說得對，實際上，高乃依所有一切歷史悲劇都不是歷史的，而是政治的。在西那和馬克西姆爭論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的辯論中，或者在賽托里和龐貝談論內戰的話中，提起了高乃依時

代的現實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他所描寫的人物，他們的行動是受意志和理知所控制，而不是受衝動的情感所控制的。

高乃依是貴族階級情緒的表現者，是路易十三朝和路易十四朝初期的時代的表現者，是英雄主義時代和規律秩序勝利的時代的表現者。悲劇本身的結構、情感的描寫、邏輯的支配等等，一切都要正確，這是相應於當時的深刻的傾向的。大家都需要秩序，國家的經濟需要秩序，國內布爾喬亞把自己的行動擴大到法蘭西國境之外去，所以需要鞏固而堅強的政權。在這種意義上，高乃依的戲劇是進步勢力方面的意志的煽動者、宣傳者和組織者。

B 琪恩·拉辛

拉辛出現比高乃依遲。拉辛的戲劇已經離開內戰時代很遠。這是承平時代的藝術。這一個時候，路易十四及其宮廷正享受着勝利的果實，這一個時候，正可以把戀愛和情感作為文藝的反映的對象。毫無疑問，拉辛戲劇中所反映的已經是那未來所屬的另外一個階級中的情緒了。這一個階級沒有英雄傳統的傳統，他們把商人的忠實看得比貴族的榮譽重要，他們知道有家庭中產生的情慾，他們寧取愛情和嫉忌、母親和子女的骨肉之情而不取那些在爭奪王位的鬥爭以及在大臣們和野心的廷臣貴族的糾紛之中產生出來的情慾。

拉辛早期戲曲中最好的『安德羅瑪克』是在一六六七年十一月上演的。悲劇發生於愛庇魯(Epirus)的首都。愛希爾的兒子——國王庇爾，愛上了赫克托的被俘虜的妻子安德羅瑪克。安德羅瑪克是在特羅埃城毀滅後帶了自己的兒子亞斯蒂亞那克斯住到這裏來的。庇爾有一個愛人，叫赫米昂，是海倫的女兒。她熱愛着庇爾。安德羅瑪克為自己的丈夫守節，拒絕了國王的愛。庇爾惱羞成怒，威嚇她，說要把她的兒子引渡給希臘人，因為她的兒子年紀雖小，却是為全希臘所害怕的人物。這時有一個從希臘來談判引渡阿斯蒂亞克斯的使臣奧萊斯特，他愛上了赫米昂。赫米昂高傲而狠毒，完全是那溫柔純良的安德羅瑪克的對照。她決定向自己的勁敵復仇。不幸的安德羅瑪克，恐怕自己的兒子墮入悲慘的命運，經過母子之情和夫婦之情之間的痛苦鬥爭之後，她接受了庇爾的求婚的要求。赫米昂大為憤怒，眼看着她手中

① (Catherine deMedici, 1519—1589) 法蘭西王亨利二世之妻。

② 希臘一古國，今在亞爾巴尼亞南部及希臘西北部。

的王后的寶座和愛人失去了，她就慫恿愛她的奧萊斯特在此爾和安德羅瑪克結婚時殺死庇爾，答應以下嫁兇手為酬。結果，赫米昂在愛人死後，感到一切絕望，所以自盡了，奧萊斯特看到自己希望的破滅，受着良心的痛苦的責備而發瘋了。

這悲劇的簡略的內容已經指出了拉辛的悲劇和他的勁敵高乃依的悲劇的不同之處。拉辛悲劇中的主動力是溫柔的母子之情和愛與忌的苦痛，而不是高乃依那種不大像女子而更像男子的巾幗英雄的權勢慾。假使說，高乃依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那末拉辛的悲劇是情感的悲劇。

拉辛戲劇的這種特點，在後來的悲劇『勃里坦尼克』(Britannicus, 1669)中表現得更鮮明。這悲劇中描寫的是年輕的尼羅和他的親戚及王位的合法的承繼人勃里坦尼克反目不和的事。拉辛決絕地脫離了推動尼羅這種仇恨勃里坦尼克的傳統方法。尼羅憎恨那高貴的勃里坦尼克，一直擔心他那一方面的陰謀和復仇。尼羅這些仇恨的原因，在那描寫宮廷社會的美感和情感的詩人看起來，覺得還不够動人；他把政治的考慮放在第二位上，拉辛提出嫉忌心來作為推動尼羅放逐地殺死勃里坦尼克的主要的力量。尼羅愛上了美麗的尤妮亞，但是她的心已被勃里坦尼克所佔有。無論這位暴君怎麼追求，都不能撼動尤妮亞的心。惱怒的尼羅採取最後的手段：他恐嚇她，說要殺死她的愛人，假使她拒絕和他結婚的話。這種恐嚇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詩人給我們描寫一個動人的場面：尤妮亞心中痛苦地演着悲喜劇，她使她的愛人相信她對他冷淡無情。但是這不幸的女孩子沒有把這種可怕的鬥爭支持多久。真摯的情感佔了上風，勃里坦尼克不久就看出了真相。尼羅命令囚禁這可恨的競爭者。奸猾兇險的那爾基斯煽旺了尼羅的忌火，他取到了女巫羅羅斯塔所製的毒藥。尼羅放逐地用這毒藥毒死了勃里坦尼克。尤妮亞失去了自己的愛人之後，就遁入空門，去做供奉灶神 (Vesta) 的貞女。

由於新的傾向的特徵愈來愈明顯，因此新派的代表拉辛和舊派的代表高乃依之間的敵對形勢愈來愈緊張。這兩個作家之阻和他們的崇拜者們之阻的敵意由文學的決鬥來解決了。亨利愛塔女公爵向這兩位作家提議，保護拉辛的奧爾良讓他們以戲劇的形式來寫作一部題材相同的作品。兩個劇作家以之來較量的題材是羅馬皇帝蒂塔戀猶太公主白萊尼克的慘史。人民起來反對皇帝和亞洲國王的女兒結婚，因此他不得不把他自己個人的情感犧牲給了人民的要求。題材本身就已經給優美動人的情感有了一個自由描寫的機會，這

已經預示着拉辛的勝利。高乃依不了解這一個題材的特點：他又引出了深思熟慮和嚴密推理的人物，他便糾紛複雜化，竭力創造出許多英雄的場面，創造出一個和白萊尼克對立的高傲而愛好權勢的陶米西亞。拉辛把他的悲劇的趣味全部集中於蒂塔和勃萊尼克的心理之上。他倆戀愛的故事，蒂塔的動搖，他一會兒向這可愛的婦人解釋國家的要求之崇高的意義，一會兒順從直覺，願意犧牲自己的高位，一會兒想在自殺中找尋這種衝突的出路，還有白萊尼克的苦惱，她起初嫉忌而多疑，後來相繼了蒂塔的愛，最後爲了愛人而犧牲了自己個人的幸福，——這就是構成拉辛悲劇中的趣味的種種。假使說，高乃依是追求悲劇性的效果和不平凡的英雄的典型的古典主義作家，那末把戲曲貶黜到軟弱的人情的描寫上去的拉辛，在這一方面是感傷主義詩人的先驅者了。不用說，拉辛的勝利引起了敵對方面的惱怒，給他造成了不少的敵人。這種敵意在拉辛的悲劇傑作之一『菲德兒』出現的時候，曝露得特別有力。在這一悲劇中，像俄國戲劇之父蘇馬珂夫 (Sumarokov) 所批評，『拉辛達到了人類藝術的最後一頁。』劇本的題材和有些細節，拉辛是從俄里庫特那妻借用來的。

泰席的妻子菲德兒愛上了自己的繯子伊波里特。當這可憐的人兒正在愛繯子的犯罪的憤怒和對丈夫的義務之阻鬥爭的時候，她得到了泰席逝世的消息。義氣的束縛控制不住了，菲德兒向伊波里特表示愛意。但是泰席逝世的消息原來並不確實。這使菲德兒大為吃驚，她怕伊波里特的不遜和泰席的報復，女王聽了忠心的愛儂娜的建議，決定在父親的面前誦講兒子。愛儂娜情願担當這件卑劣的事情。良心的責備折磨着女王。但是當她知道伊波里特愛着另外一個女人的時候，仇恨和嫉忌心驅使她想把好的計劃實行到底。把伊波里特毀滅之後，菲德兒又開始感到懺悔的痛苦，結果她向泰席揭露了真相之後，臥毒而死。

拉辛的最後的大作是他的有名的悲劇『奧福里亞』。有幾個法蘭西批評家認爲這是拉辛最好的悲劇。這悲劇好像是這位名劇作家作品中的例外。其中沒有戀愛的糾紛，沒有優美的情感的描寫。其中描寫的是異教世界和猶太人世界的衝突。悲劇的主動力不是愛情而是宗教的熱忱。在這劇本中，拉辛證明他能描寫的不單是愛情。

從上述拉辛的主要作品的素描中，他的創作的特點是不難看出了。

C 高乃依和拉辛

拉辛的戲劇還是宮廷戲劇，還是王公和英雄們的戲劇。在形式和規律上，他和高乃依的戲劇沒有什麼不同，但是他的作品比高乃依樸實而多變化，他的人物比了高乃依的人物更像有喜怒哀樂之情的活人。在禮儀的範圍中，在受著約制的高雅風格的形式中，拉辛能够留地位給直接的衝動和自然的情感。理知和情感衝突時，在高乃依方面，總是理和勝利，而在拉辛方面，却差不多總是愛情和情感凱旋。高乃依悲劇的名稱常常和男子的名字相合，拉辛的劇本却常常題着女子的名字（『安德羅瑪克』，『奧福麗亞』，『菲德兒』）。高乃依的女性形象是些權勢慾強烈而專制橫暴的女王，她們堅強而無情，不大像女性而更像男性，拉辛的女性是優美動人的情人。高乃依把『力』加以理想化，拉辛吸引我們同情『人』的弱點。被遺棄的女子，受騙的情人，嫉忌的受苦者，他們在憤怒和激怒之下求助於復仇和殺人的手段，和高乃依那些堅強而有計劃地向自己的政治目的前進的剛毅的女英雄們相差不知要多少倍。拉辛幾乎是逐出了戲劇中的政治性的，不過他比了高乃依却也施行了些別的革新。他容許在言行中有平凡的成分，他准許國王們有時是平平常常的人而不是國王，他們露出平常的一面，表現出常人的弱點，他們也躲在幕帷後偷聽別人的話。

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在歐洲戲劇史上完成了一個偉大的階段。幾乎有兩個世紀的宮廷貴族文化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最深刻的藝術形式。但是拉辛的創作已經證明，在古典主義宮廷戲劇的繁榮時期中，他的作品中已經有了布爾喬亞的趣味和情緒的影響。

上面已經說過，從中世紀起，民主主義各階層的藝術的要求，就已經在喜劇性的成分中得到了滿足，所以這種喜劇性的成分很早就已經侵入了嚴肅而虔敬的宗教性的神祕劇樣式。

古典主義宮廷戲劇的情形也是如此。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劇不單是在王宮大廳中表演，而且也在各城市劇場演出。不錯，城市各劇場裏光線黯淡，佈景簡陋，演出的情形當然不能和宮廷中的豪華富麗相比。但是古典主義的悲劇，各階級的人民都能够看到，所以傳佈得相當廣；布爾喬亞是把古典主義戲劇當作高級的藝術品接受的，他們入迷於高乃依和拉辛的天才，另一方面，他們也影響着戲劇的發展，使它脫離英雄主義和豪華性而接近日常性和平

凡性。

D 莫里哀

一 莫里哀的作品

爲了認識莫里哀作品的特點，我們且來看看他的三部最重要的喜劇：『塔邱夫』，『唐璜』和『暴發戶』。

喜劇『塔邱夫』第一次在一六六四年凡爾賽宮舉行盛宴時演出於宮廷裏的舞台上之後，就受到禁止了。莫里哀不得不把劇本修改，給它題上另外一個名稱：『騙子』，把主角的名字和外貌都改過（塔邱夫起初是穿着僧侶服裝，以加特力教僧侶的姿態登場的，後來才變成俗人）。但是直到一六六九年第三次修正之後，喜劇『塔邱夫』才又以原名獲准演出。在喜劇『塔邱夫』周圍繼續不斷進行的這種鬥爭，可以拿作者放在劇本中的現實的政治傾向來加以說明。莫里哀是反映當時的進步觀念的，他反對加特力教會，因爲它倚仗封建貴族的反動勢力，竭力想在這歷史性的時刻加強自己在布爾喬亞階層和統治階級之間的影響。喜劇『塔邱夫』正是以曝露這些加特力教會的代表人物爲它的任務的。這些人物戴着虛敬的假面具，混進布爾喬亞的家庭中去，他們常常利用他們在受愚的人們之間所享有的權威來達到他們個人的利慾。有時候甚至於是達到犯罪的目的。塔邱夫也是這樣的一個的偽君子。

他居住在偽君子奧爾貢的家裏，在他家裏得到了完全的權威。他靠着這一個受愚的家長對他所懷抱的信任和尊敬，開始佈置自己的事業：追求他的妻子，把他的房屋轉到他的名下，干涉一切家事，向當局告密，說他的主人是一個政治犯，威嚇着要從他自己的屋子把他趕出去，直到最後，國王的官員來干涉，這一切醜態穢行才終止。喜劇中這種顯示王政的仁慈和賢明的解決（逮捕塔邱夫是奉了王命）是莫里哀及其階級——十七世紀下半葉的法蘭西布爾喬亞——的政治態度的特徵。

塔邱夫的形象，一方面是和十七世紀法蘭西的實生活相聯繫的。另一方面，由於他特具着巨大的一般化的力量，所以他越出自己的時代界限而有着全人類的偽君子典型的意義，它非但曝露了一切僧侶的反動性，而且也揭穿了一般的宗教的反動性。

*

*

*

*

*

*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五)

李毓鏞

四 殺生新藥

世界上有害於人類的動物和植物，種類很多。例如猛獸、毒蛇、昆蟲、荊棘、野草、病菌等等，雖然其分類上的地位和生活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為害人類則一。其中有一部分，固然在上古時代，就已經被人類所征服，但是那些形體渺小而生殖力旺盛的一部分，我們一直沒有控制的方法。最近十多年以來，因為有機化學發達的結果，有不少殺生的新藥已經發明。這裏依照對敵生物分類的次序，分為殺菌新藥、殺草新藥、殺蟲新藥和殺鼠新藥的四大類，一一分述於下。

細菌是疾病的根源。因為人體的疾病，除了少數由組織變性或者內分泌、維他命等化學因素所起的以外，大部分都是由於細菌傳染的作祟。所以治病必須殺菌，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不過殺菌的方法，因為細菌存在處所的環境而不同。譬如要殺滅身體外部的細菌，日曬、燒熱、煮沸、毒物等等，也都可以奏效，但是要消滅身體內部的細菌，可就談何容易了。幸而在動物身體之內，經常有兩種殺菌機構的存在。一種是血液中的白血球，一種是血清中對於細菌有不利物質。其中某種特殊細胞因為細菌的存在而發生的特殊蛋白質，叫做抗體或免疫體 (antibody) 的，所占的地位尤其重要。白血球能够吞滅外來的細菌，而抗體則能够和構成細菌的某一種成分結合，在細菌體的表面，造成一層包被，減低細菌的生活力，使細菌容易被白血球所吞滅。這樣看起來，一個人假使傳染了某一種細菌，只要身體內抗體的產生率，能够追得上細菌的產生率，恢復健康也就指日可待。但如抗體的產生率追不上細菌的產生率，這人就難免有生命的危險了。我們要挽救這樣的病人，固然也可以叫他輸血，使血液中的白血球突然增加，以便吞滅更多的細菌，但是比較有效的方法，還在於向一個傳染過同樣細菌而已經恢復健康的人，覓取血液，注射在他的身體內。因為這人既傳染過同樣的細菌，身體中一定含有大量同種細菌的抗體。所以輸入人體之內，就可以收到補助的功效。醫

學上普通的方法，係用少量的細菌接種在牛馬的身體上，使牛馬的體內發生抗體，然後從牛馬的靜脈中抽出血液，濾取血清，用以注射人體。這一種方法在原則上確是十二分的妥善，可惜只能應用於少數的細菌。對於此法所不能奏效的細菌，唯有用一種化學的藥物，輸入身體之內，以減低細菌的生長力，使病人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增生抗體，以便撲滅細菌。這樣的藥品，只要能限制細菌的生長，已經可以獲得很大的功效，假使還能進一步殺滅細菌，就更求之不得了。但是其在事實上成功的可能性，在二十世紀以前，是沒有人敢於相信的。例如在一八八〇年的時候，貝林 (von Behring) 就已經說過，對於殺菌藥物所起的反應，人體的細胞比細菌不知要靈敏多少倍，所以細菌還沒有殺死，而病人自己却先已殺死了。可見要在生物的身體之內，舉行消毒，實在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料到一九〇〇年，愛利希 (Paul Ehrlich) 忽然想到，在細菌的染色術中，只有細菌能够被色素着色，而人體的組織，却不受色素的影響，我們假使能利用一種有毒的色素，使細菌同時着色而受毒，一定可以毒害細菌而不傷害人體的細胞。愛利希根據這一種理想，就創立一種化療 (Chemotherapy) 法。愛氏的所謂化療法，並不是泛指用化學藥品治療的意思，而是專指用化學藥品去殺滅體內的病原體，也就是體內消毒的意思。到一九〇四年，愛利希和志賀潔兩人，把紅色染料注射入白鼠體內，確能殺滅白鼠體內的病原體。後來愛利希就用同樣的方法去對付梅毒的病原體，不久就發明有名的砒製劑。這是化療法第一次的成功。

自從梅毒病原體的化療法發明以後，數十年之間，在細菌的化療上，沒有一點成績。我們究其原因，實在是由於細菌和人體的細胞，活力的來源相同，應用能的方式相同，因為缺乏某一種維他命而引起的結果也相同，這二者代謝方式的相似，使醫學家要找尋一種體內的消毒劑，要遇到許多困難的緣故。最先引人注意的內部殺菌劑，是對氨基安息香磺胺 (para-amino-benzene-sulfonamide) 的化合物。這對氨基安息香磺胺，原在一八〇八年的時候，因為染料工業上純粹的研究，為德國的季耳摩 (P. Gelmo) 所合成。到了

一九一七年，約可布斯 (W.A. Jacobs) 和海德耳伯革 (M. Heideberger) 兩人，按照季氏的指示，曾用一種毒寧的衍化物，和磺醯胺的分子連接。他們在所得的化合物中，曾經發見有一部分，在試管中可以有殺菌的效力，可惜他們的研究，中途而廢，遂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後來到一九三二年，德國的阿伊奇 (I. G.) 工廠，有米芝區 (Pritz Mietzsch) 和刻拉勃 (Joseph Karen) 兩人，把金黃色偶氮染料和磺醯胺的分子連接，製成一種極度經洗的水溶性染料，定名為百浪多息 (protosil)。這一種染料經同廠多馬刻 (Gerhard Domagk) 的研究，據說不但能使白鼠忍受致死量鏈球菌的傳染，並且沒有毒性。其後法國的奇刺爾得 (A. Girard) 也合成了一種百浪多息，其治病的功效，會得到列伐迪提 (Levaditi) 和發伊斯曼 (Vainans) 的證明。以上所說的結果，還都是由白鼠等動物的試驗中而得到的。

到了一九三六年，英國可耳布魯刻 (Leonard Colebrook) 和開耐 (Meave Kenny) 開始用百浪多息以治療產褥熱，竟獲得意外的成功。次年美國的龍 (Perrin H. Long) 和布克絲 (Eleanor A. Bliss) 兩人，用百浪多息進行一組大規模的試驗，於是百浪多息廣大的藥效，方始為世人所重視。就是流行的磺醯胺 (Sulfanilamide) 一字，也就是同年美國醫學協會鑒於「對氮安息香磺胺」這一個名詞太長而特別制定的。

百浪多息本是染料的一種，其所以有殺菌的功效，我們粗想起來，一定是由於色素對細菌發生毒性的作用，暗合着愛利希當年提倡化療時候的理想，其實却是完全不對的。因為照多馬刻的報告，百浪多息只在輸入動物體以後，方始發生效力，在試驗管中却是不生效力的。這就是因為身體內的某一種變化，使物質發生變化的關係。原來在愛利希的報告中，曾經指出一種鐵紅和某種砷化物，也只能在輸入動物體以後，方始發生效力。所以大家對於這一種特性，並不以為奇。但是到一九三五年特累否埃耳 (Therese Trefouel) 和尼提 (Francisco Nitit) 等，指出百浪多息中的有效成分，並不在於複雜的染料分子，而在於其中無色的磺醯胺。假使把磺醯胺特別分離出來，在試驗管中可以和在人體內有一樣的藥效。所以牟勒 (Fulle) 以為百浪多息所以能夠治病，即由於在體中分解而放出磺醯胺之故。自從這一件事實發明以後，磺醯胺就代百浪多息而起。

據醫學上試驗的結果，我們知道病毒類的肉瘤病毒、細菌類的葡萄球菌、鏈球菌、腦膜炎雙球菌、和淋病雙球菌，氣壞疽桿菌以及菌類的放射菌，

沒有不受到磺醯胺的影響。所以單用磺醯胺一物，就可以扭轉疥癩，皮膚傳染病，熱癩，骨髓炎，骨節炎，腹膜炎，中耳炎，喉頭傳染，產褥熱，血中毒，丹毒，腦膜炎，淋病，氣壞疽，放射菌病等病害不下二十種。醫學界中所發明的藥物也已經不少，但如論到有這樣廣泛的用途的，還推磺醯胺為第一種！

磺醯胺究竟何以能克制細菌，在醫學界中，目前還沒有確定的意見。有的人以為是增強人體抵抗力的結果，又有的人以為是消除細菌所排出的毒所致，各有各相當的理由。但是最能得到大家的信仰的，莫過於可刻武德 (J.S. Cockwood) 等倡導的營養 (atropy) 說。照可刻武德的意見，磺醯胺能够阻止細菌，取得分解蛋白質等大形分子所必需的酵素。因此使細菌失去分解大形分子的能力。後來武德 (D.D. Wood) 和淮耳志 (Hildes) 根據實驗的結果，會發表一種假說。他們以為人體內有一種乙種維他命複合體的分，叫做對氮安息香酸 (para-amino-benzoic acid, PABA) 的，是細菌長時所必需的營養料。但是細菌不能夠直接利用這一種營養料，必須利用酵素的利用而獲得營養料。至於磺醯胺，我們早已知道是對氮安息香磺醯胺的縮寫，其構造極度相似於對氮安息香酸，所以能够和對氮安息香磺醯胺奪取這一種酵素，當生物體內磺醯胺的濃度超過對氮安息香磺醯胺濃度的時候，但如在體內增加對氮安息香酸的濃度，就可以使藥物失去功效。據龍及立絲二氏的研究，還有一種動物細胞生長所必需的化合物，叫做甲硫氨基的，構造略和磺醯胺相類似，也有抵消磺醯胺的作用，所以他們以為磺醯胺也有和甲硫氨基酸競爭酵素的作。

磺醯胺的功效，既不在於殺菌，而單單停止細菌的生長，便容易受到白血球的攻擊，所以在細菌未經白血球消滅以前，若藥性就已過去，這細菌依然可以照常生長而釀成病害。可見要達到治療的目的，必須使磺醯胺在液體中保持相當濃度的含量而維持相當長久的時間。關於這一個條件，磺醯胺是沒有問題的。根據一種特別儀器測定的結果，在用藥後二十四小時，磺醯胺就達到最適的飽和度。除了大腦、脂肪組織和骨骼以外，全體差不多有相等的濃度。人體內的磺醯胺，假使濃度太低，固然不足以發生效力。但如濃度太高，更足以發生各種反應。例如在循環系方面，磺醯胺不但能使白血球減少，而且能和紅血球內的血色素結合，造成磺醯血色素和變性血色素

破壞紅血球，使血液失去效用，於是在皮膚上造成發紺的現象。排泄系統的障礙是反應中最為普遍的一種。這一種障礙的生成，是由於藥物的結晶而起。因為磺醯胺製劑進入人體以後，先要在肝中變化為醋酸的化合物，然後通行於血流中。但這種化合物只能溶解於鹼性的液體。假使到了鹼性較弱或酸性的液體中，就要產生結晶。因為血是鹼性的物質而尿是酸性的物質，所以磺醯胺由血液進入腎臟，就開始結晶。這種結晶或者作針狀，足以刺破腎部的細胞，或者作其他的形狀而阻塞小管，因此造成腎部出血或腎石等的病症。並且除了磺醯胺的化合物以外，由紅血球破壞而出的血色素，也有同樣的情形。此外，磺醯胺在神經系統方面，常引起頭痛、眩暈、惡心、嘔吐等症狀。在消化系統方面，常引起肝炎和黃疸病，在皮膚方面，常引起發疹等病。幸而這許多症狀，在服藥停止以後，就可以消除。可是若在反應發生以後還是不斷的用藥，也有致人於死的危險。

磺醯胺對於大部分的球菌都有克制的效力，只是不能夠克制肺炎球菌。

不過科學家根據白鼠體中所做的試驗，知道磺醯胺雖然不能夠治療肺炎，但是常常能延長病鼠的壽命。可見在磺醯胺之中，一定有一種成分可以延滯傳染的作用。他們因為這一理由，所以就設法改變磺醯胺的分子，以期能得到一種肺炎的特效藥。一九三八年，英國有埃文斯(A.J. Evans)和非立普斯(M.A. Phillips)二人，在邁倍(May & Baker)大藥房中合成數百種的化合物。其中標有邁倍六九三(M.E.B. 693)的一種，據懷特傳(Lionel Whitty)的試驗，其治療肺炎的效力，遠超過其他的藥物。這就是噻吡啶(Sulfa-pyridine, Sp)。第二年，美國有兩組化學家，一組是福斯平徒(Russel J. Fosbinder)和瓦耳特(Walter)，一組是洛特(Lott)和伯記姆(Bergeim)宣布發明一種叫噻吡啶(Sulfathiazole, Sp)的化合物，據雷刻(Groffrey Rake)試驗的結果此藥對於肺炎球菌和葡萄球菌的藥效極大，而且毒性較小。一九四〇年，羅布林(R.O. Robin)又發明一種噻啶呢(Sulfapyrimidine, Sulfadiazine)，其功效已經非因斯東(W.H. Feinstein)的試驗所證明。假使把這三種藥品比較一下，噻吡啶作用很快，而嘔吐的反應利害。用藥的人中百分之七十要發生嘔吐。噻啶呢的作用慢，嘔吐的反應較弱，嘔吐的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五。不過發疹和藥物熱的反應極為普遍。噻啶呢的作用雖然沒有噻吡啶的迅速，但嘔吐反應的人，只占百分之十二。所以噻啶呢要算是磺醯胺衍化化合物中最好的一種。除了上

述三種治療肺炎的藥物以外，還有一種噻脲(sulfquaniline)，係一九四〇年馬夏而(H.K. Marshall)等所合成，他們起初合成這一種化合物，原為對付肺炎之用，可是後來知道此藥雖易溶於水，但不易於為腸道吸收，只能當作腸道的消毒劑。以治療細菌痢等病。

磺醯胺的抗菌作用，據武德的實驗，既由於妨礙對氨基安息香酸的利用，並且對氨基安息香酸有抵消磺醯胺藥效的作用，所以在細菌之中，凡是不需要對氨基安息香酸或者自己能製造對氨基安息香酸以中和藥性的種類，就不受磺醯胺的影響。就是先天沒有抵抗磺醯胺能力的細菌，一旦獲得後天的抵抗力以後，他的種族就可以永久不受磺醯胺所影響，不過我們可以不必擔憂的事實是，這種族獲得性的形成，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日，除了淋病雙球菌等以外，至少在目前還不至於影響磺醯胺的施用。就是一種細菌獲得磺醯胺的抵抗力以後，還可以用他種抗菌的藥劑來使其制勝，並且我們由於對氨基安息香酸和甲磺氨基酸的研究，已經知道用其他的方法以限制細菌攝取其他必需的物質，也可以收到相同的效果，如最近製出的一種乙種類似維他命的物質，一種硫化物，和一種類似潘托退尼酸的物質，據說都有制菌的用途，這就基於這一種原理。

下等生物在生存的時候，大都能够分泌一種特殊的物質，以防止其他生物的接近。早在一八七七年，巴斯德和朱伯特(Joubert)兩人，發見培養的炭疽的菌，假使接觸到好氣性的細菌，就不能繼續生長，這證明一種細菌的分泌物，有抵抗他種細菌的功用。最早利用這一種原理而製造的藥物是一八九九年德國人從綠膿極毛桿菌(*Pseudomonas pyocyanca*)菌體中提煉出來的綠膿酵素(pyocyanase)。所謂綠膿酵素，其實並不是真的酵素，而是一種能消化細菌的酸性油質，或者就是綠膿菌素(pyocyanine)的退化產物。在德國當作炭疽的藥物，流行達數十年之久。一直到不久以前，才被醫學界所廢棄。到了一九三六年，有人發見在尋常馬鈴薯桿菌(*Bacillus mensesteriensis*)中，也含有一種殺菌的物質，但結果却沒有提出應用。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丟博斯(R.J. Dubos)從泥土中好氣性的短小桿菌(*Bacillus brevis*)中提出一種物質，稱為乾酪菌素(tyrothricin)。其成分為格刺姆殺菌素(gramicidin)和乾酪殺菌素(tyrocidine)。這兩種物質，同是對原生質有毒性的壘性，除非有精蛋白質的存在以處置顯顯性的磷類脂時，只能夠對付格氏陰性的細菌。因二者都有毒性，所以只可

以口服或局部敷用，而不可以作靜脈注射。不過據最近的研究，假使在其中加甲醛，可以減低毒性而不礙抗菌的效力。從同類細菌中分離而得的物質還很多，其中比較著名的是一九四二年蘇聯化學家從一種腐生性細菌中提出的疊胜。稱為蘇聯格氏殺菌素 (gramicidin S)。其毒性雖和美國品相近，但其對於葡萄球菌的效力，四倍於美國品。並且能防止格氏陰性的細菌。蘇聯格氏殺菌素的性質相當穩定，可以迅速而廉價的生產。

化學家在放射菌的分泌物中，也曾得到許多殺菌的物質。如一九三七年，有人在一種未經鑒定的放射菌中，發見一種無名放射菌素 (actinomycin) (但結果沒有加以提煉，一九四〇年，美國的化學家在抗生放射菌 (*Actinomyces antibioticus*) 中提出甲乙兩種放射菌素 (actinomycin A & B)。前者是一種有毒的色素，有抗菌性。後者是可以控制格氏陰性陽性細菌的物質。在同類的物質中，最重要的是在一九四二年魏刻曼 (Waksman) 在一種類似灰藍放射菌 (*A. laevis*) 的菌中提取的螺旋菌素 (Streptothricin) 其毒性比以前所製的更低。還有一種是從灰色放射菌 (*A. griseus*) 中提出來的，性質和前者相似，不過其細菌光譜不同。

最早從真菌類中得到的抗菌物質，是一九一三年亞耳斯伯格 (Alsberg) 和布拉刻 (Black) 在成熟青黴 (*Penicillium puberulum*) 中得到的青黴酸 (penicillic acid)。其成分和丙種維他命及泰特刺尼酸相似。其毒性和殺菌力大概是由於這種物質對於蛋白質及氨基酸起反應的結果。繼青黴酸而發見的還有從顯著青黴 (*P. notatum*) 中提出的青黴素 (penicillin)。最近從青黴中分離出來的酸還有橙色青黴 (*P. citrinum*) 中的橙青黴素 (citrinin)。從麴菌中提出的還有烟麴菌 (*Aspergillus fumigatus*) 的甲基對醌烟麴素 (toluquinone fumigatin) 細刺麴菌 (*A. spinulosum*) 的細刺麴菌素 (spinalosin)。這些物質雖有殺菌的性質，但都有毒性，所以都沒有治病的用處。

徵求各地通訊

關於各地人民生活情形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態，本誌亟盼各地讀者忠實報告與確實暴露。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社編輯部。

華 富 運 輸 行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五弄五號

承接

代客報關
水陸運輸
起卸工程

專運

工廠鍋爐
方棚引擎
重大機器

電話：

九六五四二
九七七二七

教育的愛

謝少翁

將走到目的地，她放慢脚步，藉此緩和由長途步行所引起的種種疲態。抽出小手帕，擦擦鼻子上的油汗，掠一掠頭髮，整一整衣襟，用力蹬幾脚，皮鞋上的塵埃確實少了些，但她仍舊用手帕在鞋頭上抹了幾下，抬起頭時，臉蛋紅紅地，繼續以輕緩的步子走去。

停在一座有小花園的洋房門前，她生硬地按兩下電鈴，鐵門開了，她照例說聲：「謝謝你！」緩步走向會客室後面的「書房」裏。

「二小姐三老爺！方先生來了！」陳媽照例地高聲喊她的學生下樓，一會兒又端上一杯茶。

方立明在書房內絲絨沙發上坐下，舒一口氣，看看自己的藍布袍子，撫摸沙發把手處的絲絨，環顧那些熟悉的書架，紅木檯，瓷花瓶，茶几，吊燈，牆上的書畫，……再看藍布袍子，冥想一下自己的姿態，她深深地感受這間房子的不調和的窒息。當她開始更遼闊的細想時，急促爭先的樓梯聲打斷了她的精神遠遊；俞祖淵和她的弟弟祖驥，像兩隻玩皮的小狗搶着衝進門，差不多同時地叫她一聲：「方先生！」態度又玩皮又傲慢。她微笑着同學生溫和地談了幾句課外話，接着，開始和她們溫習功課。

俞公館的主人是一個曾經留學英國的銀行經理，俞太太也是個大學畢業生，他倆的應酬交際太忙，兒女的家庭教育無暇兼顧，才請一位家庭教師每天去一次，幫助子女溫習，另外兼負德育方面的教導責任；供給一餐晚飯，還送一點薪水和禮物。方立明是俞公館的第三任

家庭教師，她剛大學畢業，又是教育系的，走出校門第一次應徵就被錄用，她確實很快慰。

就任快滿四個月了，一切都很好；她自己的勝任愉快不用說，那兩個學生也相當聰明，俞太太十分溫文有禮，俞先生難得見面，也很客氣。但是，四個月來，每當她踏進這座洋房的大門，總有一陣莫名的不快，輕輕地襲擊她；起初，她不知道這為什麼，慢慢地，她的直覺不止一次地告訴她：她的工作是一種累贅的工作，既無意義，又乏興趣。至於雙方環境的不同，服裝的優劣，倒是次要的事。

「為教育而生活」，這是她從學校裏帶出來的觀念。出校門不過四個月，到底她堅持了這個信念。一百多天，在剛出校門的方立明，已是相當久長的日子了。這一天是星期六，學校裏下午不上課，化三刻鐘就溫完了學生們當天的功課。她從手提包裏拿出一本小說，一面對學生說：「你們練習小楷吧，誰寫得好我稱讚誰！」

星期六的晚飯，方立明總是獨個兒吃的，孩子們和父母團聚在一起吃。星期日，她從不去俞公館，因為那天他們那裏太熱鬧了，一個清寒家庭出身的入世未久的女子，恐懼那種空虛的熱鬧，厭惡無聊的應酬。

平時，她陪孩子們吃晚飯，菜餚比較豐富，星期六就差些。這個她並不計較，但無論如何她總有些不樂意。

有一天吃晚飯，二小姐俞祖淵因為沒有上好的添菜

，又發脾氣了；把象牙筷子一摔：「陳媽！你這個死笨蟲！告訴我不要吃火腿炒蛋，你偏要拿這個來！你想把我氣死不成？……」嘴裏在罵，雙手裝着惡罵的姿態，滿臉受了委曲的悲憤。

方立明第一次看見她發這大的脾氣，溫和地慰勸她：「不要為了一點小事就生氣，難得有一天吃炒蛋，將就將就得了吧。你知道！現在全世界有許多人連粥都沒有吃呢！」這句話脫口而出，她知道有些話病。

「可是，我們是有錢的呀！」果然，二小姐對她把鼻子一翹，態度傲慢，好像在諷刺立明因為家裏沒有飯吃才出來教書的。

從此以後，她懂得自己的教育對象了，懂得神聖的教育工作者在右錢人的眼裏，也不過是拿工錢的苦匠人。她對俞公館的興趣更淡了。寒假期來的時候，她辭職了，俞太太苦苦地挽留她也沒有用。

媽聽到女兒辭職的消息，因為事先沒有商量過，把她叫到面前訓話一頓，母女倆都受過高等教育，相互間非常瞭解，在低聲和氣的母愛的訓話之後，又商討女兒今後的出路。媽不放心女兒單獨去應付複雜的社會，主張女兒下學期到育光中學去教書，做母親的在那裏當教務主任，一切都沒有問題；女兒不肯，她最反對靠「牌頭」吃飯。

「你有教育才能的，你是我的女兒，但當教員不比做官，只要你所擔任的課程使人滿意，受學生的愛戴，你並沒有依靠我的職權吃飯，你仍舊是有獨立人格的方立明先生呀！怕什麼？」她用手指輕輕抬起女兒正在沉

思低頭：『不要專門壓孩子氣！』
一陣微笑的暖風，吹得母女倆臉春光，雖然那時是初冬季節。

育光中學出現了一個小方先生，談吐舉止面貌都同教務主任方安先生差不多，舊學生們好奇地找各種機會到教員休息室裏去看她，有個浦踏姑娘還特地問方安先生：『方先生，小方先生可是你的小姐？噢！我應該說令媛才對！』引得滿室的師生哄笑起來。立明像新娘子一樣，換了新的環境，起初一二星期經過不慣，以後慢慢地熟悉了也無所謂。

立明在育光中學校迅速地變成了活躍的人物。她能說流利的國語，什麼集會上人們總羨慕着要小方先生演講；乒乓球裏，籃球場上，排球場上，常有她的蹤跡；圖書室她也差不多天天去翻參考書；教員休息室因為有了她，比上學期的氣氛活潑愉快了好多；學生們喜歡這個年青溫文謙虛而有修養的教員，當她是一位知心的大姊，有能力的顧問；所有的教員都喜歡這新同伴，人們常常以『青山於藍』『後生可畏』之類的話誇獎她，老方先生雖然嘴上不說她的好，心裏却十分歡欣，她確實地相信，亡夫和自己的苦苦栽培，將來必然有豐富的收穫。

除了老方先生以外，最關心方立明的，是個男教員，他也是本學期的新教員，那近視眼黑臉皮的『酸瓜』——學生們常常在背後譏笑他的醜態，他並未大學畢業，但爲了吃飯，不得不買一張文憑冒充一個『文學士』，二十八歲，但尊稱了三歲，他教史地，常在圖書室裏翻參考書，遇見方立明，和順地打個招呼就埋頭在書本裏，離開的時候，輕輕地從不驚動別人。

一個星期日，立明在家裏準備下週的教材，缺些參考書，匆匆地跑到學校裏去找庶務先生，校役說：『張先生出去了，小方先生有緊要的事，可以打電話到校長家裏去問問看。』

『不！沒有什麼，我想拿圖書室的鑰匙，……』她失望地慢吞吞說着回頭就走。

『小方先生你去打門試試看！說不定程先生在那裏面！』

『那一個陳先生？』

『就是教初中三年級史地的程先生。』

『喔！』她游移幾秒鐘，轉身又跑了進去，走去看，館門緊閉着，傾聽一會兒，裏面沒有響聲，她絕望地有些氣憤地用拳重重地敲敲門，正想回身走的時候，裏面好像發出低低應聲：『喂！……』她以爲自己神經過敏，看看門不開，調頭就走了。

『方先生！』後面程前還在招呼她。她再回身過來，不知爲什麼心弦起了一陣震動，呆了一呆，立刻又微笑着說：

『程先生在用功嗎？』

『不！隨便翻翻書。……方先生剛才是不是打門的？』

『是的。』

『找參考書嗎？』

『是的。』

『方先生教授很認真！』

『說客氣話，程先生才認真呢！』

一面交談一面走進圖書室，他順手又關上門，兩個世故不深的青年，不知道再如何交談下去，雙方的心緒有些不安甯。他坐下自己的原位置，擦一擦眼鏡，想藉此回復心地的平靜，戴上眼鏡，低下頭，黑字一行一行飛過去，却嫌它們爬得太快，再從頭開始往後慢慢地看，似乎有些效果。

她在書櫃面前踱着，好幾次打開玻璃櫃門，取出一二本書翻翻，又插了進去。幾分鐘之後，他們不約而同地互相用疑問的目光對視一下。

『我打擾你了，程先生！』她已經拿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別裏計，方先生想找那一方面書？』
『找到了！不用費心。』她做了一個手勢，阻止他站起身來，在離他不遠的一張椅子前坐下。

他們互相再注視一下，又自然地打開書本各自看書。

心弦的震動停了，牆上大大的靜字，統治着這間屋子。偶然有些極微弱的翻書聲，夜有節奏的鐘擺聲壓着，並未攪混全室清寂的氛圍。經過一小時多鐘，他們始終浮沉在各自的精神天地之間。最後，立明把自己所要的材料看完了，搞下一些簡目，抬頭望望，他仍舊靜靜地用心讀着。她胆怯地站起，輕輕地走過去放書，希望不打破這可愛的寂靜的情景，不時回頭窺視他，當她輕輕地掩上書櫃門的時候，楞門『呀！』的響了，她的胆怯的眼光換到了他的毫無表情的安祥的視線。

『真對不起！』她陪着笑臉。

『沒有關係，請不要那樣客氣！彼此同事，無所謂的。』他妮妮地說。

她真的不胆怯了。走近他，坐在一旁：『程先生你那麼多材料？』看見他面前有好幾部書，她有些驚異。

『不！我自己隨便翻翻的。』

『研究什麼呀？』

『英國史。說不上研究，不過隨便看看罷了。』他雖然謙虛，臉部的表情却是學者風度；方立明的內心，油然而起一種敬仰的感觸。

『程先生這樣用功，爲什麼不在大學裏謀一個助教的位置呢？』

他的臉突然泛出一層害羞的紅潮，下意識地整一整眼鏡，吞吞吐吐地：『這個……我從來不敢幻想，……他幾次想告訴她，自己並沒有真的畢業，話頭子爬上喉嚨又硬嚥了下去。她見他這樣天真地窘迫，以爲觸動了他內心的隱痛，連忙把話頭轉向別處：

『程先生爲什麼特別喜歡研究歷史呢？』

『喔！這個……』他的臉色在復原，『歷史就是前

人的生活紀錄，是舊時代發展變化的經過情形，也是未來新時代的路向。『歷史，才真的懂得人生！』他的語氣像在講台上差不多，音調低沉而有力。

『呢……』她低聲驚奇地無語可對。

『方先生覺得我的話太過分了嗎？』

『不！我是個草包，什麼也不懂，怎麼有資格批評你的意見呢。』她有些慌。

『大家生活在人世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人生是什麼，更不知道人為什麼要生活？』繼續他的講學式的談話。

『我想，這好像是一個哲學問題。』她打斷了程前的漫的說教。

『可以這麼說，但哲學也並非超歷史超人生的學問。』

『那末，程先生對於人生的見解是怎麼樣的呢？』

『全部歷史是新舊勢力交替的紀錄，人生就是一場戰鬥！』黑臉上掠過一陣莫名的強烈的神色，這種神色在一個書生的臉上，方立明還是第一次看見。

『不過，人類理應和平相處！我們負教育責任的人，更應該教導人類生活在博愛的偉大精神基礎上面！』她心裏不服，反對的意見脫口而出。

『是的，人類應該生活在博愛的精神基礎上，但為什麼真正的全世界的無分彼此的偉大的博愛並未實現呢？』

『因為教育不普及，和平思想更缺少人去傳播！』

『在我，反而覺得是戰鬥思想缺乏人去傳播的後果。』

她以十分駭異的目光注視他那張堅定的傲然的黑臉。半響，雙方在沉思。

『你教人類去戰鬥，那末，世界在這種教育的薰陶之下，不是將永遠沒有安甯的日子了嗎？』她的父母、師長，從來都主張引導人類上和平安甯之路的。

『世界一定有它的永久和平，一定有它的安甯的未

來，那時，人類放射出毫不虛偽的博愛的光芒，烘暖每個人的心田。但是！必得經過戰鬥！只有在舊的腐朽的東西都消滅之後，一個新世界的大門才能打開！』

她微微地顫抖了兩次，覺得不應該再談下去，強作笑容地說：『聽到程先生這種高見還是第一次！我是不能無術的人，請不要見笑，今後有機會再請教！』站起來向他告辭：『今天打擾程先生的研究工作，心裏很不安，再見！』

『那裏那裏！沒有關係，再見！』他一面說一面送她出去。

方立明回到家裏，精神有些恍惚，下意識地感到程前遠像個磁性水雷，她那平靜快樂的人生航途中，將要發生一些波折，可能是某種恐怖的波折。那天晚上，她入睡得很晚，不斷地思考和平教育與戰鬥教育之間的正誤，毫無結論地暈沉沉地睡去。

兩天之後，他們又在圖書室裏見面，程前還以親切的微笑招呼她，但她擺出冷冷的矜持的態度，交談了三言兩語，轉身拿了書就走。萬萬想不到小方先生會用這種態度對付他，以驚疑的目光送她健美的背影，輕輕地嘆一口氣，直覺地判斷前幾天腦袋裏的幻景不能實現，但他仍舊在想着，想着，想着。

走進教員休息室，方立明默默地坐下，茫然地打開參考書，神經像犯了什麼錯誤之後那樣緊張，白紙黑字沒有給她什麼東西，眼前閃爍着一幅磁性水雷似的黑色的笑容。她問自己：『難道他真的……』沒有回答。她又問自己：『那末，我喜歡他嗎？……討厭他嗎？……』一陣急促的上課鐘聲，打斷了兩個青年的混亂的思潮。

平靜地，心緒不甯地，不知不覺地讓半個月輕輕溜走了。程前還仍舊天天去圖書館，方立明從不踏進館門一步。漸漸地由失望而絕望，他悶悶不樂，悵鬱的幕布掩住了心智的活動，勉強地保持着嗜書的習慣，他深重

地受了孤獨的壓制與襲擊，氣餒了，只能捧着書，感到孤獨的可怕可恨而越捧着書本子發楞。

『勇敢一點啊！你是一個為戰鬥的教育而活着的人哪！』他常常鼓勵自己。

『……可是我太孤立了，太苦悶了，我並未放棄對於歷史和人生真諦的探求，我會繼續前進的，但希望有人同情我，瞭解我，和我共同奮鬥，……她不行……她是個不懂人生的女孩子，受了和平論調的麻醉，……』他的腦海裏，每天泛濺着思潮沖擊的波濤。

方立明幾星期沒有參考教材，學生們公然提出要求；恢復課本之外的補充講材。她答應了，起初在家裏或朋友那裏找些參考材料，以後弄得走頭無路，又走進圖書室。程前還本來把圖書室當做休息室的，她一進去就瞥見他，雙方沒有打招呼，互相冷冷地略略愕然地看了一眼。她覺得他憔悴了些，他猜想方立明恐懼且討厭他，好像自己的目光觸怒了牠，立明的嘴上吐不出一絲笑痕。從此，他的心冰樣地冷，沙漠似地寂靜，課餘時間，差不多全部消磨在圖書室裏，化了一個多月，英國史的初步研究結束了，着手準備讀美國史的時候，他恢復了精神方面的常態，忘記了不久以前，曾經有一顆燦爛的流星，飛過他的灰暗而清靜的思想領空，如今，那流星消失了。

一種新奇的思想，與自己完全相反的思想，闖入方立明的腦袋之後，再也趕它不出去；它始終盤踞在腦海的一角，有時虎視眈眈地威脅她，有時她遇到什麼可惡的人物，那腦海一角的怪物就說：『去教育他呀！』有時她看見一件極端不合理的事情，那怪物又諷刺她：『要教育多少年這些事物才能消滅？……』

期中考試的時候，她坐在教室裏監考，她想：『何必多此一舉，平時學生們的成績如何，考的時候也差不多，月考季考把大家忙了一陣，用功的學生成績好，作弊的成績也好，監考，是對學生們的侮辱，……』她想

到自己的學校生活；想到從前拚命用功硬記死讀的學課現在都忘了；想到那形形色式的教員，他們像工人一樣做工拿錢；她也想到自己的父母，父親在大學裏當了十多年的教授，社會所報答他的就是一個清寒淒涼的收場；母親在中學校裏辛勤操勞八九年，頭髮花白了，硬撐着瘦弱的身子，每天老遠地從家走到學校，又從學校搖擺着回家，清高的精神，受不住物質窘迫的磨折，她一個月一個月地顯得衰老下去，她獻給教育以垂老的生命，預料她又將得不到什麼報償而終於有一天要倒下來，和父親一樣……想到這裏，她打了一陣寒顫，臉色也變了，圓瞪着眼出神，一層層紗似的悲意，把她捆得緊緊地，一時，她失去了任何知覺。

『方先生！』一個學生在叫，她並沒有聽見。

『方先生！！』那學生更大聲了。

『什麼事？！』她微微地染着莫名的慌張。

『題目太難了！好不好少考一個？』

『方先生，真的太難了！』一個向來聰明的女學生也向她哀求。

她皺着眉，想了一忽兒，用平穩的聲調說：『凡是好學生不許說難！……』

『但是方先生，這幾個題目真的難呀！』那女學生說到『真的』時，特別提高喉嚨。

『我們都要不及格了！』另一個嘆起嘴。教室裏頓時亂哄哄地不安起來。

『不許再講！』她不得不高聲說話：『全部題目都要做的，不過，如果大多數人把那個難題目空着不做，也不要緊的！你們不及格我會加分數給你們！你們都是好學生！』說到這裏，她笑了，孩子們也笑了。

教室回復原有的安靜時，她的心緒仍舊亂得無法平定，突然，那個怪物發言了：『如果這許多活潑純潔的青年，在另一種生動有力的革新的教育制度之下，他們將變成自覺的社會改革者，新時代的先鋒，陳舊事物的清算人。你教他們一些陳腐的死板的東西，和平得很！

和平得很！然而，舊時代却因此延長了生命！如果一旦新的時代到來，你將顯得如何落後，如何可憐！你獻給舊教育以一切，舊社會會給你一些微薄的酬報。想想！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也是什麼長什麼委員呢！……它猛烈地暗噬她的心，她打算向它求饒，但她不肯，她想反抗、辯駁，也沒有能力。

思想戰場上空漠地僵持着；一陣激浪驟雨飛過之後，大海顯得陰霾而平靜，好像還有什麼更大的災難到來。

苦悶，像一隻惡魔的鐵桶，把她罩住，腦子裏的怪物越活動，惡魔的鐵桶收縮得越緊；她恐懼着，懼怕有那麼一天，她的腦袋，她的心，她的一切，不是給鐵桶悶死，就是給怪物炸死，連鐵桶也給炸破。因為她很明白，那怪物已經盤踞了大半個心靈。

又是一個星期日，她情不自禁地走進學校，一直向圖書館跑，敲門之後，程前探探出驚奇的頭。

『方先生！……請進來！』

她沒有說什麼，強笑着點點頭，緩步進去，坐在他的旁邊。默默地，他們相對着，細心地觀察對方的臉容，猜度對方的心緒，他們第一次如此細心地互相對視。

『她瘦了，一定是我的思想害了她。』他想，覺得有些不安，有些憐惜。

『他還是老樣子！』她猜不透他。

不知從什麼話談起，沉默好久，還是程前還打破了寂寞：『方先生來看書的嗎？』

『不！』她堅定地說：『想跟你談談！』冷冷的語調，埋藏着親切的字眼。

『談什麼呢？』

『還是上次所談的。』

『方先生有什麼新的意見指教嗎？』

『請你不要這樣說話吧！』這一聲哀求把他的心軟化了。

『那末，還是請你先發表意見吧！』

『我只帶來幾個問題！』

『請說吧。』他那冷靜的態度，掩不住驟然高熱緊張的情緒。

『怎麼樣才能算是戰鬥的教育？』

『先教育自己，使自己變成一個舊時代舊社會的叛徒！新時代的先鋒。然後，再去教育別人！』

『這裏面只有教育而沒有戰鬥呀？』

『克服舊思想，就是一種偉大的戰鬥！有些人能自覺的，就是說能自己改變自己，有些人只能受事變的教育。』

『爲什麼不懂歷史的人就不能澈底瞭解人生呢？』

『人生不是別的，就是合羣的人在某一時代的生活。生活，包括工作、享樂、鬥爭。如果不明白某一時代的歷史特點，就不能真正的瞭解當時各個地區各個階級的生活內容。譬如說：新生的一羣，總是受苦痛受欺侮受壓迫的一羣；而喪亡的一羣，總是拚命掙扎恣意荒淫的一羣。如果不懂得歷史的必然如何發展，就不能明瞭人生的意義，因爲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而社會經濟幾千年來已經把我們分化成各個集團了，在各集團之間，衝突與戰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教育人們去如何爲新社會而戰鬥，是真正的神聖的教育！』

……

臨別時，他們嚴肅地說聲『明天見』，深深地交換一次久長的注目禮，無限的歡愉和興奮，像激湧的溫泉，從心坎的深底直冒上來，他們好像聽到兩顆活躍的心，照同樣的節拍在急跳，那是愛神的鼓舞。

那天晚上他們第二次失眠了。

學期將結束的時候，教員和學生們，常常以同樣兩個人物作爲談笑的資料，這兩個人就是方立明——皇后一般受人敬愛的小姐，和一個『醜瓜』程前遠。

有一天，當地踏進教室時，學生們的臉上，浮起一層狡狴的釋笑。黑板上寫着幾個字——『一朵鮮花。』她滿不在乎地抹掉這四個字，以十分平和的態度對學生們解講書本。她學會了以理智去瞭解一切，她已經懂得惡劣的社會教育和勢利的家庭教育對於孩子們影響如何重大，孩子們本是純潔的白紙，舊的醜惡的勢利的頑固的卑鄙的陰毒的……一切最壞的顏色從舊社會的四方八面向孩子們噴濺，什麼聖潔的水也洗滌不清。幸災樂禍與中傷侮辱，已經成為流行的現象，從衣服的好壞去判斷人，更是天經地義的事。她早已懂得這些事物，她十分憐惜孩子們，他們是無罪的，罪惡另有其不涸的源泉。

退課前十分鐘，她停止講解，以同樣平靜的語調問：『剛才黑板上幾個字誰寫的？誠實的好學生他應該站起來承認！』

沒有人敢站起來。

『我並不想罰他，不過，我想因此講些課外的話，誰寫的？快站起來！沒有人承認不下課！』她表示自己並未放棄師長的身份。

『是我，方先生！』林樹堂胆怯地站起來。

『誰教你寫的！』

『是我一時糊塗。』

『你一點也不糊塗！你很聰明，可惜你受了惡劣環境的教育，所以你把罵人當做樂趣！用勢利的眼光看人！做各種損人不利己的蠢事。我不希望你當面對我說你以後改過了，但是却希望同學們大家不要犯這種錯誤，因為這是文明時代最可恥的行為！可是，不幸你們好多人犯了這種錯，或者以後還要更錯下去……』

傍晚，她和程前遠又在操場上閒談，告訴他這件事情，相對苦笑一下。

放暑假了！母女倆把考卷交出以後，在家裏整整休息了一星期，彼此謹慎地談笑着，避免說到下學期的事

，更沒有談起程前遠。但大家都想在一種更融洽更溫潤的氣氛之中交換意見。媽直到如今仍舊痛愛女兒，從不想傷害她的幼稚而活潑的心靈，立明離開了媽簡直不能生活，有時想到媽總有一天要離開她，心裏怪悲愴的。她成年了，懂得天下並無永久不散的盛衰。

一天，她盼望了好久的信來了，是程前遠從家鄉寄來的。

『明小姐：』

我昨天平安地到了家裏，今晨一起身就寫信給你，因為我知道，這世界上只有你最關心我的一切。在學校裏常見面，並不覺得什麼，可是當我跨下汽船，向西航行不久，好像自己不是回到家鄉去而是離開了家鄉，船行越遠，越難過起來，最後，我倒在艙裏悶睡。次日，上甲板去吹吹江風，胸懷稍微寬爽了些。

家鄉一片荒涼。收成雖然不差，苛捐雜稅太重了，十倍收成的豐年也看不見全部農人的笑臉！你收穫多少，就有人在計劃徵收多少。啊！這時代！這世界！

父母都很康健，可惜我的哥哥失蹤了，我回家以後，雙親比較快樂些。然而，他們不能瞭解我，只把我當做私產看待，逢人便說我在上海的中學校裏當教員，有三担米一個月，天哪！我的實際薪水不過夠買六七斗米！他們吹得那麼大。

下學期的聘書我不想他們再會給我，你的我以為沒有問題。我正在託朋友，請他們介紹一個適合個性的工作，大概有把握當一個平民夜校的教務主任，如果這件事實現了，我們將在這一輩不同的學生面前，解講一些不同的課程。衣服穿得較少較不整潔的人羣，是真誠的願意接受新教育的一羣；那些衣冠楚楚的富翁小姐，我自嘆沒有福氣做他們的教師，因為我不是偽君子。

天天在掛念你的前遠

十二月廿

讀完了這封信，她想立刻復信，但是媽在家裏，怕她看見了麻煩，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媽在前房喊她：

『阿明！』

掩着心虛，緩慢地走過去：『媽！』

『這幾天你思得舒服嗎？』拍拍女兒的肩，眼珠放出無比偉大的母愛的磁力。

『很舒服。』她強作安逸的笑容，但預感今天要長長地談話了。

『下學期打算怎麼樣？』

『聽媽的指示。』

『好孩子！嗯……真聽媽的話嗎？』

『真的！』

『你休息半年怎麼樣？』

『噢！媽！這個我受不了的！』她想哭了，但矜持着。

『因為……你知道！校長通知我說，下學期不是你沒有聘書，就是他沒有聘書！』

『他！他是誰呀？』裝着驚訝的神色。

『好孩子！對媽不要裝腔。那個程先生，人家都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校長覺得男女同學的學校，男女教員最好不要太親熱！我是從來不管你的，一直沒有問過你，但是現在不得不問你，因為他的家境或者比較我們苦，我的意思還是你不去教的好。……』女兒的臉藏在媽的懷裏，媽一面說，一面輕輕地摸撫女兒的頭髮。

『他說，他下學期不準備教了。』

『好，那末……你呢？』

『我？聽媽的話。』

『那末，你下學期仍舊是育光中學的小方先生！』她笑呵呵地說。

錄日期三第卷一第誌本

炎夏過了不久，初秋的夜晚，在平民區的一角，有一所夜校正在舉行開學典禮。校長是個三十幾歲的青年人。教務主任是個黑臉的莊眼，除了原有的兩個女教員之外，又有一個新的，此外還有幾個外形半文半武的男教員，他們是平民夜校的畢業生，現在已是母校的初級班教員了。

校長特別向學生們介紹那位新任的教務主任程前遠，說他是一位革新的教育家，是平民們的良師，他爲了教夜校，寧可拋棄中學教員的職位。之後，又介紹方立明先生。

在淡淡的燈光下，上百個學生擠在一處，分外顯得熱鬧和興奮。每一張臉流露出真誠的表情。教師愛學生們的刻苦努力，學生愛教師們的熱誠好義。在教員與教員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同樣交流着新教育的溫暖的友情，尤其是新來的主任和方先生，他們自始至終甜蜜地天真地微笑着。

程前遠的致詞簡短而明確：『……在死的書本上的學問方面，我可以暫時做你們的先生，但在活生生的實際生活經驗各方面，諸位同學又都是我的教師。我們互相敬愛，互相教育，我們是真正的好同學，好朋友。我

們不騙同學的金錢和精神，不浪費這些；同時，我們要在新的教育方法之下，變成一羣新時代的先鋒，一待時機到來，就能把舊的污臭的東西一齊消滅！我們每天在夜裏摸索，但是，我們必定能看見光明！惟獨肯努力奮鬥的人，才有撥開輝煌的明天！』

從此，程前遠和方立明改變了生活，遠離那些虛偽的人物，走入真誠的人民隊伍裏去，不再感到自己有什麼特殊超人的靈腦。他們在新的教育工作裏面熱愛着。

時事評論

評『下關事件』
怎樣消除內戰
法意選舉之意義

鶴 阜
海 明
海 明

論官僚制度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

數以萬萬計之贏利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

利潤與工資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

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完）

求真（詩）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

編輯餘談

陳人白
劉少嚴
喬治·沙爾
曉山譯

謝山譯

少棠譯

蔡尚思

李 季

陳振維

唐虞世

冰夷編譯

朱維基譯

羅式熙

李毓鏞

編 者

錄日期四第卷一第誌本

時事評論

論昆明李聞被刺事件
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
菲律賓獨立之透視

鶴 阜
海 明
康 君

戰後一年

印度問題之真相

*『密勒氏評論報』一封讀者的信(M.A.李)

意大利之現狀

道家與小農

答蔡尚思評我的老子看法

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中國虛無主義史略）

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敘述第一國際成立經過的一個文獻

論古典主義戲劇

小甲長的舊夢（小說）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四）

印度二月暴動之回憶（特約通訊）

崇明之行（地方通訊）

讀者意見

讀者答覆

陳人白
劉少嚴
康 君
嵇文甫

李 季

蔡尚思

碧 雲

唐虞世譯

冰夷編譯

謝少翁

李毓鏞

李文陽

唐 德

程元宇等

編 者

投稿簡章

-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 六、來稿經本社揭載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但本社將來出版彙刊時，仍得採入。
- 七、稿末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編輯部。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京	各書局	桐城內
安徽	桐城新書局	仁和路一二七號
蘇州	各書局	琉璃廠一五五號
杭州	東南圖書公司	王府井
北平	中國科學儀器公司	舊法租界濱江道
天津	馬德增書局	江漢一路三號
漢口	中國科學儀器公司	陸家山路（六眼井段）
南昌	新時代書局	伯陵路一〇二號
長沙	大公書局	太平路二二八號
廣州	各書局	武成路四四六、七號
潮州	中書局	
香港	各書局	
昆明	各書局	
重慶	各書局	
成都	各書局	
南寧	各書局	廣西南甯城內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一千五百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正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理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本埠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不許轉載▼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十七萬元	九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首篇之前	十四萬元	七萬元	
普通	正文之後（插頁）	十萬元	六萬元	三萬元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本刊已聲請登記中

利 通 有 限 公 司

LEE TONG & COMPANY

— MANUFACTUR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THINGS —

行址：上海漢口路四五五弄廿七號

HOUSE 27, 455 HANKOW ROAD, SHANGHAI.

電報掛號	三	LEETONGCO.	三	電話	九六五四六
CABLE ADDRESS	三	SHANGHAI	三	PHONE	96546

文 誼 金 筆

久 寫 不 壞



水 滿 後 用

上海文誼金筆廠出品

一〇〇八六話電 號一十弄八四二路康泰址廠

每册實售壹千伍百元